

毛泽东选集

十卷分册本 第八卷 MJG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八卷 目录

(一九一二年六月至一九四九年七月)

商鞅徙木立信论	4211
《明耻篇》题志	4212
致友人信	4213
致萧子升信(一)	4215
致萧子升信(二)	4217
致萧子升信(三)	4219
致黎锦熙信	4220
体育之研究	4222
体育在吾人之位置	4222
体育之效	4223
为萧子升的《一切入一》自学笔记写的序言	4226
夜学日志首卷	4227
《湘江评论》创刊宣言	4228
各国的罢工风潮	4229
炸弹暴举	4230
不许实业专制	4231
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	4232
民众的大联合——中华“民众的大联合”的形势	4233
致黎锦熙信(二)	4234
怎样去做才有真正的劳工团体出现	4235
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	4237
给蔡和森的信	4239
所希望于工会的	4240
更宜注意的问题	4241

劳动各团体致参众两院电	4242
粤汉路全体工人致全国各地工团快邮代电	4243
湖南全省工团援助京汉路工友通电	4244
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致萧耀南电	4245
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致吴佩孚电	4246
农民问题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案	4247
对国民党右派之斗争——中央通告第 15 号	4248
答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问	4250
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	4251
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	4252
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农民问题丛刊》序	4254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宣言	4255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规约	4257
阳新赣州死难烈士追悼大会宣言	4259
在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4261
讨蒋通电	4262
在中央紧急会议上的发言	4264
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	4265
给林彪的信	4266
反对本本主义	4267
一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4267
二 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4267
三 反对本本主义	4268
四 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 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	4269
五 社会经济调查，是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接着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	4270
六 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4272
七 调查的技术	4274
(1) 要开调查会作讨论式的调查	4274
(2) 调查会到些什么人?	4274
(3) 开调查会人多好还是人少好?	4274
(4) 要定调查纲目	4275
(5) 要亲身出马	4275
(6) 要深入	4275
(7) 要自己做记录	4275

《兴国调查》前言	4276
普遍地举办《时事简报》	4277
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	4278
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	4279
长冈乡调查	4280
关于战略方针和作战指挥的基本原则	4281
与斯诺关于特别问题的谈话	4283
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	4284
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	4285
特立六十岁生日写的贺信	4286
抗日民主与北方青年	4288
关于十五年来党的路线和传统问题	4289
关于差别和矛盾问题	4290
论鲁迅	4291
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袭击	4293
在边区国防教育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典礼上的讲话	4306
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	4307
关于《墨子哲学思想》一文给陈伯达的信	4310
关于《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给张闻天的信	4311
妇女们团结起来	4315
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4316
反投降提纲——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的提纲	4317
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	4318
研究沦陷区	4319
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	4320
为《大众日报》周年纪念题词	4323
吴玉章寿辰祝词	4324
集中力量发展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	4325
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4326

目前时局与党的政策·····	4327
1、战争与革命问题·····	4327
2、中国问题·····	4328
3、学习问题·····	4328
关于经学问题给范文澜的信·····	4329
给毛岸英、毛岸青的信·····	4330
驳第三次“左”倾路线·····	4331
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	4335
给萧军的信·····	4336
关于财经建设的基本方针给谢觉哉的信·····	4337
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	4338
关于农村调查·····	4339
《文化课本》序言·····	4340
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员的关系·····	4341
如何研究中共党史·····	4342
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的讲话·····	4344
关于整顿三风·····	4345
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相结合·····	4346
给聂荣臻的电报·····	4348
山东有可能成为战略转移的枢纽·····	4349
关于报纸和翻译工作问题给何凯丰的信·····	4350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	4351
妇女工作者应参加经济工作·····	4355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的要点·····	4356
给何凯丰的信·····	4357
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	4358
给彭德怀的信·····	4360
英勇斗争的二十二年·····	4361
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4362
切实执行十大政策·····	4365

关于人的基本特性及其他	4368
给杨绍萱、齐燕铭的信	4370
关于路线学习、工作作风和时局问题	4371
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	4373
给陈毅的信	4375
给李鼎铭的信	4376
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的工作报告	4377
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	4378
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	4379
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	4381
给秦邦宪的信	4382
坚持为人民服务	4384
给郭沫若的信	4385
给陈毅的信（二）	4386
给谢觉哉的信	4387
一九四五年的任务	4388
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	4389
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	4390
原《学习和时局》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4391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	4436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	4439
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	4443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	4445
在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上的演说	4452
给柳亚的信	4454
在抗大七分校的讲话	4455
关于时局的四条分析	4456
对付美蒋的主要政策不是让步而是斗争	4457
反动派的企图终究要失败	4458

要胜利就要搞好统一战线	4459
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4460
一年作战总结及今后计划	4461
在小河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4462
西兵团的作战任务	4463
给敌以歼灭与歼灭性打击须同时注重	4464
陈谢部的作战范围和原则	4465
给毛岸英的信	4466
改造旧艺术创造新艺术	4467
在杨家沟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4469
把打击面放在真正的封建剥削阶级范围内	4470
对可以争取的中间派应采取积极争取与合作态度	4471
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4472
转发朱德给中共中央信的批语	4474
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阶级关系和人民民主革命	4475
第一章 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	4475
第二章 中国目前的阶级关系和人民民主革命	4478
第一节	4478
第二节	4480
第三节	4480
第四节	4481
关于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 (草案)的指示	4483
人民的革命力量才是真正的优势	4484
政策和策略是我党我军的生命	4485
企业管理委员会应有工程师、技师及职员参加	4486
晋绥分局应将工业生产放在领导工作的重要位置	4487
对知识分子应避免唯成分论的偏向	4488
不同意毛泽东主义的提法	4489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	4490
给刘少奇的信	4492
再有一年左右时间即可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	4493

歼灭强敌必须用强攻方法	4494
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	4495
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	4496
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	4496
关于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关系	4497
“毕其功于一役”	4497
如何帮助王明同志改正错误?	4498
依靠群众办好铁路建设事业	4499
我们是能够克服困难的	4500
沁园春·长沙	4501
菩萨蛮·黄鹤楼	4502
采桑子·重阳	4503
如梦令·元旦	4504
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	4505
清平乐·会昌	4506
忆秦娥·娄山关	4507
七律·长征	4508
清平乐·六盘山	4509
沁园春·雪	4510
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4511
浪淘沙·北戴河	4512
七律·送瘟神（二首）	4513
七律·到韶山	4515
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	4516
卜算子·咏梅	4517
七律·冬云	4518
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4519
贺新郎·读史	4520
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4521

商鞅徙木立信论³³⁹⁶

(1912年6月)

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尽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政府国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则不惟无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惧，吾民又必竭尽全力以阻止此法令。虽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

商鞅之法³³⁹⁷，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当孝公之世，中原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言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綦难哉？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拏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

³³⁹⁶ 这是毛泽东在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读书时写的一篇作文。原文无写作时间。

³³⁹⁷ 商鞅（约前390年——前338年），姓公孙，名鞅，战国时卫国人，亦称卫鞅。初为魏相公叔痤家臣。后入秦，向秦孝公进献富国强兵之策，任左庶长、大良造，先后两次主持变法，使秦国富强。后又因战功封于商（今陕西商县东南），号商君，故称商鞅。孝公死，被公子虔诬陷，车裂而亡。

商鞅之法，指商鞅前后两次变法所制定的新法。其主要内容为：奖励耕织，废除贵族世袭特权，推行连坐法；合并乡、邑、镇为县，废除井田制，按丁男征赋，按军功受爵，统一度量衡。

《明耻篇》题志³³⁹⁸

(1915年夏)

五月七日，
民国奇耻。³³⁹⁹
何以报仇，
在我学子！

³³⁹⁸ 《明耻篇》，1915年夏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集资刊印。全书辑有七篇文章和一个附件。文毛泽东阅读该书时，加了许多圈点和着重号，并在多处写有批语。在该书的目次第二、三、四、五和附件的篇名上方，毛泽东均划了圈，并写有“圈出五篇为最紧要者，其余不阅可也”。本篇是毛泽东写在该书封面上的题志。原无标题和标点。

³³⁹⁹ 1915年1月，日本国政府令其驻中国公使向袁世凯提出旨在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后，5月7日，又提出最后通牒，限四十八小时内答复。5月9日，袁世凯对日本的要求，除声明第五号一部分“容日后协商”外，其余一概加以承认。因此，中国人民将5月7日作为国耻纪念日。

致友人信³⁴⁰⁰

(1915年7月)

当今之世，黯阒塞，非有强聒³⁴⁰¹，狂澜谁弼？齠其躬而有益于国与群，仁人君子所欲为也。又或谓搅神废日，此亦似矣。虽然，此乃所谓佞也。孟轲好辩³⁴⁰²，不得谓之佞；子贡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³⁴⁰³，不得谓之佞也。谁曰搅神？谁曰废日？且吾尝闻用之而弥盛矣，锻工不藐其腕而硕其腕〈簸〉夫不纤其胫而肥其胫。苏张纵横³⁴⁰⁴，其舌未敝也，离朱巧察³⁴⁰⁵，其目不眯也。凡此用而弥盛者，所在多有，搅神之说，不足信矣。弟近年来所有寸进，于书本得者少，于质疑问难得者多。苟舍谭论而专求之书，其陋莫甚，虽至今昏懵如前，未可知也。且吾闻

³⁴⁰⁰ 此信前后残缺，受信人和写作时间不明。从信中所提“子升悔于言”和子升“来书”两事及作者在信中所反映的对受信人的态度来看，似为写给萧子升的。毛泽东与萧子升于1914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同学，萧在1915年6月毕业离校。从信的笔迹和信中反映的有关学习的内容来看，与1915年间的其他书信相近。又，联系1915年8月3日给萧子升信来看，此信似写于1915年7月。

³⁴⁰¹ 见《庄子·天下》：“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以此周行天下，上说下教，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强聒而不舍，意为人们不想听而仍然喧谈不休，争论不已。

³⁴⁰² 见《孟子·滕文公下》：“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³⁴⁰³ 子贡（前520年——？），春秋时卫国人，姓端木，名赐，孔子学生。“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事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³⁴⁰⁴ 苏，指苏秦（？——前317年），战国时东周洛阳（今河南洛阳）人，任齐相时约楚、燕、赵、韩、魏五国攻秦，史称合纵。张，指张仪（？——前309年），战国时魏国人，任秦相时游说各国服从秦国，瓦解齐楚联盟，史称连横。

³⁴⁰⁵ 离朱，相传为黄帝时人。《慎子》：“离朱之明，察秋毫之末于百步之外。”

子升悔于言矣。若曰对人哓哓，退惟多失，愆前毖后，其慎言哉！然吾谓子升，不先有言，何以知失？知失则得，非言之功乎？若诚愆而毖之，子升其难知失也已。故旷日之说，亦不足信也。是故互质参观，所以张知，强聒不舍，可以振国，排揽神废日之说，所以益神而修业，言之为贵，不愈可见乎！然非欲取同于君，求君更正其谬，此弟区区之意所求降鉴者也。夫人之生所遭不齐，惟豪杰之士知殊趋而同至，不型人以合吾之轨，亦不迁己轨以合人之型，此诚至公彻理之谈也。

致萧子升信（一）³⁴⁰⁶

（1915年8月）

天地道藏之邃寫，今古义蕴之奥窅，或蕃变而错综，或散乱而隐约，其为事无域，而人生有程，人获一珠，家藏半璧，欲不互质参观，安由博征而广识哉？夫所谓言以招愆者，此其似矣！虽然，言不能因愆而废，犹食不能因噎而废也。

近写日记一段，命曰《自讼》，子升试一观之，可以悉弟痛艾之衷矣。其言曰：“客告予曰：若知夫匏瓜乎？阳动土暖，茁乙布蔓，缠牵成蔓，不能自伸。苟无人理，则纵横荆棘之颠，播蓐草之内，时序洊至，间吐疏苞，若明若灭。人将指曰：是亦蓐草之类而已。然而秋深叶萎，牧竖过往其间，剔草疏榛，则累累之物，大者如瓮，乃是蔓之瓜也。反而观之，牡丹之在园中，绿萼朱葩，交生怒发，僑皇光晶，争妍斗艳。昧者将曰：是其实之盛大不可限也，而孰知秋至凉归，花则枯矣，实不可得。吾子观于二物，奚取焉？应曰：牡丹先盛而后衰，匏瓜先衰而后盛，一者无终，一者有卒，有卒是取，其匏瓜乎？客曰：虽然，吾观于子一伎粗伸，即欲献于人也，一善未达，即欲号于众也，招朋引类，耸袂轩眉，无静澹之容，有浮嚣之气，姝姝自悦，曾不知耻，虽强其外，实干其中，名利不毁，奢欲日深，道听涂说，揽神丧日，而自以为欣。日学牡丹之所为，将无实之可望，猥用自诡曰：

³⁴⁰⁶ 萧子升（1894年——1976年），又名旭东，湖南湘乡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第三班学生。新民学会发起人之一。曾任国民党北平市党务指导委员。1927年国共分裂后，曾任国民党政府农矿部政务次长等职，后长期旅居国外，在巴拉圭去世。

吾惟匏瓜之是取也，岂不诬哉！予无以答，逡巡而退，潏然汗出，戚然气沮。”

致萧子升信（二）

（1915年9月6日）

闻黎君邵西³⁴⁰⁷好学，乃往询之，其言若合，而条理加详密焉，入手之法，又甚备而完。吾于黎君，感之最深，盖自有生至今，能如是道者，一焉而已。足下好学深思，闻其说未备，嘱转说述，但不能尽惟即耳。苟有一知，敢不效于左右，以答盛意，致其恳恳邪！仆问邵西，学乌乎求？学校浊败，舍之以就深山幽泉，读古坟籍，以建其础，效康氏、梁任公之所为，然后下山而涉其新。邵西不谓然，此先后倒置也。盖通为专之基，新为旧之基，若政家、事功家之学，尤贵肆应曲当。……于是翻然塞其妄想，系其心于学校，惟通识之是求也。此其具体耳，其抽象则如何？下手之方则如何？于是邵西曰，国文者，具清切之艺能，述通常之言事，曲曲写之，能尽其妙，一也。得文章之意味，观古今之群籍，各审其美而靡所阅，二也。今之教者学者皆不然。长，今之所谓通也。异，今之所谓奥也。其实，所谓长者，堆积冗复而已，堆积冗复，不得谓之通；所谓异者，佶聱闷涩而已，佶聱闷涩，不得谓之奥。至于为求学之阶梯，将以观古今之群籍，亦无知与无能焉者矣。历史者，观往迹制今宜者也，公理公例之求为急。一朝代之久，欲振其纲而挈其目，莫妙觅其巨夫伟人。巨

³⁴⁰⁷ 黎邵西，也作劭西，即黎锦熙（1890年——1978年），时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1915年9月赴北京，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教务长、校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等职。

夫伟人为一朝代之代表，将其前后当身之迹，一一求之至彻，于是而观一代，皆此代表人之附属品矣。观中国史，当注意四裔，后观亚洲史乃有根；观西洋史，当注意中西之比较，取于外乃足以资于内也。地理者，空间之问题也，历史及百科，莫不根此。研究之法，地图为要；地图之用，手填最切。地理，采通识之最多者也，报章杂志皆归之。报章杂志言教育，而地理有教育之篇；报章杂志言风俗，而地理有风俗之章。政治、军事、产业、交通、宗教等等，无一不在地理范围之内。今之学者多不解此，泛泛然阅报章杂志，而不知其所归，此所谓无系统者也。体操、图画、音乐、手工者，技能的而美术的也，君子假之，而得为学，养生之道焉。为学奚假乎是？是须有条理有秩序，紊之则无以为条理秩序，以媵吾心而缮吾性，为学之道孰大焉。养生奚假乎是？

致萧子升信（三）

（1915年9月27日）

吾人立言，当以身心之修养、学问之研求为主，辅之政事时务，不贵文而贵质，彩必遗弃，惟取其神。易言之，每为一书，必有益处，言必载物，不然，与庸众人何异？此日如金，甚可爱惜！仆自克之力甚薄，欲借外界以为策励，故求友之心甚热。如足下，诚能策励我者也。×³⁴⁰⁸无他长处，惟守“善与人同”“取人为善”二语，故已有得，未尝敢不告于人；人有善，虽千里吾求之。前望足下上希古人，乃本心也。近以友不博则见不广，少年学问寡成，壮岁事功难立，乃发内宣，所以效嚶鸣而求友声³⁴⁰⁹，至今数日，应者尚寡。

³⁴⁰⁸ 原件此字不显，疑为“仆”字。

³⁴⁰⁹ 1915年秋，毛泽东发出“征友启事”，署名二十八画生（毛泽东三字的繁体共二十八画），意欲结交对学问、时政感兴趣，能耐艰苦，有决心，直至能为国牺牲的朋友。“启事”最后引用《诗·小雅·伐木》中“嚶其鸣矣，求其友声”句。“启事”寄发长沙部分学校，并在信封上注有“请张贴在大家看得见的地方”等字句。应征者有李立三、罗章龙等五六人。

致黎锦熙信

(1916年12月9日)

古称三达德，智、仁与勇并举³⁴¹⁰。今之教育学者以为可配德智体之三言。诚以德智所寄，不外于身；智仁体也，非勇无以为用。且观自来不永寿者，未必其数之本短也，或亦其身体之弱然尔。颜子³⁴¹¹则早夭矣；贾生³⁴¹²，王佐之才，死之年才三十三耳；王勃、卢照邻³⁴¹³或早死，或坐废。此皆有甚高之德与智，一旦身不存，德智则随之而隳矣！夫人之一生，所乐所事，夫曰实现。世界之外有本体，血肉虽死，心灵不死，不在寿命之长短，而在成功之多寡。此其言固矣。然苟身之不全，则先已不足自乐于心，本实先拨矣。反观世事，何者可欣？观卢升之集，而知其痛心之极矣。昔者圣人之自卫其生也，鱼馁肉败不食，《乡党》

³⁴¹⁰ 三达德，见《礼记·中庸》：“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³⁴¹¹ 颜子，即颜渊（前521年——前490年），名回，字子渊，春秋末鲁国人。孔子学生。好学有德，但身体很弱，二十九岁白头，三十一岁即去世。

³⁴¹² 贾生，指贾谊（前200年——前168年），西汉洛阳人，政论家、文学家。文帝时召为博士，颇受赏识，升为太中大夫。敢于提出改革建议，为大臣周勃、灌婴等所排挤，贬为长沙王太傅。后转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坠马死，深感未尽太傅之责，忧惧哭泣，岁余而死，年三十二。

³⁴¹³ 王勃（648年——675年），字子安，唐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文学家。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词齐名，称“初唐四杰”。曾任沛王府修撰，虢州参军。所写《滕王阁序》，脍炙人口。后往交趾探父，因渡海溺水，受惊而死，时方二十八岁。卢照邻（约635年——约689年），即卢升之，号幽忧子。唐幽州范阳（今河北涿县）人。文学家。曾任新都尉。后为风痹症所苦，投颍水而死。后人辑有《幽忧子集》。

一篇载之详矣³⁴¹⁴。孟子曰：知命者不立夫岩之下³⁴¹⁵。有身而不能自强，可以自强而故暴弃之，此食馁败而立岩墙也，可惜孰甚焉！兄之德智美矣，惟身体健康一层，不免少缺。弟意宜勤加运动之功。弟身亦不强，近以运动之故，受益颇多。闻之至弱之人，可以进于至强。……弟始闻体魄、精神不能并完，且官骸肌络及时而定，不复再可改易，今乃知其不然。心身可以并完也，而官骸亦无时不可改易也。

³⁴¹⁴ 见《论语·乡党》：“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饔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唯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

³⁴¹⁵ 见《孟子·尽心》，原文为：“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

体育之研究³⁴¹⁶

(1917年4月1日)

体育在吾人之位置

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顾知之者或寡矣，或以为重在智识，或曰道德也。夫知识则诚可贵矣，人之所以异于动物者此耳。顾徒知识之何载乎？道德亦诚可贵矣，所以立群道平人已者此耳。顾徒道德之何寓乎？体者，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者也，其载知识也如车，其寓道德也如舍。体者，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儿童及年人小学，小学之时，宜专注重于身体之发育，而知识之增进、道德之养成次之；宜以养护为主，而以教授训练为辅。今盖多不知之，故儿童缘读书而得疾病或至夭殇者有之矣。中学及中学以上宜三育并重，今人则多偏于智。中学之年，身体之发育尚未完成，乃今培之者少而倾之者多，发育不将有中止之势乎？吾国学制，课程密如牛毛，虽成年之人，顽强之身，犹莫能举，况未成年者乎？况弱者乎？观其意，教者若特设此繁重之课以困学生，蹂躏其身而残贼其生，有不受者则罚之。智力过人者，则令加读某种某种之书，甘言以饬之，厚赏以诱之。嗟乎，此所谓贼夫人之子欤！学

³⁴¹⁶ 本文署名“二十八画生”，即毛泽东三字繁体共二十八划。1958年3月人民体育出版社曾以同一署名将此文印成单行本，内部发行。1979年8月，《新体育》第八期再次发表，同年12月，人民体育出版社又出单行本，署名均改为毛泽东，同时作了校勘，加了新式标点和注释，并附有白话释文。

者亦若恶此生之永年，必欲摧折之，以身为殉而不悔。何其梦梦如是也！人独患无身耳，他复何患？求所以善其身者，他事亦随之矣。善其身无过于体育。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于吾人研究之中，宜视为重要之部。“学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此之谓也。

体育之效

人者，动物也，则动尚矣。人者，有理性的动物也，则动必有道。然何贵乎此动邪？何贵乎此有道之动邪？动以营生也，此浅言之也；动以卫国也，此大言之也，皆非本义。动也者，盖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已。朱子³⁴¹⁷主敬，陆子³⁴¹⁸主静。静，静也；敬，非动也，亦静而已。老子³⁴¹⁹曰“无动为大”，释氏³⁴²⁰务求寂静，静坐之法，为朱陆之徒者咸尊之。近有因是子³⁴²¹者，言静坐法，自诩其法之神，而鄙运动者之自损其体。是或一道，然予未敢效之也。愚拙之见，天地盖惟有动而已。

动之属于人类而有规则之可言者，曰体育。前既言之，体育之效则强筋骨也。愚昔尝闻，人之官骸肌络及时而定，不复再可改易，大抵二十五岁以后即一成无变，今乃知其不然。人之身盖

³⁴¹⁷ 朱子，即朱熹（1130年—1200年），字元晦，号晦庵，别称紫阳，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南宋哲学家、教育家。曾任秘阁修撰等职。广注经典。哲学上发展二程（程颢、程颐）关于理气关系的学说，集理学之大成，建立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世称程朱学派。

³⁴¹⁸ 陆子，即陆九渊（1139年—1193年），字子静，号存斋，抚州金溪（今属江西）人。南宋哲学家、教育家。官至奉议郎知荆门军。其学受程颢影响较大，与兄九韶、九龄并称“三陆子之学”。提出“心即理”学说，认为“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其学说后由明王守仁继承发展，成为陆王学派。

³⁴¹⁹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周朝人，著《道德经》。

³⁴²⁰ 释氏，指佛教创始者释迦牟尼。

³⁴²¹ 因是子，名蒋维乔，习静坐数十年，著有《因是子静坐法》。

日日变易者：新陈代谢之作用不绝行于各部组织之间，目不明可以明，耳不聪可以聪，虽六七十之人犹有改易官骸之效，事盖有必至者。又闻弱者难以转而力强，今亦知其非是。盖生而强者滥用其强，不戒于种种嗜欲，以渐〈戕〉贼其身，自谓天生好身手，得此已足，尚待锻炼？故至强者或终转为至弱。至于弱者，则恒自闵其身之不全，而惧其生之不永，兢业自持：于消极方面则深戒嗜欲，不敢使有损失；于积极方面则勤自锻炼，增益其所不能。久之遂变而为强矣。故生而强者不必自喜也，生而弱者不必自悲也。吾生而弱乎，或者天之诱我以至于强，未可知也。……又尝闻之：精神身体不能并完，用思想之人每歉于体，而体魄蛮健者多缺于思。其说亦谬。此盖指薄志弱行之人，非所以概乎君子也。……总之，勤体育则强筋骨，强筋骨则体质可变，弱可转强，身心可以并完。此盖非天命而全乎人力也。

非第强筋骨也，又足以增知识。近人有言曰：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此言是也。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夫知识之事，认识世间之事物而判断其理也，于此有须于体者焉。直观则赖乎耳目，思索则赖乎脑筋，耳目脑筋之谓体，体全而知识之事以全，故可谓间接从体育以得知识。今世百科之学，无论学校独修，总须力能胜任。力能胜任者，体之强者也；不能胜任者，其弱者也。强弱分，而所任之区域以殊矣。

非第增知识也，又足以调感情。感情之于人，其力极大。古人以理性制之，故曰“主人翁常惺惺否”，又曰“以理制心”。然理性出于心，心存乎体。常观罢弱之人往往为感情所役，而无力以自拔；五官不全及肢体有缺者多困于一偏之情，而理性不足以救之。故身体健全，感情斯正，可谓不易之理。以例言之：吾人

遇某种不快之事，受其刺〈刺〉激，心神震荡，难于制止，苟加以严急之运动，立可汰去陈旧之观念，而复使脑筋清明，效盖可立而待也。

非第调感情也，又足以强意志。体育之大效盖尤在此矣。夫体育之主旨，武勇也。武勇之目，若猛烈，若不畏，若敢为，若耐久，皆意志之事。取例明之，如冷水浴足以练习猛烈与不畏，又足以练习敢为。凡各种之运动持续不改，皆有练习耐久之益，若长诿〈距〉离之赛跑，于耐久之练习尤著。夫力拔山气盖世³⁴²²，猛烈而已；不斩楼兰誓不还³⁴²³，不畏而已；化家为国，敢为而已；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³⁴²⁴，耐久而已。要皆可于日常体育之小基之。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

肢体纤小者举止轻浮，肤理缓弛者心意柔钝，身体之影响于心理也如是。体育之效，至于强筋骨，因而增知识，因而调感情，因而强意志。筋骨者，吾人之身；知识，感情，意志者，吾人之心。身心皆适，是谓俱泰。故夫体育非他，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已。

³⁴²² 见《史记》卷七《项羽本纪》。原文为“力拔山兮气盖世”。

³⁴²³ 楼兰，是汉时西域的鄯善国，其国王与匈奴统治者勾通，多次截杀汉朝使者，屡犯汉境。傅介子（？——前65年），西汉北地（今甘肃庆阳西北）人。他自请往击楼兰，说不斩楼兰王誓不回来，后来果然带了楼兰王的首级回到汉朝。此处引用唐人王昌龄《从军行》诗句，原为“不破楼兰誓不还”。

³⁴²⁴ 相传夏禹一心治水，在外八年，手足都生了老茧，三次路过自己家门都顾不得进。

为萧子升的《一切入一》自学笔记写的序言

(1917年)

今夫百丈之台，其始则一石耳；由是而二石焉，而三石、四石以至于万石焉。学问亦然。今日记一事，明日悟一理，积久而成学。高以下基，洪由纤起，在乎人之求之而已。等积矣，又有上下偏全之别。庇千山之材而为一台，汇百家之识而为一学，取精用宏，根茂实盛，此与夫执一先生之言而姝姝自悦者，区以别矣。虽然，台积以高，学积以博，可以为至矣，而未也。有台而不坚，有学而不精，无以异乎无台与学也。学如何精，视乎积之道而已矣。积之道，在有条理。

界万有之学而为—科，于—科中，又复剖分为界、为门、为属、为种，秩乎若瀑布之悬岩而振也。今而有志于学，不遵斯道焉，固未可以〈蕲〉³⁴²⁵其精也。虽然，犹未也。博与精非旦暮所能成，然必也有恒矣。曰“日行不怕千万里”。将适千里，及闾门而复，虽屹屹终决不可及，恒不恒之分也。

惟是金沙兼收，小大毕聚，虽美于目，未必可悦于心，则宜有以条理之，絜其瑰宝而绝其淄磷焉；又持之久远，不中途而辍。诚若是，则固百丈之台之基矣，而予又奚疑。

³⁴²⁵ 按：原件难于辨识，此字恐误

夜学日志首卷³⁴²⁶

(1917年11月)

现时学校大弊，在与社会打成两橛，犹鸿沟之分东西。一入学校，俯视社会犹如登天；社会之于学校，亦视为一种神圣不可捉摸之物。相隔相疑，乃成三弊：一为学生不能得职业于社会，学生近之，社会远之，学生亲之，社会离之，永无联结契合之日。一则社会不遣子弟入学校，学校之不善，亦为一因，而社会不悉学校内容，则为最大因。学校之人与社会之人，自来不通情愫，不相告语，虽有良校，彼何由知乎？一则烧校阻款之事由此起也。除去三弊，疏通隔阂，社会与学校团结一气，社会之人视学生如耳目，依其指导而得繁荣发展之益；学生视社会之人如手足，凭其辅佐而得实施所志之益。久之，社会之人皆学校毕业之人，学校之局部为一时之小学校，社会之全体实为永久之大学校。此则千百年后改良进步之成绩，而为吾等创设夜学之意，又一也。

³⁴²⁶ 夜学日志是1917年冬毛泽东主持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友会附设夜学工作时建立的。日志由职员轮流记载，主要记录夜学教学和管理情况。现在保存下来的日志首卷不全，只有1917年11月5日至26日的日志。本篇是毛泽东写的首卷前言。

《湘江评论》创刊宣言³⁴²⁷

(1919年7月14日)

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它的生，逆它的死。如何承受它？如何传播它？如何研究它？如何施行它？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的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³⁴²⁷ 《湘江评论》，五四时期湖南学生联合会周报。毛泽东为主编和主要撰稿人。该报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有“东方大事述评”、“西方大事述评”、“世界杂评”、“湘江大事述评”、“湘江杂评”、“放言”、“新文艺”等栏目。1919年7月14日在长沙创刊，共出5号，每号四开一张，第2号附有“临时增刊”。毛泽东在前4号和临时增刊共发表文章41篇。第3号第4版载有《刊误》，对创刊号和第2号的12处讹误，作了勘正。8月中旬第5号刚印出，未及发行，即被湖南督军兼省长张敬尧查封。收入本书的各篇，所标日期均为出版时间。

各国的罢工风潮

(1919年7月14日)

罢工在他们国里，原是一件常事。政府和财阀，虽然不敢十分轻视劳动者，每当劳动者拿着劳获不均，工时太久，住屋不适，失业无归，种种怨愤不平问题，联合同类，蜂起罢工的时候，也不得不小小给他们一点恩惠。正如小儿哭饿，到着十分伤心，大人也不得不笑着给他一个饼子。但终是杯水车薪，济得甚事。所以广义派³⁴²⁸人，都笑英法的工人是小见识。从老虎口里讨碎肉，是不能够的。

³⁴²⁸ 广义派，指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德国社会民主党成立于1875年，原为德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后来逐渐分化成左、中、右三派。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左派以卡尔·李卜克内西、莎·卢森堡为首，1915年，因出版《国际》杂志，被称为“国际派”；又因1916年出版被称为“斯巴达克通讯”的《政治通讯》刊物，故又称为“斯巴达克派”，中派等反对派于1917年成立德国独立社会党，斯巴达克派作为一个保留着行动自由的派别参加了独立社会民主党，尽管于1918年改组为斯巴达克同盟，但仍未在组织上与其决裂，直到1918年12月30日才正式成立独立的政党——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同盟）。1920年12月，德国共产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左派合并为德国统一共产党。

炸弹暴举³⁴²⁹

(1910年7月14日)

人人知道狠文明狠富足的美国，有“炸弹暴举”同时在八城发生。无政府党蔓延甚广。炸弹爆炸的附近，有匿名揭贴说，“阶级战争”业已〈已〉发生，必待国际劳动界完全胜利，始能停止。炸弹往往埋藏在一些官员的住宅，屋顶上发现人头。可怕可怕！我只挂牵官员人家的一些小姐小孩子，他们晚上何如睡得着？议院里一些钱多因而票多，票多因而当选的议员，还在那里痛诋暴动者，通过严惩案。我正式告诉诸位，诸位的“末日审判”将要到了！诸位要想留着生命，并想相当的吃一点饭，穿一点衣，除非大大的将脑子洗洗，将高帽子除下，将大礼服收起，和你们国里的平民，一同进工厂做工，到乡下种田。

³⁴²⁹ 根据 1919 年 7 月 14 日《湘江评论》创刊号刊印。

不许实业专制³⁴³⁰

(1919年7月14日)

美国工党首领戈泊斯³⁴³¹演说曰，“工党决计于善后事业中有发言权，不许实业专制。”美国为地球上第一实业专制国、托刺斯³⁴³²的恶制，起于此。几个人享福，千万人要哭。实业愈发达，要哭的人愈多。戈泊斯的“不许”，办法怎样？还不知道。但既有人倡言“不许”，即是好现象。由一人口说“不许”，推而至于千万人都说“不许”，由低声的“不许”，推而至于高声的狠高声的狂呼的“不许”，这才是人类真得解放的一日。

³⁴³⁰ 根据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创刊号刊印。署名泽东。

³⁴³¹ 美国工党，指美国劳工联合会，简称劳联，是美国全国性熟练工人的行业工会联合组织，成立于1818年。戈泊斯，今译龚帕斯（1850年——1924年），美国工会的右翼领导人。生于英国，后移居美国。参与组织美国劳工联合会，1886年起任该会终身主席。提倡阶级合作，反对工人进行政治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阻止罢工，拥护战争。

³⁴³² 即托拉斯，大资本之间互相勾结或联合形成的垄断组织形式。由若干生产同类商品的大企业或产品有密切关系的大企业合并组成的。参加托拉斯的企业不仅丧失了商业上的独立性，而且还丧失生产上和法律上的独立性。在托拉斯内，一切有关生产、销售和财务等各方面的业务，均由托拉斯理事会统一处理，而原来的企业则变成了托拉斯的股东。每个资本家在托拉斯内势力的大小，完全由他们拥有的股票的多少来决定。理事会的领导权完全操纵在加入托拉斯的一些最大企业的资本家手中。托拉斯的参加者，只有通过出卖他所持有的股票，才能退出托拉斯。

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

(1919年7月21日)

老先生最不喜欢的是狂妄。岂知道古今真确的学理，伟大的事业，都系一些被人加着狂妄名号的狂妄人所发明创造来的。我们住在这繁复的社会，诡诈的世界，没有批评的精神，就容易会做他人的奴隶。某君谓中国人大半是奴隶，这话殊觉不错。(九)之自由讨论学术，很合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原则。人类最可宝贵，最堪自乐的一点，即在于此。学术的研究，最忌演绎式的独断态度。中国什么“师严而后道尊”，“师说”，“道统”，“宗派”，都是害了“独断态度”的大病。都是思想界的强权，不可不竭力打破。像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

民众的大联合——中华“民众的大联合”的形势³⁴³³

(1919年8月)

世界战争的结果，各国的民众，为了生活的痛苦问题，突然起了许多活动。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驶西突，扫荡了许多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异军特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旌旗南下，过黄河而到长江，黄浦汉皋，屡演活剧，洞庭闽水，更起高潮。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辟易。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

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都要从九重冤狱求见青天。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甚，反抗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先告成功。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地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

³⁴³³ 《民众的大联合》是毛主席发表在《湘江评论》上的最重要的文章，全文共三篇，连载于该刊第2、3、4期，这里是第三篇的选段。原载《湘江评论》第四期。

致黎锦熙信（二）

（1920年3月12日）

弟于吾湘将来究竟应该怎样改革，本不明白。并且湖南是中国里面的一省，除非将来改变局势，地位变成美之“州”或德之“邦”，是不容易有独立创设的。又从中国现下全般局势而论，稍有觉悟的人，应该就从如先生所说的“根本解决”下手，目前状况的为善为恶，尽可置之不闻不问，听他们去自生自灭。这样支支节节地向老虎口里讨碎肉，就使坐定一个“可以办到”，论益处，是始终没有多大的数量的。

怎样去做才有真正的劳工团体出现³⁴³⁴

(1920年12月5至6日)

工人要抬高自己的地位，要脱离〔雇主的压榨〕³⁴³⁵，除了努力奋斗以外，没有别的法子，因为一般雇主，都不是抱人道主义的，哪里肯顾到工人的死活，即如工资一层而论，……雇主不肯依“水涨船高”的话儿，毅然去增加工人工资，弄得他们忍饥挨饿，渐渐不能过活的样子，还不能得到雇主们半点怜惜，所以工人除掉努力向雇主奋斗以外，没有第二个法子。唉！可怜的工人们，自己的问题要自己解决，你们要改善自己的生活，也只有自己起来解决罢了！希望雇主发慈悲心，改善待遇方法，是一种慈善行为，我们羞于接受，而且也是不可能的事，希望人家鼓吹，以达到解放的目的，也是没有效果。我敢断言一句：工人不要改善自己的生活则已，要改善自己的生活，只有“扎硬寨，打死仗”，自己起来奋斗！

但是工人要想和雇主奋斗，应该先有有强固的团体，然后才不致会失败，没有强固的团体，以作后援，贸然向雇主宣战，没有不失败的。中国各地方的劳动者，也屡次发生罢工风潮，结果多半是失败，就是没有强固的团体的缘故。所以现在中国的劳工运动，最要紧的一着，就是赶紧组织一个强固的劳工团体。

³⁴³⁴ 原载长沙《大公报》。

³⁴³⁵ 以上五字原缺，今以意补之

怎样去组织呢？这话说来很长，但扼要地说一句，先要劳工个个有彻底的觉悟。……所以我相信工人教育问题是一切劳工问题的先决问题，工人既然都有彻底的觉悟，而且晓得不是这样，终没有改善自己生活的希望，于是所组织的劳工团体愈加强固。

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³⁴³⁶

(1921年1月1日、2日)

现在国中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显然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改造，一派则主张改良。前者如陈独秀诸人，后者如梁启超、张东荪诸人。

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至用“改造东亚”，不如用“改造中国与世界”。提出“世界”，所以明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侪的下手处；“东亚”无所取义。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至于方法，启民主用俄式，我极赞成。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

社会政策³⁴³⁷，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³⁴³⁸，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

³⁴³⁶ 这是标志着毛泽东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道路的一篇发言。新民学会长沙会员新年大会于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至三日举行，热烈讨论了一九二〇年七月新民学会立法会员在法国蒙达尔尼会议上提出的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以及改造的方法、目的等问题。本篇一是毛泽东一月一日的发言，本篇二是毛泽东一月二日的发言。

³⁴³⁷ 社会政策，指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德国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的一种社会改良主义，后流行于欧美以及日本，二十世纪初传入中国。社会政策的提倡者主张阶级协调，由国家或其他社会力量制订劳动法规，实行社会保险，成立工人组织，兴办福利、救济事业等等，来维护资本主义经济。

³⁴³⁸ 社会民主主义，指二十世纪初期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它反对无产阶级实行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无产阶级走议会道路，宣扬资产阶级民主和阶级调和。五四运动前后，中国也曾有极少数人宣传过这种主义。

阶级的。无政府主义³⁴³⁹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³⁴⁴⁰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³⁴³⁹ 无政府主义，是十九世纪中叶出现于欧洲的一种小资产阶级思潮。它否认任何国家和政权，否认任何权力和权威，鼓吹绝对自由、极端民主，主张建立一个“无命令、无权力、无服从、无制裁”的无政府状态的社会。五四运动前后，这种思潮在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工人中曾经有过较大影响。

³⁴⁴⁰ 罗素（一八七二——一九七〇），英国哲学家、社会活动家。早年加入英国费边社和工党，后又信仰过基尔特社会主义。十月革命后，曾到俄国考察。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一年来中国讲学，先后在北京、长沙等地演说。在这些演说中，他表示相信“共产主义是一种好学说”，主张用“循序渐进的方法来实行”，不赞成“阶级战争”和“平民专制”，认为中国首要的事情是兴办教育和发展实业。罗素的主张在当时中国学术思想界有相当影响。

给蔡和森³⁴⁴¹的信

(1921年1月21日)

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动。我国无研究，但我现在不承认无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证实的原理，有很强固的理由。一个工厂的政治组织（工厂生产、分配、管理等），与一个国的政治组织，与世界的政治组织，只有大小不同，没有性质不同。工团主义以国的政治组织与工厂的政治组织异性，谓为另一回事而举以属之另一种人，不是故为曲说以冀苟且偷安，就是愚陋不明事理之正。况乎尚有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在手段上又有十分必要的理由呢。

³⁴⁴¹ 蔡和森（一八九五——一九三一），湖南湘乡永丰镇（今属双峰县）人。新民学会发起人之一，当时在法国勤工俭学。

所希望于总工会的³⁴⁴²

(1921年11月21日)

为什么独同情于总工会³⁴⁴³？劳工神圣，一切东西都是劳工做出来的，总工会是劳工的团结体，谁也应该同情的。

劳动组合的目的，不仅在团结劳动者以罢工的手段取得优益的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尤在养成阶级的自觉，以全阶级的大同团结，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这是宗旨所在，希望总工会诸君特别注意的。

³⁴⁴² 这是毛泽东在湖南总工会刊物《劳工周刊》上发表的文章。

³⁴⁴³ 湖南总工会是黄爱、庞人铨等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长沙成立的，初创时受到无政府工团主义思想影响，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下旬改组，接受了毛泽东在本文中提出的建议。

更宜注意的问题³⁴⁴⁴

(1922年5月1日)

大家注意，就请注意到劳工的三件事：一、劳工的生存权，二、劳工的劳动权，三、劳工的劳动全收权。工人就有种要求做工的权利。若是工人有力而社会无事可以买他的力事实上工人不得不“赋闲”时，社会就应该本着罪不在工人的理由而给与他们平常的工资，这就是劳动权。

大家注意生存权，就请注意湖南现在有多少人要饿死？大家注意劳动权，就请注意湖南现在有多少人失业？

美其名曰全民政治，实际抛弃了至少百分之九十九的劳工！

³⁴⁴⁴ 这是毛主席在长沙《大公报》上发表的文章。

劳动各团体致参众两院电³⁴⁴⁵

(1922年9月6日)

世界经济之变迁日亟，劳动阶级之觉悟日深，苏俄创立劳农国家，是全世界各国楷模！我劳动者手创文明，本身未受其赐，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虽明文规定人民无阶级之区分，而全国大多数之劳动者，未受法律之保障，且常遭其摧抑。人世不平，孰过于此？今幸劳动立法运动，声振全国，血气之伦，谁不庆幸！须知共和国家，权在全民。舍大多数之劳动阶级而言立法，即不啻抛弃全民！敝部等根据劳动者〔应〕

- (1) 获得政治自由；
- (2) 改良经济生活；
- (3) 参加产业管理；

(4) 得受学习教育四大原则，完全赞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所提出之劳动法案大纲十九条。务恳诸君，一秉正谊，举其天职，从速通过劳动法案，俾我劳动者不致沦为无法之人民，致釀法外之活动，幸甚幸甚！否则诸君不啻自绝于民众，我全国之劳动者不得不奋起神圣之威权，起为一致之团结，为自由而战，为生存而战，为取得应有之权利而战，誓不认公等得代表民意制定宪法也！

³⁴⁴⁵ 原载长沙《大公报》。

粤汉路全体工人致全国各地工团快邮代电³⁴⁴⁶

(1922年9月12日)

万急！全国各地工团亲爱的工友们：

粤汉铁路全体罢工后，有一小部分为局长利用之天津工人，以同乡关系，甘做局长走狗，破坏团体之行动，仍旧行〔文〕局长调请军队保护，以致罢工工人无法应付，不得已而全体睡于铁轨道上，以示阻拦。乃军队受局长之指使，竟惨无人道，肆行杀伤工人。工人之家属往救，军队亦以同样之手段对付，儿啼妇哭，惨不忍闻。受伤者无算，投水者数十人，将至毙命者七八人，就捕者十数人，而岳州工人已死者六人。凡有人心，谁不悲愤！工人等经此残酷杀伤之后，呼号辗转于淫威压迫之下，只有仍旧坚持罢工，誓死不屈。万分恳请各团工友予以实力援助，势必达到：

(1) 撤退弹压工人的军队。(2) 革退并惩办王局长。(3) 抚恤被伤的工人及工人的家属。(4) 完全允许工人提出之条件。各工团劳动的同胞呀！这样黑暗残酷横暴之压迫，完全加于我劳动阶级之身，我们应该是怎样地怨愤、痛恨、奋起？全国的工友们呀！起来呀！向仇人奋斗呀！

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全体工人

湖南全省工团援助京汉路工友通电³⁴⁴⁷

(1923年2月)

京汉铁路为总工会开成立大会，被武力强迫解散而同盟罢工，复遭万恶不赦之军阀曹錕、吴佩孚、萧耀南、张福来等以大队兵士强迫工人上工，致杀死工人三百余人，伤者无数，同时杀死工界首领施洋、吴如明、林祥谦，并封闭京汉路各工会及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查人民集会结社自由，载在约法，该数工会成立有年，成绩昭著，总工会成立自属合法行为，乃工人应有之权利，曹吴等居然用武力解散，已属破坏约法，蹂躏人权，如斯不足，复唆使军队，横加惨杀，强迫上工。似此拥兵作威，草菅人命，诚万世之罪人，人类之公敌也。我等同为工界中人，与京汉路工友有骨肉相连之关系，对此万恶军阀之无理摧残，怒发所指，万众皆然。应此广大群众之要求，“援助京汉铁路委员会”乃告成立，自此当率潇湘数万劳动群众，以与违法惨杀京汉路工友之军阀周旋，誓必复此万世之仇讎，肃清此人类之公敌。爰特通电前来，望即同申公愤，鸣鼓而攻，不然，军阀为恶，日益嚣张，恐我四万万同胞，同为噍类矣！

³⁴⁴⁷ 原载 1923 年 2 月 28 日长沙《大公报》

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致萧耀南电³⁴⁴⁸

(1923年2月20日)

先生指挥所部，杀路工三十二人，冤惨所中，江水为寒矣。先生狐也，假吴子玉虎威以临江汉，鱼肉人民，再接再厉，一战而胜京汉路工，何其勇耶。世曰劳工神圣，先生必曰军阀神圣，以武汉近事观之，军阀则诚神圣矣，然吾闻世界有杀不绝之劳工，未闻有杀不绝之军阀。先生试思先生之左右，除百数十师旅团长镇守使警察长如万恶不赦之杜锡钧何锡藩等辈而外，何一而非吾劳工阶级之同志耶？今日兵士实弹以杀劳工者，明日吾劳工挥泪一为指点，便可反戈以杀军阀。先生则曰乱党，而岂知遍地皆乱党，四万万五千人至少有三万万九千万属乱党也。不务得民，而务残民，不惟自省，而惟多杀，怨愤所积，铤而走险，枯木朽株，尽起为难，天地虽宽，将无先生立足地矣！

³⁴⁴⁸ 见《北方地区工人运动资料选编（1921—1923）》，北京出版社，1981年9月。

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致吴佩孚电³⁴⁴⁹

(1923年2月20日)

京汉路工以要求集会结社自由，惨遭死戮三百余众，近世文明国家所未闻也。国家养兵，所以卫民，今以残民。北起长辛店，南迄武汉，杀声遍地，冤呼震天，先生安坐洛阳，指挥若定，金口决堤，重庆犯顺，方之此役，犹未为勇。吾闻古有民变，今则工变。俄罗斯工变矣，数百年盖世威棱之尼古拉斯，一旦如摧枯拉朽。如德如法如意大利，其军阀政客资本家悉属尼古拉斯第二。先生……遽谓吾拥直鲁豫湘鄂正副巡阅使之尊，人莫予毒，则国人鸣鼓而攻，将随此念以俱至矣。

³⁴⁴⁹ 见《北方地区工人运动资料选编》(1921—1923)北京出版社，1981年9月。

农民问题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 大会决议案³⁴⁵⁰

(1923年6月)

自从各帝国主义以武力强制输入外货以来，一般日用品的价格增高率远超于农产品价格增高率，从前的农民副产品（如纺织等等）也全被摧残。又自辛亥以后，军阀争地盘之战争连年不息，土匪遍于各地，再加以贪官污吏之横征暴敛（如预征钱粮、额外需索等），地痞劣绅之鱼肉把持，以致农民生活更加困难。因此种种压迫。农民自然发生一种反抗的精神，各地农民抗租抗税的暴动，即其明证。故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认为有结合小农佃农雇工以反抗钳制中国之帝国主义者，打倒军阀及贪官污吏，反抗地痞劣绅，以保护农民之利益而促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必要。

³⁴⁵⁰ 见《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

对国民党右派之斗争——中央通告第 15 号

3451

(1924 年 7 月 21 日)

自吾党扩大执行会后，国民党大部分党员对我们或明或暗的攻击、排挤日甚一日，意在排除我们激进分子，以缓和列强及军阀对国民党的压迫。此时国民党之极少数领袖如孙中山、廖仲恺尚未有和我们分裂之决心，然亦决不愿开罪于右派分子，已拟定于秋间召集中央执行委员会，以解决对我们的关系。我们为图革命的势力联合计，决不愿分离的言论及事实出于我方，须尽我们的力量忍耐与之合作。然为国民党革命的使命计，对于非革命的右倾政策，都不可隐忍不加以纠正，我们应做之事如左：

(1) 应由我们所指导的各团体或国民党党部对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表示不满于右派的意见。

右派的重要错误是：

- (2) 不愿反对帝国主义列强；
- (3) 反对中俄协定，并且根本反对苏俄，说是国民党之敌；
- (4) 压迫兵工厂工人自治工会，阻止圣三一学生退学；
- (5) 纵容佛山商团摧残工人农人；
- (6) 排斥共产派。

³⁴⁵¹ 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2月）

（按）此件以陈独秀、毛泽东二人名义发出。署名为：委员长 t.s.Chen、秘书 t.t.Mao。

(7) 我们同志应在国民党各级党部开会时提出左右派政见不同之讨论。

(8) 今后凡非表示左倾的分子，我们不应介绍他入国民党。

(9) 需努力获得或维持“指挥工人农民学生各团体的实权”在我们手里，以巩固我们在国民党左翼之力量，尽力排除右派势力侵入这些团体。

(10) 各地急宜组织“国民对外协会”，一方面是建筑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之中坚，一方面是形成国民党左翼或未来新国民党之结合。……此会为社会运动之一种独立团体，不可与国民党团体混合，尤不可受国民党支配。此协会内万不可容留右倾观念的分子在内。

答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问³⁴⁵²

(1925年11月21日)

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惟目前的内外压迫，非一阶级之力所能推翻，主张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实行中国国民党之三民主义，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买办、地主阶级（即与帝国主义、军阀有密切关系之中国大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右翼），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

³⁴⁵² 少年中国学会由李大钊、王光祈等人发起，一九一九年七月在北京成立。毛泽东于一九二〇年一月参加该学会。学会出版有《少年中国》和《少年世界》等刊物。会员成分复杂，有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及国家主义者。一九二五年学会作出改组决议，并发调查表征求会员对学会宗旨和改进会务的意见，后因意见不统一，改组无法进行而停止活动。

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

(1925 年冬)

前代英、法、德、美、日本各国资产阶级的革命，乃资产阶级一阶级的革命。其对象是国内的封建贵族；其目的是建设国家主义的国家即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其所谓自由、平等、博爱乃当时资产阶级用以笼络欺骗小资产、半无产、无产阶级使为己用的一种策略；其结果是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建设了国家主义的国家；其终极是发展了全世界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造成了国际资本帝国主义。

中国的中产阶级（除开其左翼即中产阶级中历史和环境都有特别情况的人，可与其余阶级合作革命，但人数不多），到现在还在梦想前代西洋的民主革命，还在梦想国家主义之实现，还在梦想由中产阶级一阶级领袖、不要外援、欺抑工农的“独立”的革命，还在梦想其自身能够于革命成功后发展成壮大的资产阶级，建设一个一阶级独裁的国家。他们革命的出发点，与其余阶级革命的出发点完全不同：他们的革命是为了发财，其余阶级的革命是为了救苦；他们的革命是为了准备做新的压迫阶级，其余阶级的革命是为了要得到自己的解放并且使将来永无压迫自己的人。

我们料到在不远的将来情况之下，中间派只有两条路走：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其左翼有此可能），万万没有第三条路。

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³⁴⁵³

(1926年3月18日)

我们知道，凡属一种运动发生，不是无缘无故的，必有客观的条件。查巴黎公社，在中国鸦片战争之后三十年，这三十年中，继续订有《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足证明欧洲各国，已有能力向东方猛烈地发展，已由资本主义进为帝国主义，国内已形成伟大的工人阶级，所以才有此种壮烈的工人革命运动产生。

俄国的十月革命和巴黎公社，是工人阶级以自己的力量，来求人类真正的平等自由，它们的意义是相同的，不过成功与失败不同而已。所以我们可以说：巴黎公社是开的光明的花，俄国革命是结的幸福果——俄国革命是巴黎公社的继承者。

现时国内颇有些人怀疑或反对阶级斗争的，这是不了解人类进化史的缘故。马克思说：“人类的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史。”³⁴⁵⁴这是事实，不能否认的。人类由原始社会进化为家长社会、封建社会以至于今日之国家，无不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阶级斗争的演进。巴黎公社便是工人阶级第一次起来打倒统治阶级的政治的经济的革命。

³⁴⁵³ 这是毛泽东为纪念巴黎公社五十五周年在国民党政治讲习班上的讲演，发表在《中国国民党政治讲习班旬刊》上，原题为《纪念巴黎公社应注意的几点》。

³⁴⁵⁴ 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新译文是：“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一八八八年英文版上，对这句话作了注解，指出“确切地说，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0—25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我们向来读中国史，不注意阶级斗争的事实、其实四千多年的中国史，何尝不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呢？……太平王洪秀全号召广西一班失业农民起来革命，大有社会革命的意义，孙总理也很佩服他。大家只知道打倒他的是清朝政府，而不知真正打倒他的主力军，却是地主阶级。打倒太平天国出力最多的是曾国藩，他当时是地主阶级的领袖。曾国藩是练团练出身，团练即是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武力，他们见洪秀全领导一班农民革命，于他们不利，遂出死力来打倒他。故太平天国之事，不是满汉的战争，实是农民和地主的阶级斗争。

巴黎公社存在不过七十二天，何以失败这样快呢？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没有一个统一的集中的有纪律的党作指挥——我们欲革命成功，必须势力集中行动一致，所以有赖于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党来发号施令。当时巴黎公社，因为没有统一的政党，以致内部意见纷歧，势力分散，而予敌人以可乘之机，这是失败的第一个原因。（二）对敌人太妥协太仁慈——我们对敌人仁慈，便是对同志残忍。巴黎公社，对于敌人不取严厉处置，还容许敌人占住金融机关，调集军队，所以终被敌人覆灭了。各同志要鉴往知来，惩前毖后，千万不要忘记“我们不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敌人便给我们以致命的打击”这句话。我们要革命，便要从此学得革命的方法。

现时帝国主义者欲分散革命势力的联合，极力宣传“赤色的恐怖”，说什么俄国革命杀了整千整万的人，实则只有帝国主义者“白色的恐怖”，才是真的恐怖！所以我们要大声疾呼：“反对白色的恐怖！反对帝国主义者对于无产阶级的大残杀！”

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农民问题丛刊》

序

(1926年9月1日)

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这些道理，一直到现在，即使在革命党里面，还有许多人不明白。

都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应该起来猛击买办阶级，并直接对付帝国主义，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然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

我们预计：全国三万万以上农民群众当中，以十分之一加入农民协会计算，可以得到三千万以上有组织的农民。尤其是南方的湘、粤、赣，北方的直、鲁、豫，中部的鄂、皖几个政治上特别重要的省份，应该下大力从事组织。有了这几个重要省份的农民起来，其余省份的农民便都容易跟着起来。必须到这时候，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才能确实动摇，国民革命才能得着确实的胜利。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宣言³⁴⁵⁵

(1927年)

我们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当这继续二次北伐的革命的高潮中，举行开学典礼，这实在有非常的意义，其意义之重大，简直等于二次北伐誓师。

因为国民革命的目的是打倒外国帝国主义，及铲除国内封建主义势力，所谓封建势力，即军阀及地主阶级土豪劣绅。我们晓得军阀及土豪劣绅就是帝国主义的两只手，帝国主义有了这两只手，就可尽量地销售洋货，贱价收买原料，以剥削广大的中国农民群众。那么广大的农民群众不能起来，形成一个伟大的斗争力量，则中国革命是不可能的。换言之，不号召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实行农村革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基础，不能铲除。所以，农民问题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成了大家不能忽视的革命问题。农民问题之重大，到现在是没有哪一个有勇气敢来否认。谁反对农民运动，谁就是反革命。所以中国国民党为了农民问题，要肃清党内与帝国主义军队妥协的破坏农民运动的右倾分子。为了解决农民问题，要继续二次北伐，扩大农村革命。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使命，是要训练一般能领导农村革命的人材出来，对于农民问题有深切的认识，详细的研究，正确解决的方法，更锻炼着有农运的决心，几个月后都跑到乡间，号召

³⁴⁵⁵ 原载《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纪念特刊》，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农民运动资料》，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

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实行农村革命，推翻封建势力。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可以说是农民革命的大本营。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规约³⁴⁵⁶

(1927年)

农民的生活方式是颇散漫的，几千年来老生活把他们弄成不问政治，指望真命天子出世救人的依赖思想，他们对于地方观念，家族姓氏的观念很深，一切封建社会的坏毛病，都因封建地主的需要而膨胀、发展使之笼罩在农民身上。现在要农民起来，反抗他们根深蒂固的强敌，真是谈何容易！便是我们自己也何尝不是一个从旧社会里出来的人？也何曾能够免除封建制度的影响？我们虽然决心要做一个农民阶级的革命先锋，要为农民的利益牺牲一切，然而我们的身上，已经从旧社会里带来不少的毒菌，这些毒菌随时随地都有阻止我们前进的可能。

同志们！我们从旧社会带来的毒物是什么？我们不是过惯了个人主义的浪漫生活吗？我们不是不大喜欢受团体干涉吗？我们不是不喜欢有纪律有秩序的生活吗？我们队伍中有许多人不免时常假借自由平等的名词来掩盖他们一切的罪过，这些人喜欢崇拜英雄主义，喜欢个人的自由活动，这些人一切的行动一切的批评，常常从他自己个人作出发点，个人的利害关系，随时在他的后头做他的指挥者；他的眼睛每只看见了人和人的关系，看不见群众和客观的事实，这样的最容易变成一个唯心论者。

同志们！我们许多都是从小有产者的阶级出来的，所有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毛病，都很容易丛集在我们身上。上述那些毛病，

³⁴⁵⁶ 见《武汉师院学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专辑》，1981年7月。

我们不是时常犯着吗？这些毛病，最能妨害我们的革命工作。我们虽然是一个具有热烈革命性的青年，仍多少免不了这些东西在身上作怪。现在许多反革命势力，都是从这些封建的制度封建的思想习惯产生出来的。我们的党³⁴⁵⁷最近以前有了一种个人独裁的倾向³⁴⁵⁸，有了老朽腐败的分子在里面作怪，大部分的原因都是因为这个封建制度封建思想习惯存在的原因。

我们的敌人这般凶狠强固，我们的责任这般重大，我们非把我们旧社会带来的毛病痛切地扫除，我们更难免要做一个落伍分子，难免有右倾的危险。

同志们！我们跑来这里，从消极方面，要把我们从封建社会里带来的毛病扫除，从积极方面，我们要学习革命的理论 and 实际；这样，我们才可以变成一个很好的有效率的革命工具，才可以达到我们的目的，完成我们的责任。

为要改正浪漫的个人活动，并且为将来发展农民武装起见，所以要受严格的军事训练。大家要深切明了这个意义，如以为这是要用军事的力量来干涉我们的生活，不接受这种严格的军事训练，便是对革命没有诚意，便是并不想要造成一个真正的革命党员，是一种极大的错误。

³⁴⁵⁷ 指国民党

³⁴⁵⁸ 指蒋介石擅权

阳新赣州死难烈士追悼大会宣言³⁴⁵⁹

(1927年3月26日)

我们被压迫的农工民众们，难道我们生来就应该受特殊阶级——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资本家的摧残、剥削吗？难道我们是固定地要做他们的奴隶、牛马吗？要杀我们就杀我们，要我们坐牢狱，我们就坐牢，我们若是稍有点反抗的表示，那就所谓“大逆不道”、“废弃纲常”，咳！这真是人类的禽兽世界啊！这种狠毒、残酷的压迫，使我们真是忍无可忍了，所以近来被压迫的农友、工友，皆奔腾呼号地起来组织农民协会、工会，为解除自己的痛苦而奋斗，毒忍的封建阶级、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他们为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剥削、榨取，就大起恐慌了。不是是说我们“过火”、“胡闹”，就是说我们“流氓”、“地痞”、“土匪”，这种挑拨的手段，想使我们成为众人之敌。继续他们的最后挣扎，更进一步地向我们农工民众进攻。于是演出阳新、沔阳、天门、汉川与赣州、九江流血的惨剧。阳新、沔阳等地的惨案，是乡村的反革命的封建势力——贪官恶吏、土豪劣绅、大地主向革命势力——农民协会的进攻，甚至用洋油烧死农民领袖，共计在六人以上。这种惨不忍闻的消息，是何等的令人痛心啊！

赣州、九江流血的惨剧，是假革命、反革命派向革命势力工人群众的进攻，枪毙工人的领袖。最可恨怜的是枪毙工人领袖的凶首是蒋介石部下暂编第一师〔国民〕党代表和蒋介石的卫兵。

³⁴⁵⁹ 原载《汉口国民日报》，1927年3月28日—29日。

这种流血的惨剧，蒋介石是不能不负责任的。贫苦而且最受侮辱、最受压迫的农工兄弟们，反革命势力已经联合起来很凶恶地向我们进攻了，并且他们进攻的手段非常的毒辣，现在我们是处在生死的关头了。如不拼命团结努力和他们奋斗，那么我们就没有活命的日子了。我们要认清楚，我们的地位，我们的环境，现在已经是短兵相接的时期了，我们要向那反动势力的黑暗屏障继续不断地进攻，早晚必能得到光明的途程的。

在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³⁴⁶⁰

(1927年4月19日)

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有：（一）使农民得解放。废除地主及一切压迫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实为本题的主要意义。（二）土地问题不解决，经济落后的国家不能增加生产力，不能解决农民的生活痛苦，不能改良土地。据俄同志³⁴⁶¹调查，我国土地生产力日见衰落，全国生产力已到了一个大危机，此危机不解决，必起绝大的饥荒。土地问题不解决，农民无力改良土地，生产必至日减。故第二个意义为增加生产。（三）保护革命。革命势力目前虽见发展，但亦即到了一个危机，此后非有一支生力军必归失败。要增加生力军保护革命，非解决土地问题不可。其作用，在解决土地问题后即能够解决财政问题及兵士问题。兵士能否永久参加革命，亦即在土地问题解决，因农民要保护他们的土地，必勇敢作战。这三点是解决土地问题的重要意义。

现在关于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可再加三项：（一）废除封建制；（二）发展中国工业；（三）提高文化。

³⁴⁶⁰ 这是毛泽东在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讨论“农民政权”、“解决土地问题之意义”等问题时的五次发言。这个会议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九日下午在汉口举行。

³⁴⁶¹ 指苏联土地问题专家岳尔克和达哈诺夫。

讨蒋通电³⁴⁶²

(1927年4月22日)

顷阅蒋中正巧日通电，知其已由反抗〔国民党〕中央进于另立中央。蒋中正此种阴谋，警之已久，由其平日以中央为傀儡。及见中央所为不便于一己之私，于是始则纠集督军团式之会议以图反抗，继则纠集西山会议式之会议以谋分裂。同人对于蒋中正此种阴谋，虽早已觉察，惟调处已迟，及今横决，始谋堤障，实所疚心。蒋中正通电辞气之间，犹以劳苦功高自矜，试问自北伐以来，牺牲无量数同志之血，是否为蒋中正一人成就功名？〔晚近〕吴佩孚张作霖辈，以战事自矜，颐指政府，其结果遂使北京致陷于无政府之状态。蒋中正欲师其故智，其如革命的民众已非复可欺，徒见其不自量而已。同人等有欲为革命的民众告者：蒋中正所以反抗中央，自立中央，自其抵沪以来，首与帝国主义妥协，不惜拾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张宗昌之余唾，以反共产口号，博其欢心，更不惜屠杀民众，为其〔进〕见之礼物。明知此种行为，必中央所不许，故不得不出于反抗中央之途。对于蒋中正不附逆之军队，则以总司令名义骗之出战，而绝其援应，委之于敌。对于军队中政治工作人员，则随意逮捕，拘囚杀害；对于各省市党员，则嗾使走狗横加摧毁。迨至异己皆去，狡窟已成，则悍然自立中央而无所顾忌。于是一切帝国主义之工具，皆麇集于其旗

³⁴⁶² 原载汉口《国民日报》。此件由国民党中央委员宋庆龄、何香凝、吴玉章、林祖涵、恽代英、毛泽东，以及汪精卫、孙科、宋子文等多人联名发出。

帜之下，以从事反革命。一切革命分子，皆被以共产或勾结共产党之名，除之务尽。今已开始进行，将来必变本加厉。东南革命基础，由之崩坏，革命群众，将无噍类。凡我群众及我同志，尤其武装同志，如不忍革命垂成之功，堕于蒋中正之手，唯有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蠹贼。

在中央紧急会议上的发言³⁴⁶³

(1927年8月7日)

广大的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

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以后上级机关应尽心听下级的报告，然后才能由不革命的转入革命的。

³⁴⁶³ 这是毛泽东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在汉口举行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上的一次发言。

一九二七年四月和七月，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背叛孙中山所决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政策，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归于失败。八七会议在中国革命的这个紧急关头，坚决地纠正了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

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³⁴⁶⁴

(1929年4月5日)

在大混乱的现局之下，只有积极口号积极精神才能领导群众。党的战斗力的恢复也一定要在这种积极精神之下才有可能。

我们要反对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的恶劣倾向，但取消主义和不动主义的倾向又要极力防止。

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与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展是一天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力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用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

³⁴⁶⁴ 这是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这次代表大会是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的，所以这个决议又称“古田会议决议”。决议共分八个部分，第一部分经毛泽东校阅，编入一九五一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题为《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给林彪的信

(1929年6月14日)

党内有争论问题发生是党的进步，不是退步。只有赶快调和敷衍了事，抹去了两方的界线，以归到庸俗的所谓大事化为小事才是退步。

共产主义者的思想和行动总要稍为科学一点才好，而一部分同志则恰恰与科学正相反对。

我们是唯物史观论者，凡事要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才能得到真相。

讨论到个人思想时，不要忘记他的出身、教育和工作历史，这是共产主义者的研究态度。四军党内显然有一种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途的，是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我们必须和这种思想（主要的是思想问题，其余是小节）奋斗，去克服这种思想，以求红军彻底改造，凡有障碍腐旧思想之铲除和红军之改造的，必须毫不犹豫地反对之，这是同志们今后奋斗的目标。

反对本本主义³⁴⁶⁵

(一九三〇年五月)

一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这不太野蛮了吗？一点也不野蛮。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瞎说一顿之不能解决问题是大家明了的，那末，停止你的发言权有什么不公道呢？许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么？

要不得！

要不得！

注重调查！

反对瞎说！

二 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么？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

³⁴⁶⁵ 本文选自《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一九六四年版。另外，从《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中补充了注释一条。

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换一句话说，他一定要产生错办法和错主意。

许多巡视员，许多游击队的领导者，许多新接任的工作干部，喜欢一到就宣布政见，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指手画脚地说这也不对，那也错误。这种纯主观地“瞎说一顿”，实在是最可恶没有的。他一定要弄坏事情，一定要失掉群众，一定不能解决问题。

许多做领导工作的人，遇到困难问题，只是叹气，不能解决。他恼火，请求调动工作，理由是“才力小，干不下”。这是懦夫讲的话。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³⁴⁶⁶，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未出门时脑子是空的，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一定要出门么？也不一定，可以召集那些明了情况的人来开个调查会，把你所谓困难问题的“来源”找到手，“现状”弄明白，你的这个困难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

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三 反对本本主义

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着这种心理。不谓共产党内讨论问题，也还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

³⁴⁶⁶ 见《论语·八佾第三》。原文是：“子入太庙，每事问。”

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指示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为什么党的策略路线总是不能深入群众，就是这种形式主义在那里作怪。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

本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法也同样是最危险的，甚至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中国有许多专门从书本上讨生活的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共产党员，不是一批一批地成了反革命吗，就是明显的证据。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读过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许多人，成了革命叛徒，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常常能够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怎样纠正这种本本主义？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

四 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

你不相信这个结论么？事实要强迫你信。你试试离开实际调查去估量政治形势、去指导斗争工作，是不是空洞的唯心的呢？这种空洞的唯心的政治估量和工作指导，是不是要产生机会主义

错误，或者盲动主义错误呢？一定要弄出错误。这并不是他在行动之前不留心计划，而是他于计划之前不留心了解社会实际情况，这是红军游击队里时常遇见的。那些李逵³⁴⁶⁷式的官长，看见弟兄们犯事，就懵懵懂懂地乱处置一顿。结果，犯事人不服，闹出许多纠纷，领导者的威信也丧失干净，这不是红军里常见的么？

必须洗刷唯心精神，防止一切机会主义盲动主义错误出现，才能完成争取群众战胜敌人的任务。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

五 社会经济调查，是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接着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

为什么要作社会经济调查？我们就是这样回答。因此，作为我们社会经济调查的对象的是社会的各阶级，而不是各种片断的社会现象。近来红军第四军的同志们一般的都注意调查工作了³⁴⁶⁸，但是很多人的调查方法是错误的。调查的结果就像挂了一篇狗肉账，像乡下人上街听了许多新奇故事，又像站在高山顶上观察人民城郭。这种调查用处不大，不能达到我们的主要目的。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要明了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情况。我们调查所要得到的结论，是各阶级现在的以及历史的胜衰荣辱的情况。举例来说，我们调查农民成份时，不但要知道自耕农，半自耕农，

³⁴⁶⁷ 李逵是中国著名小说《水浒传》所描写的北宋末年农民战争中的一个英雄人物。他朴直豪爽，对农民革命事业很忠诚，但是处事鲁莽。

³⁴⁶⁸ 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调查工作，把进行社会调查作为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和决定政策的基础。在毛泽东同志的倡导下，红军第四军的调查工作逐渐地开展起来。毛泽东同志还把进行社会调查规定为工作制度，红军政治部制订了详细的调查表，包括群众斗争状况、反动派状况、经济生活情况和农村各阶级占有土地的情况等项目。红军每到一个地方，都首先要弄清当地的阶级关系状况，然后再提出切合群众需要的口号。

佃农，这些以租佃关系区别的各种农民的数目有多少，我们尤其要知道富农，中农，贫农，这些以阶级区别阶层区别的各种农民的数目有多少。我们调查商人成份，不但要知道粮食品业、衣服业、药材业等行业的人数各有多少，尤其要调查小商人、中等商人、大商人各有多少。我们不仅要调查各业的情况，尤其要调查各业内部的阶级情况。我们不仅要调查各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要调查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我们的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那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那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那些阶级是要打倒的。我们的目的完全在这里。

什么是调查时要注意的社会阶级？下面那些就是：

工业无产阶级

手工业工人

雇农

贫农

城市贫民

游民

手工业者

小商人

中农

富农

地主阶级

商业资产阶级

工业资产阶级

这些阶级（有的是阶层）的状况，都是我们调查时要注意的。在我们暂时的工作区域中所没有的，只是工业无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其余都是经常碰见的。我们的斗争策略就是对这许多阶级阶层的策略。

我们从前的调查还有一个极大的缺点，就是偏于农村而不注意城市，以致许多同志对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这二者的策略始终模糊。斗争的发展使我们离开山头跑向平地了³⁴⁶⁹，我们的身子早已下山了，但是我们的思想依然还在山上。我们要了解农村，也要了解城市，否则将不能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

六 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我们的斗争目的是要从民权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我们的任务第一步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发动农民群众和城市贫民，打倒地主阶级，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政权，完成民权主义革命。由这种斗争的发展，跟着就要执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这些伟大的革命任务的完成不是简单容易的，它全靠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倘若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策略是错误的，或者是动摇犹豫的，那末，革命就非走向暂时的失败不可。须知资产阶级政党也是天天在那里讨论斗争策略的，他们的问题是怎样在工人阶级中传播改良主义影响，使工人阶级受他们的欺骗，而脱离共产党的领导，怎样争取富农去消灭贫农的暴动，怎样组织流氓去镇压革命等等。在这样日益走向尖锐的短兵相接的阶级斗争的形势之下，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就完全要靠他的政

³⁴⁶⁹ 山头指江西、湖南边界的井冈山地区，平地指江西南部、福建西部的平原。一九二九年一月，毛泽东同志率领红军第四军的主力，自井冈山出发，向江西南部、福建西部进军，开辟了赣南、闽西两大革命根据地。

党——共产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那些具有一成不变的保守的形式的空洞乐观的头脑的同志们，以为现在的斗争策略已经是再好没有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本本”³⁴⁷⁰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这种保守路线如不根本丢掉，将会给革命造成很大损失，也会害了这些同志自己。红军中显然有一部分同志是安于现状，不求甚解，空洞乐观，提倡所谓“无产阶级就是这样”的错误思想，饱食终日，坐在机关里面打瞌睡，从不肯伸只脚到社会群众中去调查调查。对人讲话一向是那几句老生常谈，使人厌听。我们要大声疾呼，唤醒这些同志：

速速改变保守思想！

换取共产党人的进步的斗争思想！

到斗争中去！

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

³⁴⁷⁰ 指一九二八年七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案，其中包括政治决议案、农民问题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和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等等。一九二九年初，红军第四军前敌委员会曾经把这些决议案汇印成单行本，发给红军和地方的党组织。

七 调查的技术

(1) 要开调查会作讨论式的调查

只有这样才能近于正确，才能抽出结论。那种不开调查会，不作讨论式的调查，只凭一个人讲他的经验的方法，是容易犯错误的。那种只随便问一下子，不提出中心问题在会议席上经过辩论的方法，是不能抽出近于正确的结论的。

(2) 调查会到些什么人？

要是能深切明了社会经济情况的人。以年龄说，老年人最好，因为他们有丰富的经验，不但懂得现状，而且明白因果。有斗争经验的青年人也要，因为他们有进步的思想，有锐利的观察。以职业说，工人也要，农民也要，商人也要，知识分子也要，有时兵士也要，流氓也要。自然，调查某个问题时，和那个问题无关的人不必在座，如调查商业时，工农学各业不必在座。

(3) 开调查会人多好还是人少好？

看调查人的指挥能力。那种善于指挥的，可以多到十几个人或者二十几个人。人多有人多的好处，就是在做统计时（如征询贫农占农民总数的百分之几），在做结论时（如征询土地分配平均分好还是差别分好），能得到比较正确的回答。自然人多也有人多的坏处，指挥能力欠缺的人会无法使会场得到安静。究竟人多人少，要依调查人的情况决定。但是至少需要三人，不然会囿于见闻³⁴⁷¹，不符合真实情况。

³⁴⁷¹ 囿（音佑）：局限、被限制。囿于见闻：局限于知道的东西。

(4) 要定调查纲目

纲目要事先准备，调查人按照纲目发问，会众口说。不明了的，有疑义的，提起辩论。所谓“调查纲目”，要有大纲，还要有细目，如“商业”是个大纲，“布匹”，“粮食”，“杂货”，“药材”都是细目，布匹下再分“洋布”，“土布”，“绸缎”各项细目。

(5) 要亲身出马

凡担负指导工作的人，从乡政府主席到全国中央政府主席，从大队长到总司令，从支部书记到总书记，一定都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因为二者是两回事。

(6) 要深入

初次从事调查工作的人，要作一两回深入的调查工作，就是要了解一处地方（例如一个农村、一个城市），或者一个问题（例如粮食问题、货币问题）的底里。深切地了解一处地方或者一个问题了，往后调查别处地方、别个问题，便容易找到门路了。

(7) 要自己做记录

调查不但要自己当主席，适当地指挥调查会的到会人，而且要自己做记录，把调查的结果记下来。假手于人是不可行的。

《兴国调查》前言

(1931年1月26日)

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面想像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过去红色区域弄出了许多错误，都是党的指导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原故。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需。

其实没有这种调查，就没有农村的基础概念。

普遍地举办《时事简报》³⁴⁷²

(1931年3月)

井里虾蟆井里跳的现象，依然在群众中保持着。同志们，这种现象是不好的。这种现象引导群众把斗争的热情降低下去，引导群众走向保守局面上去。这是和扩大斗争、争取全国胜利的任务相冲突的。

³⁴⁷² 这是毛泽东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写的关于在红色区域普遍地举办《时事简报》的通令和怎样办《时事简报》的小册子。

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

(1931年4月2日)

过去许多地方往往忽视实际事实的调查，只凭自己空想去决定工作计划，去指导下级工作，结果计划是行不通的，指导是错了的。

我们的口号是：

- 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
- 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³⁴⁷³

(1933年6月)

查田运动的策略，是以工人为领导者，依靠贫农，联合中农，去削弱富农，消灭地主。

联合中农，是土地革命中最中心的策略，中农的向背，关系土地革命的成败。

³⁴⁷³ 查田运动，是当时革命根据地内在分配土地后进行的一种群众运动，目的是清查漏划的地主、富农，按照当时的土地法没收和分配他们的土地、财产。

长冈乡调查³⁴⁷⁴

(1933年11月)

劳动力的有组织的调剂，成为生产上的中心问题，因此群众热烈地欢迎劳动互助社。

劳动互助社在农业生产上伟大的作用，长冈乡明显地表现出来了。根据群众的意愿，以村为单位统筹生产，一切地方都可实行，特别在扩大红军数多的地方。必要时还可以乡为单位，甚至以区为单位统筹，上杭才溪区就是这样做的。

³⁴⁷⁴ 一九三四年一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曾将这个调查报告的油印单行本发给参加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单行本的题目是《乡苏工作的模范（一）——长冈乡》。在正文前面毛泽东注有：

“长冈乡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八日）谢昌宝主席（塘背村）

李求应代表（长冈村）

王先怀贫农团主任（新溪村）

下面的材料是从这三个同志收集的。”

关于战略方针和作战指挥的基本原则³⁴⁷⁵

(1935年12月23日)

一般原则（不论防御时或进攻时）：

1、反对只“打”不“走”的拚命主义，又要打，又要走，自然走是为了打的。战争方式的游击性，即没有固定战线，这是由于技术条件落后而决定的中国红军作战的特点，也正是过去军事指导的长处。在这里反“游击主义”是错了的。第五次反“围剿”中企图建立固定战线是失败了。拿这一战线的暂时失利（地方被占）换得别一战线的胜利，这一战线的问题也就可以解决了（地方是可以恢复的）。

2、争取这种可能，迅速改变红军的技术条件，使没有固定战线的状态改变为一般有固定战线的状态，运动战还是运动战，但大大减少了游击性。没有这个现代的条件，要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是不可能的，对于改变技术条件的消极是不对的。

3、运动战是基本原则，反对“不让寸土”的保守主义的阵地战，主力红军大踏步进退是不可避免的、需要的。

4、集中兵力于主要方向，战略上一个拳头打人，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消灭战；反对分兵主义，反对两个拳头主义，反对战略上的“全线出击”，反对击溃战（战略的及一般战役的）。

³⁴⁷⁵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起草的关于军事战略问题决议的前两部分。

5、战略的持久战，战役的速决战，反对战役持久战，反对“拚消耗”。

6、要有充分的休息训练，反对无益的急，学习必要的慢。

7、要有充分的战斗准备。

8、依情况决定指挥方法，统一决心下的分割指挥是容许的、需要的。

9、拿战略方针去指导战役战术方针，把今天联结到明天，把小的联结到大的，把局部联结到全体，反对走一步看一步。

10、军事委员会在军事范围内有完全的权力。

与斯诺关于特别问题的谈话³⁴⁷⁶

(1936年7月23日)

我问：你怎样解释在极大的不平均的情势下红军的屡次胜利？什么是它无敌的秘诀？

毛答：有三个原因。第一，红军是人民的军队，他们以一切的方法拥护它。它不能被消灭，除非先将拥护它的爱戴它的人民消灭。同时当白军在红色区域作战的时候，他们不仅是与红军作战，而是与苏区的整个人民作战。

第二，我们的存在多亏了共产党正确的战略与战术领导。

第三，红军的指挥员是有才能，正确、精明、忠实、诚恳。每个红军指挥员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接受南京所颁布的贿赂和奖金，发一笔财不再干了，但至今九年的战争经过中，向国民党出卖的共产党员，屈指数起来并没有几个。

我问：在中国赤色运动胜利成功的时候，你是不是认为革命会迅速发生于别的亚洲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如朝鲜、安南、菲律宾、印度等处？目前中国是不是达到世界革命的“钥匙”？

毛答：中国革命在世界情势中占着钥匙的因素，它的胜利是每个国家的人民，特别是殖民地的劳苦群众所热忱期待着的，当中国革命获得了充分的威力，许多殖民地国家的群众将跟着中国的前例，以获得他们自己的胜利。

³⁴⁷⁶ 原载斯诺著、思三译《中国的新西北》，平凡书店，1937年5月。

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

(1936年7月、9月)

只有在中国取得真正的独立和民主之后，才有可能把大量外资用于大规模地发展生产事业；也只有自由的中国，由于生产性经济的广泛发展，才能够偿还这种外国投资的本金和利息。

人民政府如果建立起来，外国借款和外国投资应就只能被用来发展中国经济生活中的基本生产能力——特别是在全国范围内建设基础工业和引进科学的农业方法和农业组织。同南京的政策相反，对影响中国独立政治权利的外国投资，一概不予承认。

美国将觉悟到它在太平洋的真正责任是同直接威胁美国理想和利益的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

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

(1936年8月25日)

贵党五中全会“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的对外政策，并没有作彻底的改变，这对于全国爱国人民，不能不是非常失望的。

在全国人民看来，和平早已绝望，牺牲早已到了最后关头，除了发动全国人民全国武装力量的坚决的自卫战争外，中国领土主权的全部沦亡是无法挽救的。

让那些汉奸卖国贼以及一切无气节的奴才们，在日本帝国主义暴力前面高喊“中国无力抗日”吧！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子孙是誓不投降，誓不屈服的！我们要为大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奋斗到最后一滴血！中国决不是阿比西尼亚！四万万五千万人的中华民族，终会有一天在地球上的东方，雄壮地站起来，高举着民族革命最后胜利的旗帜，同全世界一切自由解放的民族携手，连那个帝国主义成分除外的日本民族也在内，统治着整个的地球，统治着光明灿烂的新世界！让我们的敌人在我们的联合战线面前发抖吧，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

特立³⁴⁷⁷六十岁生日写的贺信

(1937年1月30日)

徐老同志：

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³⁴⁷⁸，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当革命失败的时候，许多共产党员离开了共产党，有些甚至跑到敌人那边去了，你却在一九二七年秋天加入共产党，而且取的态度是十分积极的。从那时至今长期的艰苦斗争中，你比许多青年壮年党员还要积极，还要不怕困难，还要虚心学习新的东西。什么“老”，什么“身体精神不行”，什么“困难障碍”，在你面前都降服了。而在有些人面前呢？却做了畏葸不前的借口。你是懂得很多而时刻以为不足，而在有些人本来只有“半桶水”，却偏要“淌得很”。你是心里想的就是口里说的与手里做的，而在有些人他们心之某一角落，却不免藏着一些腌腌臢臢的东西。你是任何时候都是同群众在一块的，而在有些人却似乎以脱离群众为快乐。你是处处表现自己就是服从党的与革命的纪律之模范，而在有些人却似乎认为纪律只是束缚人家的，自己并不包括在内。你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而在有些人却是出风头第一，休息第一，与自己第一。你总是拣难事

³⁴⁷⁷ 徐特立（一八七七——一九六八），湖南长沙人。当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

³⁴⁷⁸ 徐特立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九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期间，毛泽东曾在那里求学。

做，从来也不躲避责任，而在有些人则只愿意拣轻松事做，遇到担当责任的关头就躲避了。所有这些方面我都是佩服你的，愿意继续地学习你的，也愿意全党同志学习你。当你六十岁生日的时候写这封信祝贺你，愿你健康，愿你长寿，愿你成为一切革命党人与全体人民的模范。

抗日民主与北方青年³⁴⁷⁹

(1937年5月15日)

抗日要全国人民参加，没有民主则老百姓不能参加，无和平团结，无人民参加，抗战成为不可能，即战亦不能保证胜利。所以民主制度为对日抗战胜利之必要条件，非它不可。我们所以把民主问题强调起来，为的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³⁴⁷⁹ 这是毛泽东和美国进步记者尼姆·韦尔斯的谈话。

关于十五年来党的路线和传统问题³⁴⁸⁰

(1937年6月5日)

这些错误不断地发生，也不不断地被克服，有些则至今还没有彻底克服。党就从历来有过的各种“左”右倾原则错误的发生与克服的斗争中锻炼出来，成长壮大起来，也因此得到革命的成绩。如果没有（这是不可能的）或少些（这是可能的）大的小的带原则性的错误，成绩当然不只今天这样，这是以后的殷鉴。而这些错误都是不符合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的，要纠正或要避免，必须借助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革命的科学之真正深刻的了解。

现在还存在着将来也会要发生的错误，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给以解决与给以防止。这就是我们党的理论与实际的发展观。

有了正确的传统习惯，是否还容许有若干问题上的错误的传统习惯呢？这是容许的。正确的东西中间可能包含错误的东西，只是多一些少一些之别罢了，因为社会有黑暗面，党内往往也有黑暗面。

³⁴⁸⁰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的《群众工作问题》发言的一部分。

关于差别和矛盾问题³⁴⁸¹

(1937年)

“差别不是矛盾”的说法不对。应说一切差别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差别是世上一切事物，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故差别就是矛盾，这就是所谓具体的矛盾。

³⁴⁸¹ 这是毛泽东一九三七年九月阅读艾思奇所著《哲学与生活》一书时写的一段批注。

这段批注写在《哲学与生活》中以下一段文字后面：“差别的东西不是矛盾，例如笔，墨，椅子不是矛盾。但如果懂得推移和变化的原理，就知差别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化为矛盾，倘若某两件差别东西同时同地在一起且发生互相排斥的作用时，就成为矛盾了。例如店员与作家本无矛盾的，如果某店员有了写作兴趣而想成为作家时，二者就在统一体里互相排斥，也就成为矛盾了。……”

论鲁迅³⁴⁸²

(1937年10月19日)

我们今天纪念鲁迅先生，首先要认识鲁迅先生，要懂得他在中国革命史中所占的地位。我们纪念他，不仅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尤其在他的晚年，表现了更年青的力量。他一贯地不屈不挠地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在敌人压迫他、摧残他的恶劣的环境里，他忍受着，反抗着，是充满了艰苦奋斗的精神的。

鲁迅是从正在溃败的封建社会中出来的，但他会杀回马枪，朝着他所经历过来的腐败的社会进攻，朝着帝国主义的恶势力进攻。他用他那一支又泼辣，又幽默，又有力的笔，画出了黑暗势力的鬼脸，画出了丑恶的帝国主义的鬼脸，他简直是一个高等的画家。他近年来站在无产阶级与民族解放的立场，为真理与自由而斗争。鲁迅先生的第一个特点，是他的政治的远见。他用望远镜和显微镜观察社会，所以看得远，看得真。

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鲁迅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他的斗争精神。……他在黑暗与暴力的进袭中，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

³⁴⁸²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他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决不中途投降妥协。有些不彻底的革命者起初是参加斗争的，后来就“开小差”了。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最初大家都是左的，革命的，及到压迫来了，马上有人变节，并把同志拿出来献给敌人作为见面礼。鲁迅痛恨这种人，同这种人做斗争，随时教育着训练着他所领导下的文学青年，教他们坚决斗争，打先锋，开辟自己的路。

鲁迅的第三个特点是他的牺牲精神。他一点也不畏惧敌人对于他的威胁、利诱与残害，他一点不避锋芒地把钢刀一样的笔刺向他所憎恨的一切。他往往是站在战士的血痕中，坚韧地反抗着、呼啸着前进。鲁迅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他丝毫不妥协，他具备坚决的心。他在一篇文章³⁴⁸³里，主张打落水狗。他说，若果不打落水狗，它一旦跳起来，就要咬你，最低限度也要溅你一身的污泥。所以他主张打到底。他一点没有假慈悲的伪君子的色彩。我们要学习鲁迅的这种精神，把它运用到全中国去。

综合上述这几个特点，形成了一种伟大的“鲁迅精神”。鲁迅的一生就贯穿了这种精神。所以，他在文艺上成了一个了不起的作家，在革命队伍中是一个很优秀的很老练的先锋分子。我们纪念鲁迅，就要学习鲁迅的精神，把它带到全国各地的抗战队伍中去，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

³⁴⁸³ 指鲁迅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写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发表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莽原》半月刊第一期。

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袭击³⁴⁸⁴

(1938年1月11日)

袭击是游击战争的基本作战形式。

游击战争不能一刻离开民众，这是最基本的原则。讲到战术，则游击战争的基本作战形式不是别的，乃是袭击。袭击是攻击的一种，游击战争不注重正规的阵地攻击这种形式，而注重突然袭击或奇袭的这种形式，这是因为游击战争是战略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非如此不能达到目的。

游击战争袭击战术的要领，一般地可以举出如下十二条：

第一，袭击的基本原则，就是要有秘密而周详的计划，迅速而突然的动作。

第二，游击战争袭击的目的，总的方面，在于消灭小敌，削弱大敌，扰乱敌之侧翼与后方，配合游击部队之政治工作，破坏敌之政权，唤起民众起来抗敌，保持或恢复抗日政权，由此以创造抗日战争的游击根据地，配合正规军作战，因缴获武装使游击队逐渐发展成为抗日的正规军。至于袭击的具体目的，则在各个消灭敌之小部队，扰乱敌之大部队，消灭敌之民团，破坏敌之后方机关，破坏敌之交通路等等。

第三，袭击要选择有利于袭击的条件。无此条件或条件不足时则须注意造成之。这在许多时候是可能的，只须根据敌人部队

³⁴⁸⁴ 这是毛主席1934年所著《游击战争》一书中论游击战术的一部分。八路军120师359旅旅长陈伯钧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期间曾作节录，后经毛主席修改校正，发表于《解放》第28期。

的素质、指挥者的个性以及其战术的运用等，而采用如下的办法：

(1) 骄纵敌人。例如故意以战斗力不强之游击小队与敌周旋，使敌以为不要紧，而在敌人不防备时突然袭击之。(2) 麻痹与迷惑敌人。例如声东击西，忽南忽北，使敌捉摸不定，因而袭击其一点。(3) 疲劳与恐吓敌人。若敌人虽多，但素质不良，指挥者懦弱，则散播谣言，虚张声势，以增加其动摇，然后举行袭击。

(4) 派遣间谍打进敌人驻地，取得当地人民及敌人内部士兵同情于我者，以作我之内应，便利袭击之成功。(5) 使用游击小组及人民自卫队四出活动，使他处敌人固守一地，钳制可能应援之敌，使我在另一地之袭击易于成功。以上这些，都是以自己的动作变化敌人的情况，便于游击队的成功，虽不是一定有效的，然而往往是往往有效的。

第四，袭击前之侦察，这是首先重要的。侦察的内容，应该注意下列各项，即：(1) 敌人兵力多少，战斗力强弱，武器如何。如准备袭击驻止之敌，则须知道敌军配置情形，警戒程度，及其换班秩序等。(2) 附近有无其他敌军，兵力多少，可能增援的程度如何，运输速度，距离远近，电话电报联络情形，最低限度的增援时间，增援方向及道路状况，均须一一查明而考虑之。(3) 附近居民的情形。(4) 袭击部队到达准备袭击地点的大小道路及有无隐蔽接近地。侦察上列各项，须以秘密而巧妙的方法出之。侦察愈详明，则袭击计划愈能正确。可能时顶好预先绘出一简易地形图，并将敌人配备标记出来。

第五，袭击的时间问题。不外下列四种：(1) 在夜间。这一般是对驻止之敌，因在其他时间袭击不利而采取的。一则利用夜暗最能隐蔽接近敌人；二则夜暗冲锋，可以减少自己的损伤，并可扩大自己的声势，增加敌人的恐慌；三则邻近敌人夜间增援不

易。因此游击队须经常注意夜间动作的练习。(2) 在拂晓。这一般也是对驻止之敌而实行的，即是利用夜暗行军接近敌人而于拂晓时实行攻击，这在游击队离敌较远或夜间攻击动作尚不熟习时，是袭击的最好时机。但冲锋开始，须在敌人起床以前为宜。(3) 在黄昏。这一般也是对驻止之敌而说，在其他时间敌人均比较注意，同时接近敌人的道路又较隐蔽，白天行军不成问题或通过地区可以伪装时，采用此种时间袭击之。在此种时间，万一袭击不成功亦可利用夜暗安全撤退。(4) 在白天。敌人运动多在白天，故袭击行动之敌大都选在白天。游击部队欲最有效果地袭击敌人，必须不丧失敌人正在行动中的机会，此种时机必须普遍采用。此种袭击多为伏击。如欲白天袭击驻止之敌，则须在下述情况下方可采用：1、敌人素质甚差，不机警，无工事，疏忽已极；2、敌人根本不知道游击队要来袭击；3、孤立无援之敌；4、大雨大雾最易隐蔽袭击动作时。在这些情况下，白天袭击驻止之敌，也是可能成功的。

第六，必须保持袭击计划的秘密。袭击敌人虽有好的计划，若此一计划被敌人知道了，则不但一钱不值，还有遭受损失的危险。所以袭击计划之严守秘密是最要紧的。除了第三项所述尽量利用抗日人民及游击小组四处活动以迷惑敌人外，还应该注意下列事项：(1) 袭击计划不应全部告知部下，只告部下以应知之事或分段告知之（如在出发前、行军中及到达目的地以后）。(2) 对驻地人民及所请向导，均不应使其知道游击队袭击的企图。(3) 可能时，在出发时先向假方向走一段路然后折转向袭击目的地前进，这在敌人耳目众多之处可采用之。

第七，第七，袭击部队的开进。下列各点是值得注意的：(1) 如有必须通过的河川及障碍地段，应于出发前研究通过方法及携

带必要的器具。(2) 携带标语布告等。(3) 约定各种记号，例如开始冲锋记号等，并规定袭击不成功及遇特种困难时的集合场。

(4) 行进中选择极隐蔽的小路甚至走没有路的地方。(5) 行进中保持极端的肃静，禁止说话与笑声。除侦察警戒人员外，其余队员均不准装红子（只装暗子）。(6) 在行军纵队先头，派出少数便衣武装的侦察人员担任直接的侦察与警戒。(7) 行进尽可能地快。(8) 行进中，要有遭遇敌人的战斗准备。

第八，到达袭击目的地以后的动作。这是全部袭击计划中的重要关节，应注意的有如下各点：(1) 迅速在敌人警戒线外隐蔽集结，如果敌人还不知道，切记不要惊动他。此时部队首长应迅即召集各分队首长，指示具体的攻击方法。在白天，要引导各分队首长隐蔽观察敌人的配置，当面指示各分队的具体任务。如有可能，则以便衣侦察员不动声色地捕捉敌人的步哨，进一步察明情况。(2) 兵力大（一营以上）则将全部分成两路（不可隔得太远）实行攻击，兵力小（一连以下）则一起投入冲锋就行了。(3) 派遣少数人枪，在不易攻击的方面举行佯攻，钳制敌之一面，而以主力投入敌人薄弱较易冲击的一二点，但决不可平分兵力。(4) 在兵力优裕时，可派遣一小部埋伏于敌人可能逃走的方向，截断敌人去路。(5) 必须在敌人有增援部队的方向，派出少数人的警戒，并破坏其电话电报线及桥梁道路。(6) 准备攻击的位置，不应过近也不应过远；准备攻击的时间，要尽量缩短；准备攻击的动作，要尽量地快。(7) 夜间袭击，要有很好的识别标记，以免混杂不清。

第九，冲锋动作：(1) 冲锋开始，应按照预定的时间、方向、道路而迅速地突然地实行之。如分几路冲锋，则以主要之一路到达冲锋地点所需要时间之多少来决定全部冲锋的开始时间。其他

各路应向主要的一路取齐，以免敌人过早发觉。(2) 冲锋开始时，不要作声，也不要打枪（就是敌人先打枪也不管），也不要喊杀，而用刺刀、梭标、大刀，一下冲入敌人配置，实行格斗，迅速解决敌人。如果有手榴弹，应首先投掷手榴弹（注意——不要打倒自己人，只准在最先头的几个人打，后面的不准打。），趁着手榴弹爆炸的瞬间，扑拢敌身而解决之。(3) 只有在钳制历面，可以少数火器射击敌人而吸引其注意力，以便突击方向迅速取得胜利。

(4) 如敌人固守房屋顽强抵抗，可实行放火烧屋逼其投降（只准烧其固守之屋，不准乱烧），或趁敌人混乱之际从其他房屋袭入之。(5) 如袭击成功，敌人溃退，则担任埋伏截击之部队首先应努力堵截，此时突入部队应不顾武器、财物之缴获，除管理俘虏、警戒战场之必要部队外，其余均应跟踪追击，期于大量解决敌之有生力量，使敌无反攻之可能。但在有增援敌人之顾虑时，则不应远追。

第十，袭击后的动作：(1) 袭击成功时，立即把部队集合，连同伤员、胜利品等，带到通来路有阵地的附近集结，并以一部占领阵地，防止敌人反攻。(2) 如残敌远逃，已无反攻力量，又无增援敌人之顾虑时，则袭击部队可在当地留相当时间。此时以一部工作人员担任分发缴获敌人之财物于当地贫民，帮助人民反对著名的汉奸。而游击队主力则选择有阵地的地点，集结休息，绝对禁止自由行动。虽然如此，游击队主力一般仍不应在当地宿营，应移于离此若干里之优良地点宿营。(3) 如情况紧张，则应缩短处理战后工作的时间，以便游击队能迅速地胜利地离开此地。

(4) 关于处置俘虏，在离自己根据地或抗日正规军不远时，则将俘虏全部押送后方或交给正规军去处理。不然，则问明情况，给以适当宣传后立即释放，严禁杀害俘虏，仅对民众痛恶的汉奸

首领可以在民众要求之下处决之。就是有时俘虏不愿跟着游击队走，亦只应解除武装将他释放。须知杀害俘虏只足增强敌人战斗力，于抗日战争是完全不利的。但在释放俘虏时，要注意保守自己行动的秘密，为达此目的，应把俘虏事先放走，而把没有走的关在一个房子内，使其不能看到游击队退去的方向。(5) 如袭击不成功，或袭击刚半而敌人增援已到，则应毫不迟疑地迅速撤退。如在敌人压迫下退出战斗，则应实行分散退却，同时以一部最精干的老游击队员担任掩护。退却后的集合场，多应是先一天的宿营地或是预先指定的。(6) 游击队就是在无严重敌情下撤退时亦应伪装，例如先向假方向走若干里，再折到真正要走的道路，用以迷惑敌人，失去敌人可能跟追的踪迹。

第十一，袭击堡垒、寨子、土围子及城市。以游击队劣势的武器，去袭击堡垒、寨子、土围子或城市，只凭一般的战斗方法是不行的。这些东西是可以袭击的，但应注意下列的条件：(1) 最好在要袭击的城寨堡垒中，要预伏间谍或有同情于游击队的人民、兵士为内应，这种政治工作游击队要经常有计划地做。(2) 选择敌人警戒最疏忽之点，利用夜暗，乘其不备，悄然爬入。或在最危险之处，即是敌人最放心的地点，有时也是我们悄然爬入的最好场所，但这决不是经常的。(3) 如袭击被敌发觉，则以小部在他方向佯攻，吸引其主力，而以游击队之主力从其松懈处薄弱点袭入之。(4) 在白天实行远距离的袭击，在可能情况下，可伪装敌军，乘机袭入之。(5) 在城堡附近的野战中击溃敌人，跟踪追击，乘势袭入，这是最有利的情况，不应放过此种机会。(6) 在抗日根据地附近的城堡，有时也在敌人薄弱的远后方，如果民众条件好，而游击队力量充裕时，可以采取围困爆破的办法。但必须在敌人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才能采取此种办法。

第十二，扰乱或钳制敌人。扰乱是游击战争袭击战术的附属部分，但也是必要部分，目的在于增加敌人不安，减杀敌人威势，以造成我们消灭敌人或逼退敌人的条件。其方法如次：（1）在夜间袭击不成功时，则改变其任务为扰乱。高喊口号，大声唱歌，四面打枪，都是方法。退去之前可散发标语传单于空地上。（2）在配合正规军作战，为了分散敌人兵力使其胶着一地不能增援其他方向时，亦可采用扰乱方法。此时可将游击队分为若干起，轮番于黄昏、夜半、拂晓等时间，潜至敌人驻地附近，突然地射击与呐喊，使其惊疑不定，无法增援或迟滞其增援时间。（3）还有一种办法，就是虚张声势。其法是在敌人驻地附近多插旗帜，多举烟火，即古人所谓设疑兵的办法。目的或在欺骗敌人，便于我方在他处之行动，或在恐吓敌人，增加其惊惶心理。此时我游击队只虚与周旋，决不要进入严重的战斗，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游击战争取得最大胜利的时机，还以袭击正在行动中的敌人为多，所以游击队不应放弃一切当着正在行动而又条件适合的敌人的袭击机会。这种袭击按其性质都是遭遇战，但分埋伏与急袭两种。埋伏是预期遭遇的性质，但采取埋伏的形式。急袭是不预期遭遇而发生的，采取急袭的形式。前者是游击队重要的战术。

第一，埋伏即伏击，是游击队有计划地隐蔽配置于敌人必经道路的一旁或两旁，待敌通过时而突然袭击之。这种动作，就叫做伏击。根据情况及配置的不同，分为两种伏击方法：（1）是待伏。预先在敌人必经道路上埋伏好，待其通过而袭击之。（2）是诱伏。以主力埋伏好，而一小部故意示弱，诱敌至埋伏圈内，然后袭击之。

第二，根据敌人战术、部队素质及地形等各种不同条件，埋伏可以采取一侧埋伏，两侧埋伏，多面埋伏或重层埋伏等几种方法。

第三，埋伏的目的在于：（1）消灭或打击敌之步兵、炮兵、骑兵、运输队、征发队、汽车、火车、船舶等。（2）捕捉敌军单个或多个通讯员、侦察员、电话员、采买员等，以搜集关于敌人的情况。（3）以埋伏截击败退之敌

第四，埋伏，首先要求明了情况。若情况不明，则或致落空，或反受损失。故埋伏前的侦察，须周详仔细。侦察应注意事项如下：（1）侦察的方法：第一，利用居民中同情于游击队的，使用各种方法去接近敌人，从敌士兵、夫子口中，得出必要的情况。第二，使用便衣侦察员接近敌人，进行侦察。第三，窃听敌人电话。

第五，捕捉敌之人员，从其白头或文件上，得出消息。（2）侦察的要求，主要的是敌人出发时间，兵力多少，将走道路，要到地点，行军力，有无特种武器及特别装备，有无辎重，行军中之通讯联络情形，行军时的特殊惯性等。（3）侦察的技术，以能隐蔽自己企图、得到敌人消息为原则。侦察所得之消息，除对必须告知之人外，均应保守秘密，以防泄露。必须记着，不论在敌人后方或抗日区域内，随时随地都有敌人侦探潜伏的可能。

第六，伏击地区的选择。选择伏击地区以利于发挥自己最大威力、不利于发挥敌人最大威力为原则。因之，选择伏击地区时应注意下列各点：（1）有良好的隐蔽，使游击队容易看见敌人，而敌人不易看见游击队。（2）有良好的地形，使游击队便于出击敌人，而敌人不便于攻击游击队。（3）埋伏地点附近之道路，须利于游击队退却，不利于敌人退却。（4）埋伏地点，须选在敌人

一般行军警戒搜索正面以外。有时道旁虽有良好地形，如果过于接近敌走道路，则游击队埋伏时的隐蔽集结地，应选在更靠后的适当地点。(5) 要有良好的观察地点。伏击最好是具备这些条件，但不是一定要这许多条件一一齐备，才能设伏。

第七，埋伏部队的开进：(1) 时间不要过早，免得游击队久处于埋伏中，减弱其紧张性与慎重性，容易暴露企图，增大敌人发觉的危险；但也不要过迟，免得来不及布置埋伏。(2) 行进路要隐蔽，宁肯走小路，甚至走没有路的山地谷底。(3) 行进时，先头须派出伪装的便衣武装侦探，以任警戒。如必须通过住民地，顶好全体伪装，以保持行动的秘密。(4) 到着埋伏地区时，即应封锁消息。

第八，伏击实施：(1) 配置兵力，应按照游击队兵力大小，敌人兵力大小及地形情况而定。通常以一小部（在全兵力百分之三十以下），占领险要地点，用火杀伤和钳制敌人，而以主力埋伏于便于出击地点，实行突击。有时，应派出少数人枪在有敌人增援顾虑的方向或为便于撤退而必须占领的掩护阵地上，担任警戒。(2) 在袭击敌人大部队时，应放过其先头及本队，而袭击其后尾。此时如能以游击小组于敌人先头部队之前方侧方实行扰击而抓住敌人，则更便于伏击部队之袭击。还可以预先设法将道路、桥梁实行某种程度的破坏（泛滥，淤塞，石头拦阻，将一般的桥变成不良的桥等），加长敌人的行军纵列，使之不易首尾相顾。(3) 如果是袭击敌人小部队，则可以堵塞其去路，截断其来路，而全部消灭之。(4) 关于开始出击的信号，各分队的具体任务，出击道路，何部首先射击等，均须预先详细告知各分队首长。(5) 出击以前，须极端保持隐蔽肃静，不准吸烟，不准说话，不准随便探望。(6) 战场观察。顶好能设立两个观察所，第一个

设在通敌人来路十里左右的附近，并带通讯员三四人，一律伪装，担任观察。将敌人行军长径，兵力多少，警戒搜索情形，不断报告游击队长，以便指挥者根据情况适时处置。这个观察所，须在敌人全部通过后，始得回归。第二个设在伏击地区附近，指挥者亲自观察，以便适时发出开始出击的信号。(7) 开始出击的时间，要选择得最好，要能抓住敌人行进中一个最适合于自己出击的时机。同时，还须要全体队员绝对服从命令，不准自由行动，免致敌人事先发觉。(8) 出击时的动作，要迅速猛烈，要能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很短促地将所有火器一齐快放，跟着立即冲锋，迅速解决战斗。任何迟疑与犹豫，都是不利的。

第九，战斗成功，立即集合部队，处置俘虏，收集战利品及伤员，以便迅速撤去。如只消灭敌人一部，则撤退更要快，以免遭受敌人的反攻。若有不能带走的笨重物品，一律毁坏之。

第十，伏击不可能或不成功时的处置：(1) 如刚出击尚未进入战斗，忽然发现敌人兵力过大或被敌人预先发觉我之埋伏而早已占领阵地，出击毫无胜算，则应马上停止出击，断然撤退，以保存自己力量。这时候，需要指挥者之最高的机断与灵活的处置。(2) 已经进入战斗，但遇敌人顽强抵抗，确无胜利把握时，亦应终止战斗，决心引退。

第十一，扰乱。有时目的不在消灭敌人，或伏击不能解决战斗，均可实行扰乱任务。其方法是用小部队，分散数处，以火力杀伤敌人，扰乱其行军纵列；或于高山峭壁处，推巨石、倒古木以杀害其人马。

第十二，伏击敌人单个或少数的传令兵、采买、侦探等，则是游击小组或游击队所派出的便衣侦察员的任务。此种机会很多，不应放弃。

第十三，伏击骑兵：(1) 敌骑的运动力和冲击力较大，所以埋伏时，应选择在森林或隘路（有时住民地也可以），敌骑运动不便之处而实行之。(2) 集中火力杀伤乘马，则人员自易捕获。

(3) 如伏击少数敌骑确有把握捕捉之时，可设置重层的多面的埋伏。(4) 可以伪装居民，预伏某一村庄中，待敌骑进入村庄人马分离时，突然袭击之。

第十四，伏击汽车：埋伏地点，应选在山谷、谷底、沟底、转弯处、上下坡处，并预先设置障碍、陷井，或埋置地雷（束集手榴弹和迫击炮弹亦可），使汽车到此不得不停止或被炸毁翻倒。而游击队则埋伏于附近隐蔽地点，待汽车停止或翻倒之际，以一小部拦住先头，另以一小部截断归路，主力则直扑汽车捕获其人物。如有护卫兵士，则须先解除其武装，再行烧毁汽车。但对被俘之驾驶人员及士兵，须注意争取，不要杀害。

第十五，伏击火车：(1) 在转弯处、上下坡处、有高堤处、洼地、隧道口，都是埋伏的好地点。(2) 方法：先卸松铁轨上的狗头钉或径拆散铁轨的一段，使列车到时，跌出轨外。或在铁轨上、隧道口上，用大石头大木头堆塞起来，以制止火车前进。而游击队则分为三部：一部占领阵地，预防列车上卫队抵抗。部对车厢射击。另一部则准备进入车厢，收缴枪械，俘虏人物。最后放火烧毁车辆。(3) 对装甲火车，贝度应特别注意，因为它是移动的炮台。游击队一面不但预先卸松狗头钉，而主要是尽量用地雷炸毁之，待其倒坍后，再行出击。

第十六，伏击船舶：(1) 游击队可以伏击的船舶，主要是敌人运输用的商船或较小的内河炮舰。(2) 伏击的地点，要在河岸上便于隐蔽之处、湾曲处、靠近我岸处。(3) 伏击时，游击队主要火器及兵力应准备迎击船头，而以一小部截击船尾，准备敌船回头时用火力拦阻之。待敌船一到，即猛力以步枪机关枪，顶好是炮兵（若无洋炮就是大土炮松树炮也可以），一齐快放。(4) 如是木船，则迫令其停止靠岸，搜查其军械及资财。私船放还，并给船工以财物，官船则烧毁之。

第十七，伏击敌人运输队：(1) 应选择隘路或道路狭窄之处。(2) 若敌掩护部队的兵力较大，则可分游击队为两部，以主力同敌掩护部队战斗吸引其向我，以小部夺取运输品或烧毁之。(3) 若敌掩护部队较小，则首先消灭其掩护队，再夺取其运输品。(4) 伏击敌人运输队一般原则，须先射击其先头，使运输纵列发生错乱，夫乱跑，道路阻塞；其次猛力消灭或驱逐其掩护部队，再行夺取辎重。(5) 若要防止运输队向后逃跑，须先以小部截断其退路。

第十八，急袭：这是处置不预期遭遇的方法。(1) 在行动中的游击队，可能遭遇行动中的敌人讨伐队、征发队或运输队，所以，游击队在行动时应经常准备这一着。(2) 游击队行进时，应经常派遣便衣侦探在部队先头三五里处行进，以便遭遇敌人时能迅得消息，定下处置方法。(3) 如遇小部或兵力相等之敌，应立即争取先机，将游击队迅速转入于敌人侧面，而突然向之开火，猛力冲锋，一鼓消灭之。此时若敌溃败，又无其他敌情顾虑时，则跟踪追击将其全部消灭，但追击不应过远。(4) 如遇大部之敌或情况不明，则以毫不迟疑、迅速引退、脱离敌人原则。如敌首先开枪，则我应以小部占领阵地抵抗，掩护主力先撤，掩护部队

随后撤走，避免损失。(5) 总之，突然遭遇敌人，要有最快的决心，或打或走，不可迟疑。迟疑不决，是危险的。

在边区国防教育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典礼 上的讲话³⁴⁸⁵

(1938年4月11日)

我们的民族是一个缺乏教育的民族，但抗战已大大改变了中国人，这是几十年的教育所不能成功的，如果抗战再坚持下去，还会造成千百万的新人。我想，今天在座诸君一定可以看到由这些新人组织起来的独立自由和幸福的新中国之实现。抗战对我们既有这样大的帮助，那么我们就应该用全力来应付抗战，用教育来支持抗战。目前的抗战是规定一切的东西，我们的教育也要听抗战的命令，这就叫做抗战教育。抗战教育不是强迫的，而是自发的，他依靠着群众或学生的学习热忱，和教育干部的积极性。并且需要把教育者与被教育者密切地联系起来。

³⁴⁸⁵ 原载《新中华报》，1938年4月15日。

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

(1938年4月28日)

我们在艺术论上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是艺术至上主义者。我们主张艺术上的现实主义，但这并不是那种一味模仿自然的记流水账式的“写实”主义者，因为艺术不能只是自然的简单再现。至于艺术上的浪漫主义，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它有各种不同的情况，有积极的、革命的浪漫主义，也有消极的、复古的浪漫主义。有些人每每望文生义，鄙视浪漫主义，以为浪漫主义就是风花雪月哥哥妹妹的东西。殊不知积极浪漫主义的主要精神是不满现状，用一种革命的热情憧憬将来，这种思潮在历史上曾发生过进步作用。一种艺术作品如果只是单纯地记述现状，而没有对将来的理想的追求，就不能鼓舞人们前进。在现状中看出缺点，同时看出将来的光明和希望，这才是革命的精神，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有这样的精神。

艺术上每一派都有自己的阶级立场，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劳苦大众方面的，但在统一战线原则之下，我们并不用马克思主义来排斥别人。排斥别人，那是关门主义，不是统一战线。但在统一战线中，我们不能丧失自己的立场，这就是鲁迅先生的方向。你们鲁迅艺术学院要遵循鲁迅先生的方向。

艺术作品要有内容，要适合时代的要求，大众的要求。作品好比饭菜一样，要既有营养，又有好的味道。艺术至上主义者是只注重味道好不好吃，不管有没有营养，他们的艺术作品内容常常是空虚的或者有害的。艺术作品要注重营养，也就是要有好的

内容，要适合时代的要求，大众的要求。艺术作品还要有动人的形象和情节，要贴近实际生活，否则人们也不爱看。把一些抽象的概念生硬地装在艺术作品中，是不会受欢迎的。

鲁迅艺术学院要造就有远大的理想、丰富的生活经验、良好的艺术技巧的一派艺术工作者。你们不应当是只能简单地记述社会生活的艺术工作者，而应当有为新中国奋斗的远大理想。不但要为民主共和国，还要有实现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的理想。没有这种伟大的理想，是不能成为伟大的艺术家的。但只有理想还不行，还要有丰富的生活经验与良好的艺术技巧。这三个条件，缺少任何一个便不能成为伟大的艺术家。

《红楼梦》是一部很好的小说，特别是它有极丰富的社会史料。……事非经过不知难，每每一件小事却有丰富的内容，要从实际生活经验中才会知道。你们是青年艺术工作者，现在的大千世界都是属于你们的，都是你们活动的园地。你们的艺术作品要有充实的内容，便要到实际生活中去汲取养料。没有丰富的实际生活经验，无从产生内容充实的艺术作品。要创造伟大的作品，首先要从实际斗争中去丰富自己的经验。要把中国考察一番，单单采取新闻记者的方法是不行的，因为他们的工作带有“过路人”的特点。俗话说：“走马看花不如驻马看花，驻马看花不如下马看花。”我希望你们都要下马看花。

到群众中去，不但可以丰富自己的生活经验，而且可以提高自己的艺术技巧。夏天的晚上，农夫们乘凉，坐在长凳子上，手执大芭蕉扇，讲起故事来，他们也懂得胡适之先生的八不主义

³⁴⁸⁶，他们不用任何典故，讲的故事内容却是那么丰富，言辞又很美丽。这些农民不但是好的散文家，而且常是诗人。民歌中便有许多好诗。我们过去在学校工作的时候，曾让同学趁假期搜集各地的歌谣，其中有许多很好的东西。这里存在着一个极大的不协调，就是有丰富的生活经验与美丽言辞的人不能执笔写作，反之，许多能写作的人却只坐在都市的亭子间，缺乏丰富的生活经验，也不熟悉群众生动的语言。我们都知道高尔基³⁴⁸⁷，他的生活经验丰富极了，他熟悉俄国下层群众的生活和语言，也熟悉俄国其他阶层的实际情形，所以才能写出那样多的伟大作品。

至于艺术技巧，这是每个艺术工作者都要学的。因为没有良好的技巧，便不能有力地表现丰富的内容。艺术技巧是多方面的，并不只限于语言。但是，对于艺术工作者来说，掌握语言的能力确是非常重要的。我看鲁迅先生便是研究过大众语言的。你们一定要下一番苦工夫去学习和掌握艺术技巧。

要做伟大的艺术家，必须具备以上所说的三个条件，缺一不可。现在，我们阵线上有些人所写的东西，缺乏丰富充实的内容，不合于客观的实际，艺术技巧也比较粗糙。这种缺点我们一定要努力克服。

³⁴⁸⁶ 胡适之，即胡适（一八九一——一九六二），安徽绩溪人。他在一九一七年和一九一八年先后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和《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将自己对文学改良的主张归纳为“八不主义”：一、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二、不做“无病呻吟”的文字。三、不用典。四、不用套语滥调。五、不重对偶：——文须废骈，诗须废律。六、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七、不摹仿古人。八、不避俗语俗字。

³⁴⁸⁷ 高尔基（一八六八——一九三六），苏联著名文学家。主要作品有诗歌《鹰之歌》、《海燕》和小说《母亲》、自传三部曲等。

关于《墨子哲学思想》一文给陈伯达的信

(1939年2月1日)

事物的实不止属性，还有其最根本的质，质与属性不可分，但有区别的，一物的某些属性可以除去，而其物不变，由于所以为其物的质尚存。“志气”，志似指事物之质，不变的东西（在一物范围内），气似指量及属性，变动的东西。

说因果性的一段，似乎可以说同时即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物之所以然”是必然性，这必然性的表现形态则是偶然性。必然性的一切表现形态都是偶然性，都用偶然性表现。

一个质有两方面，但在一个过程中的质有一方面是主要的，是相对安定的，必须要有所偏，必须偏于这方面，所谓一定的质，或一个质，就是指的这方面，这就是质，否则否定了质。所以墨说“无偏”是不要向左与右的异质偏，不是不要向一个质的两方面之一方面偏（其实这不是偏，恰是正），如果墨家是唯物辩证论的话，便应作如此解。

关于《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给张闻天的信

3488

(1939年2月20日、22日)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³⁴⁸⁹，作为哲学的整个纲领来说是观念论……；但如果作为哲学的部分，即作为实践论来说则是对的，这和“没有正确理论就没有正确实践”的意思差不多。如果孔子在“名不正”上面加了一句：“实不明则名不正”，而孔子又是真正承认实为根本的话，那孔子就不是观念论了，然而事实上不是如此，所以孔子的体系是观念论；但作为片面真理则是对的，一切观念论都有其片面真理，孔子也是一样。此点似宜在文中指出，以免误认“名不正言不顺”而“事”也可“成”。“正名”的工作，不但孔子，我们也在做，孔子是正封建秩序之名，我们是正革命秩序之名，孔子是名为主，我们则是实为主，分别就在这里。又观念论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孔子正是这样，所以能引起人的注意与拥护。机械唯物论不能克服观念论，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忽视主观能动性。我们对孔子的这方面的长处应该说到。

“家庭中父与子的关系，反映了社会中君与臣的关系”，不如倒过来说：“社会中（说国家中似较妥当）君与臣的关系，反

³⁴⁸⁸ 《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毛泽东在信中将它称为《孔子哲学》，是陈伯达写的，一九三九年发表在延安《解放》第六十九期。

³⁴⁸⁹ 见《论语·子路》。

映了家庭中父与子的关系”。事实上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国家发生以前，家庭是先发生的，原始共产社会末期氏族社会中的家长制，是后来国家形成的先驱，所以是“移孝作忠”而不是移忠作孝。一切国家（政治）都是经济之集中的表现，而在封建国家里家庭则正是当时小生产经济之基本单元，封建国家为了适应它们的集中（封建主义的集中）而出现。

“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一定的质含有一定的量”是对的，不如说“一定的质被包含于一定的量之中”，但重要的是从事物的量上去找出并确定那一定的质，为之设立界限，使之区别于其他异质，作两条战线斗争的目的在此。文中最好引《中庸》上面“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³⁴⁹⁰，及“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³⁴⁹¹，更加明确地解释了中庸的意义。朱熹³⁴⁹²在“舜其大知”一节注道：“两端谓众论不同之极致，盖凡物皆有两端，如大小厚薄之类。于善之中又执其两端而度量以取中，然后用之，则其择之审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权度精切不差，何以与此？此知之所以无过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³⁴⁹³。这个注解大体是对的，但“两端”不应单训为“众论不同之极致”，而应说明即是指的

³⁴⁹⁰ 参见《中庸》。原文为：“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³⁴⁹¹ 参见《中庸》。原文为：“子曰：‘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³⁴⁹² 朱熹（一一三〇——一二〇〇），徽州婺源（今属江西省）人。南宋哲学家，编注有《四书集注》等书。

³⁴⁹³ 见《四书集注·中庸》朱熹注。

“过”与“不及”。“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依照现在的观点说来，过与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状态而进到别种状态了，这就是别一种质，就是“过”或“左”倾了。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在原来状态并无发展，这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滞，是守旧顽固，是右倾，是“不及”。孔子的中庸观念没有这种发展的思想，乃是排斥异端树立己说的意思为多，然而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则是无疑的。这个思想的确如伯达所说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

关于孔子的道德论，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以便与国民党的道德观（国民党在这方面最喜引孔子）有原则的区别。例如“知仁勇”，孔子的知（理论）既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则其见之仁勇（实践），也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知仁勇被称为“三达德”，是历来的糊涂观念，知是理论，是思想，是计划，方案，政策，仁勇是拿理论、政策等见之实践时候应取的一二种态度，仁像现在说的“亲爱团结”，勇像现在说的“克服困难”了（现在我们说的亲爱团结，克服困难，都是唯物论的，而孔子的知仁勇则一概是主观的），但还有别的更重要的态度如像“忠实”，如果做事不忠实，那“知”只是言而不信，仁只是假仁，勇只是白勇。还有仁义对

举，“义者事之宜”³⁴⁹⁴，可说是“知”的范畴内事，而“仁”不过是实践时的态度之一，却放在“义”之上，成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仁”这个东西在孔子以后几千年来，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家所利用，闹得一塌糊涂，真是害人不浅。我觉孔子的这类道德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

孔子在认识论上与社会论上的基本的形而上学之外，有它的辩证法的许多因素，例如孔子对名与事，文与质，言与行等等关系的说明。

伯达此文及老墨哲学诸文引了章，梁，胡，冯³⁴⁹⁵诸人许多话，我不反对引他们的话，但应在适当地方有一批判的申明，说明他们在中国学术上有其功绩，但他们的思想和我们是有基本上区别的，梁基本上是观念论与形而上学，胡是庸俗唯物论与相对主义，也是形而上学，……（章，冯二家我无研究），等等。若无这一简单的申明，则有使读者根本相信他们的危险。

³⁴⁹⁴ 参见朱熹《四书集注·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原文为：“仁者心之德爱之理。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

³⁴⁹⁵ 章，指章炳麟（一八六九——一九三六），浙江余杭人。梁，指梁启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广东新会人。胡，指胡适。冯，指冯友兰（一八九五——一九九〇），河南唐河人。他们是近现代中国思想史上有重大影响的学者。

妇女们团结起来³⁴⁹⁶

(1939年3月8日)

无论什么事情，没有女子，都绝不能成功。

现在中国人民，不论男人女人，是在被世界的和中国的坏人欺侮着，是在重重的压迫中。……而我们的女同胞则有更多一重的压迫，就是受到男子的压迫，比如，男子打老婆的；看不起女子的；说女子没有能力，不让她们管国家事情的；雇佣女工，同男子做一样的工作，而少给工资的。自然，这种歧视，是社会的歧视，而不是两性间的问题；这种压迫，是社会的压迫，也不是两性间的问题。

很明显的，妇女解放与社会解放是密切地联系着的，妇女解放运动应成为社会解放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存在着。离开了社会解放运动，妇女解放是得不到的；同时，没有妇女运动，社会解放也是不可能的。

³⁴⁹⁶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纪念“三八”妇女节大会上的讲话。

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1939年5月20日)

讲到学习运动。古人讲过：“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³⁴⁹⁷，就是说：人不知道古今，等于牛马穿了衣裳一样。……我们单通现在是不够的，还须通过去。……

尤其是我们共产党员，要知道更多的古今。

共产党员要领导几千万、几万万人的革命，假使没有学问，是不成的，共产党人就应该懂得各种各样的事情。因此，要领导革命就须要学习。

我们要建设的一个大党，不是一个“乌合之众”的党，而是一个独立的、有战斗力的党，这样就要有大批的有学问的干部做骨干。

正面搞不通，可以从旁的方面着手，如打仗一样，顽强的敌人，正面攻不下，就用旁袭侧击，四面包围，把它孤立起来，这样就容易把它攻下。学习也是一样，正面的东西一时看不懂，就从旁的东西看起，先打下基础，就可以一点一点地搞通正面的东西。

工作忙就要“挤”，看不懂就要“钻”，用这两个法子来对付它，学习是一定可以获胜的。

学校是可以进，但是这只是进一个门而已，要求得更进一步的学问，一定要在学校外边学习，要长期地研究。

³⁴⁹⁷ 见韩愈《符读书城南》诗。

反投降提纲——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 和结论的提纲

(1939年6月)

历史经验——革命转变关头（哪怕是暂时的局部的转变）垃圾的跌落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坏事；但须注意好好带领新党员，尤其是大批青年学生，他们将来是有用的。

要保护革命知识分子，不蹈过去的覆辙。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不能胜利。……

工农没有革命知识分子帮忙，不会提高自己。工作没有知识分子，不能治国、治党、治军。

不是降低阶级斗争就能够克服投降，只有正确地开展阶级斗争，以与统一战线相配合，才能克服投降。单有统一而无斗争是非常危险的。群众是我们的最后依靠，也是抗战的最后依靠。

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

(1939年9月24日)

所谓屈服，别的政治集团怎么讲，我不知道，说到共产党，那末，从它诞生的一天起，它就是一个独立的政党，从来也没有一天、半天、一小时或者一分钟放弃过它的独立性，从来也没有向什么个人或什么集团或什么党派屈服过。要共产党屈服，这大概是比上天还要困难些吧？

我们永远是社会革命论者，永远不是改良主义者。中国革命，有两篇文章，上篇和下篇。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一道，进行民族民主革命，这是文章的上篇，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一篇文章，并且一定要做好这一篇文章。但是，文章还有一篇，就是它的下篇，就是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篇文章，我们也是一定要做的，并且也一定要做好的。目前是民族民主革命，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会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种可能性是会变为现实性的。不过，文章的上篇如果不做好，下篇是没有法子着手做的。

毫无疑义，抗日而没有民主，是不能胜利的，抗日与民主是一件事的两方面。

研究沦陷区³⁴⁹⁸

(1939年10月1日)

“瞎子摸鱼”，闭起眼睛瞎说一顿，这种作风，是应该废弃的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或者说，“研究时事问题须先详细占有材料”，这是科学方法论的起码一点，并不是什么“狭隘经验论”。

³⁴⁹⁸ 这是毛泽东为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的《时事问题丛书》第二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一书写的序言。

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³⁴⁹⁹

(1939年12月9日)

五四运动为北伐战争作了准备。如果没有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是不可想像的。有些人以为学生运动没有力量，但是事实怎样呢？广大学生群众的五四运动，推动“六三”全国性的罢工、罢市、罢课的反帝和反卖国政府的斗争，发展成为全民族的运动。五四运动以后，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掀起了五卅运动，发动了北伐战争，造成了第一次大革命。那末，很明显，没有五四运动，第一次大革命是没有可能的。五四运动的的确确给第一次大革命准备了舆论，准备了人心，准备了思想，准备了干部。

一二·九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红军走到陕北打了胜仗而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加紧侵略中国的情况之下发生的。广大青年学生起来反对当局对他们的压迫，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个运动的发生，轰动了全国。它配合着红军的北上抗日行动，促进了国内和平和对日抗战抗日运动成为全国的运动。所以，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要拿五四运动和北伐战争的关系相比，那末很明显，一二·九运动和抗日战争的关系更密切，两者相隔的时间更短，因

³⁴⁹⁹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各界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为一二·九运动有红军长征的胜利互相配合。总之，一二·九运动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纪念。

黑暗势力压迫进步思想，压迫到最后，黑暗势力总是失败的。一二·九运动前，他们进行了八年多的反共教育，是有计划地进行的。学校里的一切有政治倾向的课程，首先都是以反对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为原则；对教员中被认为是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者的人都要排斥和迫害。从一九二七年下半年起，他们用这种教育训练了八年多，不幸得很，却训练出一个“一二·九”来。这在国民党内那些反共的先生们看来，当然是一件天大的憾事。

世界是向前进的，要向后倒退是不成的；中国人的辫子没有了，他们想拖也拖不住了；旧的落后的东西只好倒下来，让新的进步的东西接替它。

《封神演义》里有一个申公豹，是姜子牙的不肖师弟，他脸向后长，眼朝后看。现在在抗战阵营中，就隐藏有这么一群“申公豹”，一批专门倒退的人，他们拖住中国要倒退。现在大多数人就不准他们这样压迫，要反抗他们的压迫；

不准他们投降，要坚持抗战；不准他们分裂，要坚持团结；不准他们倒退，要坚持进步。这一群“申公豹”，看他们怎样收场！

知识分子不跟工人、农民结合，就不会有巨大的力量，是干不成大事业的；同样，在革命队伍里要是没有知识分子，那也是干不成大事业的。只有知识分子跟工人、农民正确地结合，才会有无攻不克、无坚不摧的力量。

我们要反对那少数破坏革命的坏知识分子，汉奸知识分子，“申公豹”式的知识分子。不反对这种知识分子，是罪恶；反对这种知识分子，是对民族对人民都有利的。

如果知识分子跟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结合起来，就是说，笔杆子跟枪杆子结合起来，那末，事情就好办了。拿破仑说，一支笔可以当得过三千支毛瑟枪。但是，要是没有铁做的毛瑟枪，这个笔杆子也是无用的。你们有了笔杆子，再加一条毛瑟枪，根据拿破仑的说法，那末，你们就有三千零一支毛瑟枪了。有了这，什么帝国主义也不怕，什么顽固分子也不怕。

为《大众日报》周年纪念题词³⁵⁰⁰

动员报纸、刊物、宣传团体，文化艺术团体，军队政治机关，民众团体，及其他一切可能力量，以提高民众觉悟，发扬民族自信心与自尊心，反对任何投降妥协的企图，坚持抗战到底，不怕困难，不怕牺牲，我们一定要自由，我们一定要胜利。

吴玉章³⁵⁰¹寿辰祝词

(1940年1月15日)

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

³⁵⁰¹ 吴玉章（一八七八——一九六六），四川荣县人。当时任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

集中力量发展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³⁵⁰²

(1940年1月28日)

时局的发展充分证明，只有广大发展革命武装力量，以与全国工作相配合，才能制止投降与反共，才能巩固统一战线，才能争取时局好转。

要使全党干部明白这个正确的发展路线，才能造成猛力向前的作风，才能实现这个计划。集中一切力量为发展武装建立根据地而斗争，乃是你们最主要最主要的任务。要使干部明白，没有伟大革命武装与伟大革命根据地，抗日胜利是不可能的。

³⁵⁰² 这是毛主席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给山东分局等的指示。

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1940年2月5日)

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自然科学是要在社会科学的指挥下去改造自然界，但是自然科学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却被阻碍了它的发展，所以要改造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大家要来研究自然科学，否则世界上就有许多不懂的东西，那就不算一个最好的革命者。

目前时局与党的政策³⁵⁰³

(1940年7月13日)

1、战争与革命问题

两派帝国主义国家，在战争阻止不了时，人民就起来反对战争，而苏联就不加入。这一不加入计划的实现，是苏联二十年来斗争的结果，是世界人民拥护苏联的结果，是苏联善于利用帝国主义相互间矛盾的结果，是无产阶级世界战略上最伟大的胜利，因为它不但保护了苏联，而且保证了世界革命的胜利。这一胜利完成于德苏、苏芬两个协定³⁵⁰⁴，以后的任务则是巩固之。

美国是门罗主义加上世界主义，“我的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它是不愿放弃大西洋与太平洋上的利益的。

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尚有可供革命利用之矛盾，因此，必须利用之。苏联必须利用之，印度必须利用之，中国必须利用之，一切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必须利用之。

现在是世界大震动大变化时代，不是什么“和平”与“资本主义稳定”的时代，这个时代早已完结，以后也永远不能建立。

³⁵⁰³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讨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的会议上所作结论的要点。

³⁵⁰⁴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由苏联与德国于1939年在莫斯科签订；《苏芬互不侵犯条约》由苏联与芬兰于1932年在赫尔辛基签订。

2、中国问题

抗日与革命是一个东西。

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是同时的，不是民族革命过去之后，再来一个民主革命阶段。

反磨擦——民族革命中的民主革命。

就抗战营垒（与敌人营垒区别）分：顽固派或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则是统治的阶级，动摇的阶级，不是中间派，把它们当做中间派，混淆了人民的视听。

3、学习问题

（1）我们是处在战争与革命的新时代。

（2）一切皆在变化中，不应该用顽固的形式的观点，而应该用活泼的辩证法的观点，去注意一切变化。

（3）例如此次决定，即有许多新东西，这不是说过去不对，而是说客观变了，主观要适应此种变化。

加紧争取同盟军又不失自己立场的策略教育是必要的，老大与形式主义都是无用的。

从什么年月学好了，或者什么天才，都是骗人的。有用的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具体环境与具体策略，用点苦功。

关于经学问题给范文澜³⁵⁰⁵的信

(1940年9月5日)

提纲³⁵⁰⁶读了，十分高兴，倘能写出来，必有大益，因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因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你的历史学工作继续下去，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第三次讲演因病没有听到，不知对康、梁、章、胡³⁵⁰⁷的错误一面有所批判否？不知涉及廖平、吴虞、叶德辉³⁵⁰⁸等人否？越对这些近人有所批判，越能在学术界发生影响。

我对历史完全无研究，倘能因你的研究学得一点，深为幸事。

³⁵⁰⁵ 范文澜（一八九三——一九六九），浙江绍兴人。当时任延安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

³⁵⁰⁶ 指范文澜一九四〇年在延安新哲学会年会上关于中国经学简史的讲演提纲。这个提纲后经整理于同年连续发表在延安《中国文化》第二卷第二、第三期上，题为《中国经学史的演变》。

³⁵⁰⁷ 康、梁、章、胡，指康有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广东南海人）、梁启超、章炳麟、胡适。他们都是在近代中国经学史和思想史上有重大影响的学者。

³⁵⁰⁸ 廖平（一八五二——一九三二），四川井研人，中国近代经学家。吴虞（一八七一——一九四九），四川新繁（今属新都）人，五四运动前后曾写文章批判旧礼教，后来很少发表新见。叶德辉（一八六四——一九二七），湖南湘潭人，是维护封建统治的古文学者。

给毛岸英、毛岸青的信

(1941年1月31日)

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学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

人家恭维你抬举你，这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上进；但有一样坏处，就是易长自满之气，得意忘形，有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危险。

你们有你们的前程，或好或坏，决定于你们自己及你们的直接环境，我不想来干涉你们，我的意见，只当作建议，由你们自己考虑决定。总之我欢喜你们，望你们更好。

驳第三次“左”倾路线

(1941年)

据我们历来的想法，所谓对于情况的估计，就是根据我们对于客观地存在着的实际情况，加以调查研究，而后反映于我们脑子中的关于客观情况的内部联系，这种内部联系是独立地存在于人的主观之外而不能由我们随意承认或否认的。它有利于我们也好，不利于我们也好，能够动员群众也好，不能动员也好，我们都不得不开调查它，考虑它，注意它。如果我们还想改变客观情况的话，那就可以根据这种真实地反映了客观情况内部联系的估计，规定行动方针，转过去影响客观情况，把它加以改造。这时，如果客观情况是有利于我们前进的，我们就向群众说：你们前进吧！如果是不利于我们前进的，我们就向群众说：你们暂停吧（近乎“等待主义”），或说你们退却吧（大有“机会主义”嫌疑）！据我想，这就叫做马克思主义的起码观点呢！

必须明白，在日本人与国民党有巩固统治的一切地方（这种地方占全国十分之九以上的区域），绝对不能采取流血的武装斗争形式，而只能采用不流血的和平斗争形式。和平斗争也有两种，一种是合法的公开的斗争，又一种是非法的秘密的斗争，但都是不流血的、不暴动的、非武装的斗争形式，二者统一起来，就是在敌人统治区域的策略路线。

中国虽然不是民主的法治的国家，人民没有政治自由，尤其在日本统治区域对人民压迫得更厉害；但是政府的法律、社会的习惯，依然有很多地方可以利用，有很多矛盾、间隙、漏洞是可

以被我们利用的。必须采取合法的能够公开的各种各色的斗争形式，才有人来，才能一般地避免政府的逮捕与解散，才能保全力量与积蓄力量。

公开工作之外，还要有秘密工作与之相配合，这就是党的秘密组织工作，群众的秘密组织工作（作为群众公开组织的核心），党派的秘密联合行动，秘密的情报工作，公开组织与公开斗争的事先秘密准备等。没有这一方面的工作，是不能存在于敌人统治区域的，公开工作也失了灵魂。

中国的特点是武装斗争与和平斗争的统一，在和平斗争方面，又是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的统一。这是极复杂的政治科学的一整套，中国共产党人如不学会这一整套政治科学，是无法胜利的。

“平分土地”的结果，并没有动摇全部私有制，只动摇了封建主义的私有制，使之变为农民的私有制，而且在农村中仍然摆着走资本主义道路或走社会主义道路两个前途，更不要说没有动摇城市中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私有制了。

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人类历史是人类自己造出的。但不认识世界就不能改造世界，“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³⁵⁰⁹，这一方面，我们的老爷是茫然了。必然王国之变为自由王国，是必须经过认识与改造两个过程的。欧洲的旧哲学家³⁵¹⁰，已经懂得“自由是必然的认识”这个真理。马克思的贡献，不是否认这个真理，而是在承认这个真理之后补充了它的不足，

³⁵⁰⁹ 见列宁《怎么办？》第一章第四节（《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1页）。

³⁵¹⁰ 指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斯宾诺莎和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等。

加上了根据对必然的认识而“改造世界”³⁵¹¹这个真理。“自由是必然的认识”——这是旧哲学家的命题。“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命题。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世界中去认识世界，又从认识世界中去改造世界，就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中国中去认识中国，又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就不是一个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说人比蜜蜂不同的地方，就是人在建筑房屋之前早在思想中有了房屋的图样³⁵¹²。我们要建筑中国革命这个房屋，也须先有中国革命的图样。不但须有一个大图样，总图样，还须有许多小图样，分图样。而这些图样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所得来的关于客观实际情况的能动的反映（关于国内阶级关系，关于国内民族关系，关于国际各国相互间的关系，以及关于国际各国与中国相互间的关系等等情况的能动的反映）。

老爷们既然完全不认识这个世界，又妄欲改造这个世界，结果不但碰破了自己的脑壳，并引导一群人也碰破了脑壳。老爷们对于中国革命这个必然性既然是瞎子，却妄欲充当人们的向导，真是所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了。

两条战线斗争，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就是对于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着的一定事物的过去与现在的发展状态加以分析与综合，

³⁵¹¹ 参见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19页）和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一编第十一节《道德和法。自由和必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4页）。

³⁵¹²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五章《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原文是：“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2页）。

因而可以肯定它的暂时安定性（即该事物的本质及其属性）的一种方法。

对于每一件具体的事，每一个具体的人，如果要认识它的性质，就必须使用这种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加以具体的分析与综合的调查研究，才能做出肯定的结论。稍一离开这种方法，稍一不合该事该人的实际，就没有法子做出正确的结论。

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

(1941年8月1日)

抗战以来，我党在了解日本、了解国民党、了解社会情况诸方面是大进一步了，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作风也减少了。但所了解者仍然多属粗枝大叶的、漫画式的，缺乏系统的周密的了解，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作风并未彻底消灭。

党内许多同志，还不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真理。还不了解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还不知道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而情况如不了解，则政策势必错误。还不知道，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而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

从研究典型着手是最切实的办法，由一典型再及另一典型。

给萧军³⁵¹³的信

(1941年8月2日)

我因过去同你少接触，缺乏了解，有些意见想同你说，又怕交浅言深，无益于你，反引起隔阂，故没有即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如得你同意，愿同你再谈一回。

³⁵¹³ 萧军（一九〇七——一九八八），辽宁锦县人。当时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理事。

关于财经建设的基本方针给谢觉哉³⁵¹⁴的信

(1941年8月6日)

近日我对边区财经问题的研究颇感兴趣，虽仍不深刻，却觉其规律性或决定点似在简单的两点，即（一）发展经济，（二）平衡出入口。首先是发展农、盐、工、畜、商各业之主要的私人经济与部分的公营经济，然后是输出三千万元以上的物产于境外，交换三千万元必需品入境，以达出入口平衡或争取相当量的出超。只要此两点解决，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我前信未蒙林老³⁵¹⁵复示，似以所提各点为不切肯要。然区区之意，在使此问题得到合理解决，以达意志统一与行动统一之目的，过去数月的不统一，实在是非常之不利的。然统一首在对财经建设基本方针有一致意见，故就感想所及，提出如上论点，就正于你及林老。如你及林老觉得有错误，即祈毫不客气，一一指正，以归一是。昨日政治局会议决定委托我召集一次有关同志的会议，解决本问题。我想先作个别商讨，然后再开会议，较为有益，未知你意如何？

³⁵¹⁴ 谢觉哉，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中共陕甘宁边区政府党团书记、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

³⁵¹⁵ 林老，指林伯渠，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

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³⁵¹⁶

(1941年9月10日)

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

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

我们反对主观主义，是为着提高理论，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

要用分析的方法来解决。这是过去资产阶级提出的科学方法，但还要综合。我们要用分析和综合的方法，从整个事物中抽出问题来作分析，再加以综合。

³⁵¹⁶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关于农村调查³⁵¹⁷

(1941年9月13日)

我们是信奉科学的，不相信神学。所以，我们的调查工作要面向下层，而不是幻想。同时，我们又相信事物是运动的，变化着的，进步着的。因此，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

对立统一，阶级斗争，是我们办事的两个出发点。

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分析。应该是分析而又综合，就是在第二步骤的分析中，也有小的综合。

详细地占有材料，抓住要点。材料是要搜集得愈多愈好，但一定要抓住要点或特点（矛盾的主导方面）。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如果你调查的九样都是一些次要的东西，把主要的东西都丢掉了，那末，仍旧是没有发言权。

假若丢掉主要矛盾，而去研究细微末节，犹如见树木而不见森林，仍是无发言权的。

怎样使对方说真话？各个人特点不同，因此，要采取的方法也各不相同。但是，主要的一点是要和群众做朋友，而不是去做侦探，使人家讨厌。群众不讲真话，不怪群众，只怪自己。

³⁵¹⁷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对中央妇委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调查团的讲话。

《文化课本》序言

(1942年1月17日)

一个革命干部，必须能看能写，又有丰富的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以为从事工作的基础与学习理论的基础，工作才有做好的希望，理论也才有学好的希望。没有这个基础，就是说不识字，不能看，不能写，其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限于直接见闻的范围，这样的人，虽然也能做某些工作，但要做得好是不可能的；虽然也能学到某些革命道理，但要学得好也是不可能的。

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员的关系³⁵¹⁸

(1942年3月)

这些党员与党组织，至今还不懂得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内容与意义。他们违背我党密切联系民众的原则。他们不是密切联系民众，而是孤立于民众之外；不是站在民众之中，虚心体会民众的心理，而是站在民众之上，自以为是，称王称霸。

他们至今还不明白，国事是国家的公事，并非一党一派的私事。共产党的唯一任务，就在团结全体人民，奋不顾身地向前战斗，推翻民族敌人，为民族与人民谋利益，绝无任何私利可言。而共产党员自始至终都只是人民中的极少数，没有绝大多数人民了解我党主张，真心实意地愿与我党合作，我党主张便无从实现。

³⁵¹⁸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决定草案。这个文件后来没有发出。

如何研究中共党史³⁵¹⁹

(1942年3月30日)

如何研究党史呢？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当然也要遵照这个方法。我今天提出的只是这个方法的一个方面，通俗地讲，我想把它叫作“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

当国民党准备实行叛变革命，要把无产阶级和农民丢了，要把我们和革命群众丢了的时候，我们还和它联合，这是右的机会主义。情况变化了，我们的政策路线没有跟着变。右的倾向是一切联合反对斗争。陈独秀路线的根本特点，便是一切联合反对斗争，就是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叛变了的时候，还要同它联合。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策变了，而我们的政策不变。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打击革命了，我们的政策也还是不变。这就犯了右的错误。在联合中应该一方面与它联合，一方面与它斗争。

“九·一八”到遵义会议，当一个民族敌人打进来，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已经变化了的时候，我们的政策没有跟着变，还是过去的一套，这就发生了“左”的东西。那时的领导路线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九·一八”以后情况变化了，上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公开倾向我们，如孙科、黄炎培等。

³⁵¹⁹ 这是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的讲话。

但是我们说他们是改良主义，说他们是我们的主要打击对象。把这些人当作主要的打击对象，是不对的。

我想，为了有系统地研究中共党史，将来需要编两种材料，一种是党内的，包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种是党外的，包括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等。两种材料都按照年月先后编排。两种材料对照起来研究，这就叫做“古今中外法”，也就是历史主义的方法。我们研究党史，必须全面看，这样研究党史，才是科学的。我们研究党史，必须是科学的，不是主观主义。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恨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那就是把历史看成是少数人创造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不是主观主义，应该找出历史事件的实质和它的客观原因。只看客观原因够不够呢？不够的，还必须看到领导者的作用，那是有很大作用的。但是领导人物也是客观的存在，搞“左”了，搞右了，或者犯了什么错误，都是有客观原因的，找到客观原因才能解释。

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我们有些同志有一个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国为中心，作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不研究中国的特点。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如果不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的发展，党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我们的研究就不会有结果。

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的讲话³⁵²⁰

(1942年3月31日)

关于整顿三风问题，各部门已开始热烈讨论，这是很好的现象。但也有些人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的观念和冷嘲暗箭的办法。近来颇有些人要求绝对平均，但这是一种幻想，不能实现的。我们工作制度中确有许多缺点，应加改革，但如果要求绝对平均，则不但现在，将来也是办不到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应该拒绝。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

³⁵²⁰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召开的《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的讲话要点。

关于整顿三风³⁵²¹

(1942年4月20日)

总之，对付黑暗需要加强教育，迎接光明也需要加强教育，无论怎样讲，我们都需要加强教育。

自由主义是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共产党员是不应该有的。

大多数地方大体上都有这三种人，积极热心而又正确的，平常的，落后的。这些人我们不能平均看待。在干部中间实行平均主义是不好的，平均主义是使积极分子、平常分子向落后分子看齐。我们要使落后分子、平常分子向积极前进分子看齐，要使落后的、思想意识和行动比较差的、不正确的同志向正确的积极的同志看齐，使平常状态的同志向积极的同志看齐。没有这样的引导，使积极的和落后的混同在一起，对积极的没有鼓励，和落后分子一样看待，这是错误的。

³⁵²¹ 这是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会议上的报告。

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相结合³⁵²²

(1942年5月28日)

一个基本问题，就是要破除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才能够转变为无产阶级的思想，才能够有马列主义的党性。解决了这个思想上的问题才能够在思想上与无产阶级、与工农大众相结合；有了这样的基础，才可能在行动上和工农兵、和我们党相结合。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总是要格格不入的。

在对作品的评价上，有的同志说是抹杀了艺术性，也有的说是抹杀了革命性。所谓抹杀革命性，就是说，只要是艺术的东西，只要是艺术水平高的文学艺术作品，就认为是好的。他们特别强调这一方面，而对立场问题，观点问题，马列主义基本观点问题，向工农兵取材问题，给谁读的问题，与工农兵密切结合或完全为工农兵这些问题，认识不清楚。

许多人都有忽视革命性这一个偏向。他们忽视学习马列主义，忽视拿马列主义的思想来破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头脑中的影响。还有没有其他偏向呢？有的，这就是太强调革命性而忽视艺术性，认为只要是革命的东西，标语口号式的也好，艺术上不像样子的东西也行。把文学艺术的革命性所需要的艺术形态也不要了，这又是一种偏向。……没有艺术性，那就不叫做文学，不叫做艺术。不注重艺术形式的问题，只注重作品的政治内容，这就把艺术与其他东西的区别取消了。说艺术无须乎带有

³⁵²² 这是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会上报告的第三部分。

什么特殊性，它在革命工作中也不是特殊部门，这种看法同样是一种偏向。

我们认为革命性是从低级的到高级的，艺术性也是从低级的到高级的。讲革命性是从抗日到马列主义，即从低级到高级。在艺术上，我们采取的政策和革命性一样，也是从低级到高级，即是从萌芽状态起，一直到高级的，到托尔斯泰、高尔基、鲁迅等最精湛的。艺术性高的我们要，低的我们也要。像墙报、娃娃画娃娃，我们也要，那是萌芽，有发展的可能性，有根在那里。老百姓唱的歌，民间故事，机关里的墙报，战士吹牛拉故事，里面都有艺术。一字不识的人可以讲出美丽的故事，连说的话也是艺术性的，我便听过许多这样的故事。忽视了这些，眼睛只看到高的，看不到低的，说老百姓粗手粗脚算得什么，轻视那些东西，甚至看不起普通的艺术工作者，看不起墙报、农村通讯，不懂得士兵、农民能动手写几百字的墙报具有很大意义，这是不对的。高级文艺工作者也只有和普通文艺工作者，和人民发生联系，才有出路，他才有群众，才有牛奶吃，这是老百姓给他的，不然便是空的。

给聂荣臻的电报³⁵²³

(1942年7月4日)

此次整风是全党的，包括各部门各级干部在内，所谓各部门，就是不但有地方，还有军队，所谓各级，就是不但有下级，而且主要与首先的对象是高中两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只要把他们教育好了，下级干部的进步就快了。在一个根据地内，主要应教育边区与地委两级，其次是县一级，只要他们有了正确方向，区、村干部的毛病就易纠正。我说这点，是想引起你们注意抓紧党政军民学个方面高级干部的学习领导，克服在他们中存在的三风不正的残余。

³⁵²³ 见1984年10月《党史研究》第5期。

山东有可能成为战略转移的枢纽³⁵²⁴

(1942年7月9日)

有一点须与你商酌的，即是山东的重要性问题。……须估计日本战败从中国撤退时，新四军及黄河以南部队须集中到华北去，甚或整个八路、新四须集中到东三省去，方能取得国共继续合作的条件（此点目前不须对任何人说），如此则山东实为转移的枢纽。同时又须估计那时国民党有乘机解决新四的可能，如蒋以重兵出山东切断新四北上道路则新四甚危险，故掌握山东及山东的一切部队（一一五师、山纵、杨苏纵队³⁵²⁵）造成新四向北转移的安全条件，实有预先计及之必要。

³⁵²⁴ 这是毛主席写给胡服的信。

³⁵²⁵ 山纵，指张经武任指挥、黎玉任政治委员的八路军山东纵队。杨苏纵队，指杨得志任司令员、苏振华任政治委员的八路军第二纵队。

关于报纸和翻译工作问题给何凯丰³⁵²⁶的信

(1942年9月15日)

中央须设一个大的编译部，把军委编译局并入，有二三十人工作，大批翻译马、恩、列、斯及苏联书籍，如再有力，则翻译英、法、德古典书籍。……学个唐三藏及鲁迅，实是功德无量的。

³⁵²⁶ 何凯丰，又名何克全，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

(1942年12月)

我们考察一下从古代的人类到今天的贫农，他们之所以能够活下去，并且活得同野兽不同的原因，无非就是他们有两只手，并且将手接长起来——拿着工具。我们再来考察一下我们自己，原来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有两只手，我们也可以将手接长起来——拿着工具。这个考察很重要，这样一来，我们的问题就立即解决了。总之，我们是确信我们能够解决经济困难的，我们对于在这方面的一切问题的回答就是“自己动手”四个字。

这一阶段的经验，使我们发生要感谢那些封锁我们的人们的感觉。因为封锁这件事，除了它的消极的坏处一方面之外，还产生了一个积极的方面，那就是促使我们下决心自己动手，而其结果则居然达到了克服困难的目的，学得了经营经济事业的经验。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古话，对于我们，是完全自觉地被理解的。

建立经济核算制，克服各企业内部的混乱状态。为此必须：第一，每一工厂单位应有相当独立的资金（流动的和固定的），使它可以自己周转，而不致经常因资金困难妨碍生产。第二，每一工厂单位的收入和支出，应有一定的制度和手续，结束收支不清、手续不备的糊涂现象。第三，依照各厂具体情况，使有些采取成本会计制，有些则暂不采取，但一切工厂必须有成本的计算。第四，每一工厂的生产，应有按年按月生产计划完成程度的检查制度，不得听其自流，很久不去检查。第五，每一工厂应有节省

原料与保护工具的制度，养成节省原料与爱护工具的习惯。所有这些就是经济核算制的主要内容。有了严格的核算制度之后，才能彻底考查一个企业的经营是否是有利的。

改善工厂的组织与管理，克服工厂机关化与纪律松懈状态。首先应该改革的是工厂机关化的不合理现象。目前我们有许多工厂在组织上非常不合理，人员众多，组织庞大，管理人员和直接生产人员的分配不适当，以及将管理大工厂的制度应用到我们的小工厂上面，这些现象必须迅速改变，使一切工厂实行企业化。

一切工厂，应依自己经济的盈亏以为事业的消长。一切从业员的薪给，应由工厂自己的盈利解决，而不支领公粮、公衣与公家的津贴费。其次是实行十小时工作制及计件累进工资制，借以提高劳动热忱，增加生产。八小时工作制，是将来大工业发展时应该实行的，目前则应一律实行十小时制，应使职工们了解这是抗战的需要。平均主义的薪给制抹杀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之间的差别，也抹杀了勤惰之间的差别，因而降低劳动积极性，必须代以计件累进工资制，方能鼓励劳动积极性，增加生产的数量与质量。

有许多的部队、机关、学校，在他们的生产活动中，负行政指挥责任的同志不大去管，甚至有少数人完全不闻不问，而仅仅委托于供给机关或总务处去管，这是由于还没有懂得经济工作的重要性的原故。其所以还不懂得，或则中了董仲舒们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³⁵²⁷这些唯心的骗人的腐话之毒，还没有去掉得干净；或则以为政治、党务、军事是第一位的，是最重要的，经济工作虽然也重要，但不会重要到那种程度，觉得

³⁵²⁷ 见《汉书·董仲舒传》。

自己不必分心或不必多分心去管它。但是这些想法全是不对的。我们不是处在“学也，禄在其中”的时代，我们不能饿着肚子去“正谊明道”，我们必须弄饭吃，我们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离开经济工作而谈教育或学习，不过是多余的空话。离开经济工作而谈“革命”，不过是革财政厅的命，革自己的命，敌人是丝毫也不会被你伤着的。

我们要有一批脱离生产事务的革命职业家，我们也要有一批医生、文学艺术工作者及其他人等，但是这些方面的人决不能过多，过多就会发生危险。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用之者疾，为之者舒，是要塌台的。

我们不但应该会办政治，会办军事，会办党务，会办文化，我们也应该会办经济。如果我们样样能干，惟独对于经济无能，那我们就是一批无用之人，就要被敌人打倒，就要陷于灭亡。

为了革命，为了抗战，我们向人民要东西是完全合理的。我们的同志做了这一方面的工作算是做了他们应做的革命工作，这是很好的。但这只是做了一个方面的工作，而且还不是第一个方面的工作。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予人民呢？就目前陕甘宁边区的条件说来，就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这一方面的工作是每个在农村工作的共产党员的第一位工作。只有在做了这一方面的工作，并确实生了成效之后，我们去做第二方面的工作——向人民要东西的工作时，我们才能取得人民的拥护，他们才会说我们要东西是应该的，是正当的；他们才会懂得他们如不送出粮草等等东西给政府，则他们的生活就不会好，就不会更好。这样我们的工作才不是勉强的，

才会感觉顺利，才会感觉真正和人民打成一片了。这就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根本政策，每个同志（军队的同志也在内）都要好好去研究。只有在我们的同志懂得并且实行了这样两方面工作的配合时，我们方能算得上一个完全的共产主义的革命家，否则我们虽也在做革命工作，虽也是一个革命家，却还不是一个完全的革命家。而且，对于某些同志说来，他们还是一个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者，因为他们只知道向群众要东西，却不知道或不愿意给群众一点东西，引起群众讨厌他们。

妇女工作者应参加经济工作³⁵²⁸

(1943年2月)

妇女工作者本身必须学得农村经济知识，了解妇女生产内容，才能真正成为农村群众生产的组织者与指导者。许多有能力的女同志必须到合作社去工作。再则许多女党员、女干部必须到公营经济机关中去工作，使公营经济发展起来。那些浮在上层，空闲无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³⁵²⁸ 这是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稿时加写的一段话。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的要点

(1943年3月16日)

报纸是很重要的一种方式。中央同志要善于利用报纸，要有一半的时间用在报纸上。《解放日报》自去年四月改版后有进步，摸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报纸材料的来源就无穷了。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本质），是具体地分析具体问题。

审查干部也要领导与群众相结合。方法是要从下层总结经验，然后再加以指导，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或者说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唯一的来源、唯一的出路是群众。

给何凯丰的信

(1943年4月22日)

生日决定不做。做生日的太多了，会生出不良影响。目前是内外困难的时候，时机也不好。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

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³⁵²⁹

(1943年5月26日)

共产国际³⁵³⁰是列宁手创的。在它存在的整个历史时期中，在帮助各国建立真正革命的工人阶级政党上，在组织反法西斯斗争的伟大事业上，有其极巨大的功劳。共产国际在中国人民中的影响，是很大的。

革命是不能输出也不能输入的。虽然有共产国际的帮助，但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及其发展，乃是由于中国本身有了觉悟的工人阶级，中国工人阶级自己创造了自己的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虽然还只有二十二年的历史，但却进行了三次伟大的革命运动。

在这些革命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自己的身经百炼的优秀干部。自一九三五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以来，共产国际即没有干涉过中国共产党的内部问题，而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工作，是做得很好的。

³⁵²⁹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召集的延安干部大会上的报告。会议主要是传达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

³⁵³⁰ 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一九一九年三月在列宁领导下成立。一九二二年中国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致电毛泽东，通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将于五月二十二日公布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请中共中央急速讨论这一提议，并将意见告知。五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复电季米特洛夫，表示赞成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提议。五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六月十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定共产国际正式宣告解散。

既然共产国际对中国以及各国有很大的功劳，那末，为什么又要宣布解散呢？按照马列主义的原则，革命的组织形式应该服从于革命斗争的需要，如果组织形式已经与斗争的需要不相适合时，则应取消这个组织形式。现在，共产国际这个革命的组织形式已经不适合斗争的需要了，如果还继续保存这个组织形式，便反而会妨碍各国革命斗争的发展。

共产国际的解散，不是为了削弱各国共产党，而是为了加强各国共产党，使各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更加适应于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

给彭德怀的信

(1943年6月6日)

你在两月前发表的关于民主教育谈话，我们觉得不妥。兹将我的意见列下：例如谈话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的定义出发，而不从当前抗日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又如不强调民主是为着抗日的，而强调为着反封建。又如不说言论、出版自由是为着发动人民的抗日积极性与争取并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权利，而说是从思想自由的原则出发。又如不说集会、结社自由是为着争取抗日胜利与人民政治经济权利，而说是为着增进人类互助团结与有利于文化、科学发展。又如没有说汉奸与破坏抗日团结分子应剥夺其居住、迁徙、通信及其他任何政治自由，而只笼统说人民自由不应受任何干涉。其实现在各根据地的民主、自由对于某部分人是太大、太多、太无限制，而不是太小、太少与过于限制，又如说法律上决不应有不平等规定，亦未将革命与反革命加以区别。又如在政治上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是不适当的，现在的任务是用战争及其他政治手段打倒敌人，现在的社会基础是商品经济，这二者都是所谓己所不欲，要施于人。只有在阶级消灭后，才能实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消灭战争、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目前国内各阶级间有一种为着打倒共同敌人的互助，但是不仅在经济上没有废止剥削，而且在政治上没有废止压迫（例如反共等）。我们应该提出限制剥削与限制压迫的要求，并强调团结抗日，但不应提出一般的绝对的阶级互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

英勇斗争的二十二年³⁵³¹

(1943年7月1日)

三十年来世界上爆发了两次空前规模的战争，这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第一次世界大战曾被列宁正确地预见，而预见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是斯大林，他们的正确预见，证明马列主义是真正的科学真理。

没有苏联红军、苏联人民和苏联领导者斯大林，没有斯大林格勒一战，人类的命运就还在不可知之数。有了一个列宁、斯大林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旧的俄国经过革命变成社会主义的苏联。世界上有了这一块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土，就影响整个世界，以至现在成为全世界人类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角。

这一次的反法西斯战争，必然要创造出更加进步的世界、一个更加进步的中国来。法西斯想拉着世界往后退，那是不行的。向前进步，这就是我们的大方向。

³⁵³¹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举办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二周年和抗战六周年干部晚会上的讲话。

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1943年8月8日)

不论是外国还是中国，古代还是现在，剥削阶级的生活都离不了老百姓。他们讲“爱民”是为了剥削，为了从老百姓身上榨取东西，这同喂牛差不多。喂牛做什么？牛除耕田之外，还有一种用场，就是能挤奶。剥削阶级的“爱民”同爱牛差不多。我们不同，我们自己就是人民的一部分，我们的党是人民的代表，我们要使人民觉悟，使人民团结起来。

共产党还要办一件事，还要换一个朝，就是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社会。有些同志，包括有些老干部，只知道头一个换朝，不知道第二个换朝。头一个换朝他们有经验，叫做打土豪、分田地，他们赞成；现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他们赞成；反特务斗争，他们赞成；不让胡宗南进攻边区，他们赞成。但这些都是属于刚才讲的那个头一个换朝。

什么叫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就是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有全国人民参加的，基本上不破坏私有财产制度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就是我们现在干的头一步的革命。

但是，只有这一步是不够的。我们的干部还必须懂得将来要废除私有财产制度。现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将来是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我们说的两个革命。

干这两个革命，就需要学习季米特洛夫讲的四条³⁵³²。你是不是无限忠心，要用客观的标准来衡量。……联系群众这一条，也要用客观标准来衡量。比如，一个人死了开追悼会，群众的反映怎样，这就是衡量的一个标准。有些人高高在上，官位很大，称首长，好像老百姓都拥护他，其实这不能说明问题，要看最后的盖棺论定，要看开追悼会那一天老百姓落不落泪。有些干部死了，我看老百姓就不见得落泪，他是自封的群众领袖。因为你做了官，老百姓不得和你打交道，其实公事一办完，人家就掉头而去，不大理睬你了。真正的群众领袖，到开追悼会那一天，老百姓会觉得他死了很可惜，至少不会觉得死了也好，可以省下小米。刘志丹³⁵³³同志牺牲后，陕北的老百姓伤心得很，这说明他是真正的群众领袖。群众领袖是群众封的呢？还是我们自己封的呢？季米特洛夫说，是要群众封的，是群众根据自己的经验来确认的。

刚才讲了两个革命，而要完成这两个革命，就要造就一个真正符合这四条标准的革命政党。……我们的任务很艰巨，要进行两个革命，都要在我们手里完成。

³⁵³²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一九三五年八月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作的《工人阶级统一起来反对法西斯（对大会讨论的答复）》中提出正确选择干部的四项条件：第一，要无条件地献身于工人阶级的事业，忠实于党，并且在敌人面前——在战斗中、在监狱中、在法庭中——受过考验的；第二，要极密切地接近群众；第三，要能独立地自觅方向，不怕担负决策的责任；第四，不但在对一切违背布尔什维克路线的现象作不调和的对抗时，而且在对阶级敌人作斗争时，都要守纪律，受布尔什维克的锻炼。

³⁵³³ 刘志丹（一九〇三——一九三六），陕西保安（今志丹）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八年四五月，同谢子长等领导渭华起义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开辟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五年九月任红十五军团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同年十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办事处副主任、红二十八军军长和红军北路军总指挥等职。一九三六年三月东渡黄河参加东征，四月在山西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英勇牺牲。

我们要把政治水平和理论水平提高，使我们党更统一，不结班子，结成一个大党。每一个人都能够不怕牺牲，能够无限忠心，能够联系群众，能够独立工作，能够遵守纪律，团结一致地坚决地向敌人斗争。我们这一辈子就干这两个革命。

同志们！完成这两次革命不是像煮一顿饭或造一所房子那样简单，而是要推翻我们的阶级敌人。

我们要干两个革命，要使两个革命在我们手里取得胜利。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为一个共产党的干部，我们要有这样的自信心，并且要学好本领，为劳苦大众办好这两件事。

切实执行十大政策³⁵³⁴

(1943年10月14日)

我们的同志，不管有什么毛病，只要肯改，只要有马列主义精神，就好办事。凡是能同群众打成一片的即是马列主义者，即能成为群众的领袖，要在军队中努力提倡这种作风。

用霸道对敌人是正确的，对敌人就是要狠，但用霸道对人民、对党、对政府则是错误的，对人民对群众应讲王道。我们要有两种态度，对敌人用霸道，对人民用王道。这一条要记得非常牢固。要把军队同人民打成一片的作风传开来、传下去，这是无产阶级军队同资产阶级军队的根本区别。我们拥护人民，为人民打敌人，对人民讲王道，采取自我批评态度，反对军阀主义倾向。一切问题的中心是老百姓问题，武装的人民（军队）与非武装的人民要打成一片。

土地革命，是第一个革命。但是，如果不进行从个体劳动转到集体劳动的第二个生产关系即生产方式的改革，则生产力还不能进一步发展。将个体经济为基础的劳动互助组织即农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加以发展，生产就可以大大提高，增加一倍或一倍以上。如果全边区的劳动力都组织在集体互助的劳动组织之中，全边区一千四百万亩耕地的收获就会增加一倍以上。这种方法将来可推行到全国，在中国的经济史上也要大书特书的。这样的改革，

³⁵³⁴ 这是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的第四部分。这个指示的前三部分已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题为《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

生产工具根本没有变化，但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变化了。从土地改革到发展劳动互助组织两次变化，这是生产制度上的革命。

合作社问题基本上是一个群众观点问题，要想到群众。有无群众观点是我们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群众观点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与归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想问题从群众出发就好办。部队中的负责同志要替士兵着想，机关、学校的负责同志要替大厨房着想，替杂务人员着想，所有的共产党员要替人民着想。

要学习马列主义的方法，有些同志自以为马列主义很多，其实一接触到实际工作，可以说连马列主义的气味都未闻到一点。马列主义的方法，基本的是分析的方法，要讲老实话，才能纠正错误，求得进步。如果自以为是，对整个工作不加分析，只讲成绩，怕讲缺点、错误，就无法使工作进步。工作是一个整体，如加以分析，指出其成绩和缺点，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是分析的方法。对工作还要做结论，即是说要综合。不作分析就无法综合，综合是分析的结果，分析是综合的手段，对事物要有解剖，才能总结。有些犯主观主义的同志，就不懂得分析的方法。

语言、文字、思想是反映客观实际的，但是，客观实际的规律要反映成观念形态的规律，需要有千百次的反复，才能比较正确。要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妄自尊大。我们看同志有一个标准，就是看他有无谦逊的态度。

以斗争求团结的原则，要运用到四个范畴。第一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要从斗争中把资产阶级提高到赞同抗日纲领的地位，无产阶级是可以领导资产阶级的。我们要按实际办事，不是按书本办事，而王明则反对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说列宁没有讲过。第二是无产阶级对农民。这是与第一个范畴完全不同的范畴。农

民是小生产者，是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可靠的同盟军，对农民要采取同志态度，以斗争求团结，把农民提高到接受共产党的纲领的水平。第三是在无产阶级自己队伍内。以斗争求团结，反对一切分裂无产阶级的落后思想，反对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孟什维克思想。第四是在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内。要发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反对一切机会主义思想，以斗争求团结。

马列主义的方法有三条，一是理论同实际相联系，二是反对自发论，三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批评，结果是使党团结；一种是不正确的批评，如四中全会³⁵³⁵、五中全会³⁵³⁶的那种批评，结果是使党分裂。我们要发扬正确的批评，反对不正确的批评，这就是整风。

³⁵³⁵ 四中全会，指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王明等人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通过这次会议取得了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了长达四年之久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的统治。

³⁵³⁶ 五中全会，指一九三四年一月中旬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错误地断定中国已存在“直接革命形势”，第五次反“围剿”“即是争取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使“左”倾错误发展到顶点。

关于人的基本特性及其他³⁵³⁷

(1943年12月17日)

人是社会的动物，不是有无思想。一切动物都有精神现象，高等动物有感情、记忆，还有推理能力，人不过有高级精神现象，故不是最基本特征。

人是物质发展的一个高级形态，不是最终形态，它将来还要发展，不是什么万物之灵。人首先是社会的动物，资产阶级总是强调人的理性（精神），我们不应如此。

当作人的特点、特性、特征，只是一个人的社会性——人是社会的动物，自然性、动物性等等不是人的特性。

拿体质说，现在人的脑、手、五官，完全是在几十万年³⁵³⁸的劳动中改造过来了，带上社会性了，人的聪明与动物的聪明，人的本能与动物的本能，也完全两样了。

人的一切遗传都是社会的，是在几十万年社会生产的结果，不指明这点就要堕入唯心论。

所谓是非善恶是历史地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地发展的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统一，不同阶级的不同真理观，这就是我们的非论。道德是人们经济生活与其他社会生活的要求的反映，不同阶级有不同的道德观，这就是我们的善恶论。把人性分为自然性、

³⁵³⁷ 这是毛泽东在刘少奇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关于人性、是非、善恶等问题给续范亭复信上写的批语的主要部分。

³⁵³⁸ 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证明，人类的历史至少有二百万年。

社会性两个侧面，并承认自然性是无善无恶的，就给唯心论开了后门。

剥削阶级当着还能代表群众的时候，能够说出若干真理，如孔子³⁵³⁹、苏格拉底³⁵⁴⁰、资产阶级，这样看法才是历史的看法。

王阳明³⁵⁴¹也有一些真理。

孔孟³⁵⁴²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

³⁵³⁹ 孔子（公元前五五一——前四七九），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春秋后期思想家、教育家，儒家的创始人。

³⁵⁴⁰ 苏格拉底（公元前四六九——前三九九），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

³⁵⁴¹ 王阳明（一四七二——一五二八），原名王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明代唯心主义哲学家。

³⁵⁴² 孟，指孟子（约公元前三七二——前二八九），名轲，字子舆，邹（今山东邹县）人。战国时期思想家。

给杨绍萱、齐燕铭³⁵⁴³的信³⁵⁴⁴

(1944年1月9日)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郭沫若³⁵⁴⁵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³⁵⁴⁶，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

³⁵⁴³ 杨绍萱（一八九三——一九七一），河北滦县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员。
齐燕铭（一九〇七——一九七八），北京市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党校教务处文教科科长。

³⁵⁴⁴ 这是毛泽东看了杨绍萱、齐燕铭编导、中共中央党校俱乐部演出的平剧（即京剧）《逼上梁山》后，写给编导者的信。

³⁵⁴⁵ 郭沫若（八九二——一九七八），四川乐山人。抗日战争时期，曾在周恩来任副部长的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任第三厅厅长、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在国民党统治区组织进步文化人士从事抗日宣传工作。

³⁵⁴⁶ 指郭沫若在抗日战争时期写了《屈原》、《虎符》等历史话剧。

关于路线学习、工作作风和时局问题³⁵⁴⁷

(1944年3月5日)

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急性病是在小资产阶级十分广大的社会中的一种必然性，不是个人的偶然现象，而是社会现象。无产阶级的社会存在也是一种必然性，无产阶级思想是革命热情与实际精神相结合。无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是用改造与感化的方法，引导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进入社会主义。对小资产阶级不能采用急躁的消灭的方针。

中国社会最基本特点是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的大多数，党对这个问题要慎重处理。反映到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及由于这种思想而产生的错误，也不是个人问题，而是社会现象，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现象。这个规律是由于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采用的政策会反映到无产阶级党内来。

对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这一段历史，也不要一切否定。当时我和博古、洛甫同志在一起工作，有共同点，都要打蒋介石，分歧点是如何打蒋介石，是策略上的分歧。在土地问题上，对六大决议中关于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的政纲，是没有争论的。争论是在没收后博、洛等主张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而我是不同意的。如果把过去一切都否定，那就是一种偏向。我们对问题要分析，不要笼统地一概否定。我在写

³⁵⁴⁷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也说到要保留好的东西，这才是实事求是。

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³⁵⁴⁸

(1944年3月22日)

经济、文化如果不会搞，那会怎么样呢？如果不会搞，这个共产党就没有多大用处。用处也有一点，就是善于破坏旧的东西，善于打击敌人，能够把敌人打败，但是很大的用处就没有。因为你不学会经济、文化，就不能使人人吃饱小米饭，老百姓就会没有猪肉吃，又不识字，又不会闹秧歌。

我们应该知道，政治是上层建筑，经济是基础。政治好比就是这个房子，经济就是地基。我们搞政治，搞政府，搞军队，为的是什么呢？就是要破坏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政府、旧军队。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军事力量不取消，生产力就不能解放，经济就不能发展。因此，第一个任务就是打倒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军事，而我们搞政治、军事仅仅是为着解放生产力。

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政治、军事的力量，是为着推翻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推翻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目的是为着解放生产力，发展经济。经济是政治、军事的基础，政治、军事是上层建筑。地基是经济，根本目的也是发展经济。政治、军事之所以放在第一，是因为如果没有它们，生产力得不到解放，就没有可能谈其他问题。文化是反映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但它同时又能指导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

³⁵⁴⁸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文化是不可少的，任何社会没有文化就建设不起来。封建社会有封建文化，封建文化是宣传封建主义的道理。资本主义社会也有资本主义的文化，资本主义社会如果没有文化，也没法建立起来。现在中国还不是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不占优势，所以中国的文化也是很弱的。在真正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文化提高了生产技术。现在我们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是资本主义的，但又是人民大众的，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老资本主义，而是新资本主义，或者说是新民主主义。这个社会没有文化也不行。比如组织了变工队³⁵⁴⁹需要记账，组织合作社也需要记账，这就需要文化。

³⁵⁴⁹ “变工队”是陕甘宁边区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农业劳动互助组织。“变工”即换工，是农民相互调剂劳动力的方法，有人工换人工、畜工换畜工、人工换畜工等等。参加变工队的农民，各以自己的劳动力或畜力，轮流地给本队各家耕种，结算时，多出了人工或畜工的由少出了的补给工钱。

给陈毅的信

(1944年4月9日)

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点，增益其所不能；照顾大局，只要不妨大的原则，多多原谅人家。忍耐最难，但作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这点意见，请你考虑。

给李鼎铭³⁵⁵⁰的信

(1944年4月29日)

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二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

³⁵⁵⁰ 李鼎铭（一八八一——一九四七），陕西米脂人。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

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的工作报告

(1944年5月21日)

关于发展自己，发展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民主根据地，以此为代表中华民族打击日寇的中心力量，这个问题中央曾做过很多工作来同反对这个方针或不积极执行这个方针的同志作斗争。华中与山东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曾经表现得最严重，差不多花了一九三九年一整年才纠正过来，但后来还是出了皖南事变³⁵⁵¹，到皖南事变后才彻底纠正过来。当日军占领江、浙，国民党逃走一空时，我们的同志不敢当县长，说是没有人委任。当山西新旧军冲突³⁵⁵²时，旧军向新军开枪，新军要不要还枪也成为问题。这些就是在民族战争中不敢实行独立自主政策的具体表现。问题就是要不要独立自主的政策。

³⁵⁵¹ 一九四一年一月，新四军皖南部队九千余人在北移过程中，遭到国民党军队八万余人的包围袭击，经七昼夜浴血奋战，除二千余人突出重围外，其余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扣押。

³⁵⁵² 山西新军，指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是抗日战争初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山西人民抗日武装。山西旧军，指阎锡山的军队。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武装进攻山西新军和八路军。山西新军同八路军一起进行了坚决反击，重创顽军，巩固了抗日根据地。此后，山西新军纳入八路军的战斗序列。

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³⁵⁵³

(1944年5月22日)

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需有工业；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

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

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不关心工业，不关心经济，也不懂得别的什么有益的工作，对于这些一无所知，一无所能，只会做一种抽象的“革命工作”，这种“革命家”是毫无价值的。我们应该反对这种空头“革命家”，学习使中国工业化的各种技术知识。

³⁵⁵³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为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及职工代表会议举行的招待会上讲话的摘要。

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³⁵⁵⁴

(1944年7月14日)

各国共产党只有一件共同的东西，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方法。任何地方的共产党必须将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另一件全然不同的事物即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区分开来，因为后者是这个思想体系的最终目标。

特别是在中国，我们必须严格地将观察、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共产主义方法，同我们实际采用的新民主主义政策加以区别。在中国社会发展的现阶段，实现新民主主义政策是我们的近期目标。没有共产主义的思想方法，就不能正确地指导我们现在的社会革命的民主阶段；而没有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我们就不能将共产主义哲学正确地运用于中国的实际。

我们像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一样，坚信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可是，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国思想的价值。

中国历史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中有很多好东西，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必须把这些遗产变成自己的东西。然而我们中国有些人却崇拜旧的过时的思想，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中国不仅不适用而且有害。这样的东西必须抛弃。

³⁵⁵⁴ 这个谈话原载斯坦因所著《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一九四六年七月曾由晨社译成中文出版。收入《文集》时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按英文原版重新翻译。

外国文化也一样，其中有我们必须接受的、进步的好东西，而另一方面，也有我们必须摒弃的腐败的东西，如法西斯主义。

继承中国过去的思想和接受外来思想，并不意味着无条件地照搬，而必须根据具体条件加以采用，使之适合中国的实际。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和外国思想。我们既反对盲目接收任何思想也反对盲目抵制任何思想。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

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³⁵⁵⁵

(1944年8月12日)

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不解决不要民众的问题，什么都无从谈起。要民众，虽危险也有出路；不要民众，一切必然是漆黑一团。

³⁵⁵⁵ 这是毛泽东在审阅《解放日报》社论稿《衡阳失守后国民党将如何？》时加写的三段文字。

给秦邦宪³⁵⁵⁶的信

(1944年8月31日)

关于原文³⁵⁵⁷不妥之处，我的意见如下：原文着重改造家庭，关于联系群众运动方面说的很少（即在已发表的那篇社论³⁵⁵⁸上亦是如此），而问题的重点，恰是使家庭改造与群众运动联系起来。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使从侵略者、地主、买办手下解放农民，建立近代工业社会。“巩固家庭”的口号，只有和上述种种革命运动联系起来，才是革命的口号。

农民的家庭是必然要破坏的，进军队、进工厂就是一个大破坏，就是纷纷“走出家庭”。实际上，我们是提倡“走出家庭”与“巩固家庭”的两重政策。扩军、归队、招工人、招学生（这后二项将来必多）、移民、出外做革命工作、找其他职业等等，都是提倡走出家庭，这个数目，在现在敌后战场是很大的，在战后也将是很大的。剩下的男女老幼，才是提倡巩固其家庭。实际上，不断地走出，不断地巩固，这就是我们的需要。所以，根本否定“五四”口号，根本反对走出家庭，是不应该也不可能的。

没有社会活动（战争、工厂、减租、变工队等），家庭是不可能改造的。襄垣李来成家的改造，正是在社会群众运动的大浪

³⁵⁵⁶ 秦邦宪，又名博古，江苏无锡人。当时任解放日报社社长。

³⁵⁵⁷ 指原题为《把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建立在家庭里》的《解放日报》社论草稿。

³⁵⁵⁸ 指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五日《解放日报》就山西襄垣李来成建立新式家庭一事发表的社论，题为《发扬根据地新式家庭》。

潮中才获得。农村家庭从封建到民主的改造，不能由孤立的家庭成员从什么书上或报上看了好意见而获得，只能经过群众运动。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日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简单言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

我在改文中加上了解放个性，这也是民主对封建革命必然包括的。有人说我们忽视或压制个性，这是不对的。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

坚持为人民服务³⁵⁵⁹

(1944年9月18日)

中国不亡，是由于有了我们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主要地是由我们支持了抗战局面。

我们的军队是真正人民的军队，我们的每一个指战员以至每一个炊事员、饲养员，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的部队要和人民打成一片，我们的干部要和战士们打成一片。与人民利益适合的东西，我们要坚持下去，与人民利益矛盾的东西，我们要努力改掉，这样我们就能无敌于天下。

我们的军队一向就有两条方针：第一对敌人要狠，要压倒它，要消灭它；第二对自己人，对人民、对同志、对官长、对部下要和，要团结。

³⁵⁵⁹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举办的招待八路军留守兵团全体模范学习代表及从敌后转战归来参加整训的各部队战斗英雄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给郭沫若的信

(1944年11月21日)

你的《甲申三百年祭》³⁵⁶⁰，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

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

³⁵⁶⁰ 1944年郭沫若作品。1944年甲申年，距离李自成甲申之变300周年，亦即明朝灭亡300周年。郭沫若在重庆撰写此文，1944年3月10日脱稿，全文近16000字，3月19日至22日，重庆《新华日报》全文连载，后来延安的《解放日报》亦有转载。书中指出，起义军首领入北京后，“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象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最后李自成在湖北通山县九官山遭地主武装杀害。目的在以借由李自成的失败，要求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记取历史教训，不能重蹈李自成覆辙。

“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学习和时局》本合集第846页。

给陈毅的信（二）

（1944年12月1日）

一切不公不平之事，必须使之归于公平，以利团结对敌。

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又随时准备修正错误，没有什么行不通的。每一个根据地及他处只要有几十个领导骨干打通了这个关节，一切问题就可迎刃而解。

给谢觉哉³⁵⁶¹的信

(1944年12月1日)

政治民主有其自己的内容，经济是其物质基础，而不就是政治民主的内容。文化是精神的东西，它有助于政治民主，也不就是政治的内容。

³⁵⁶¹ 谢觉哉（一八八四——一九七一），湖南宁乡人。当时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

一九四五年的任务³⁵⁶²

(1944年12月15日)

九千万人民中，除老幼及患病者以外，一切男女公民，均应组织在自卫军中，在不脱离生产原则下，轮流担任保卫家乡与协助军队的任务。……九千万人民中，至少应该有百分之五即四百五十万人当民兵，即是说，比现有民兵数目扩大一倍。……自卫军与民兵，均必须不违农时，减少误工，不妨碍生产。在这里，变工的方法是必要的，战斗的民兵组织与生产的变工组织，往往可以互相结合。自卫军与民兵的领导机关，必须是民主选举的。只有这样，自卫军与民兵才能扩大，也才能提高战斗力。民兵的重要战斗方法是地雷爆炸，地雷运动应使之普及于一切乡村中。

专制主义者利于人民愚昧，我们则利于人民聪明，我们要使一切人民都能逐渐地离开愚昧状态与不卫生的状态。

³⁵⁶² 这是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的演说。

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³⁵⁶³

(1945年3月31日)

中间派是动摇的，中国的政治力量是两头硬中间软。假如中国有农民党，我们也要与它区别。这是要我们共产党员弄清楚的，惟有区别才能领导。

关于党名，党外许多人主张我们改，但改了一定不好，把自己的形象搞坏了，所以报告中索性强调一下共产主义的无限美妙。

农民是喜欢共产的，共产就是民主。报告中对共产主义提过一下以后，仍着重说明民主革命，指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这就将我们同民粹主义区别开来，民粹主义在中国与我们党内的影响是很广大的。

这个报告与《新民主主义论》不同的，是确定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又以反专制主义为第一。……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是无害有益的，而且报告里也说明了有三种经济成分。

³⁵⁶³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

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

3564

(1945年4月20日)

正确和错误的标准自然是马克思主义，但人民利益同样是标准。人民对于各党派的情形并不很了解，但懂得根据他们的政策来作判断。

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总的来说是功大过小，犹如玉皇大帝经常下雨，偶尔不下雨还是功大过小。没有共产国际的成立和帮助，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是不能有今天的。

孔夫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即使到七十岁相信一定也还是会逾矩的。

两万五千共产党员发展到几十万，绝大多数是农民与小资产阶级，如果不整风党就变了性质，无产阶级其名，小资产阶级其实，……只有经过整风才把无产阶级的领导挽救了。

这些都是学习来的，草鞋没样，边打边像，这是有些道理的。我们就是这样慢慢学习着前进，现在也并不是什么都学会了，只是错误犯得少一些。

³⁵⁶⁴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

原《学习和时局》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 的决议³⁵⁶⁵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

(一)

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我们党一成立，就展开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在为实现新民主主义而进行的二十四年（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四五年）的奋斗中，在第一次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的三个历史时期中，我们党始终一贯地领导了广大的中国人民，向中国人民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和丰富的经验。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将人类最高智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创造地应用于中国这样的以农民为主要群众、以反帝反封建为直接任务而又地广人众、情况极复杂、斗争极困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光辉地发展了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

³⁵⁶⁵ 此文不是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是原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中文第一版《学习和时局》的附录。后由于刘少奇背叛革命，此文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中文第一版中被删去。

半殖民地问题的学说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学说。由于坚持了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并向一切与之相反的错误思想作了胜利的斗争，党才在三个时期中取得了伟大的成绩，达到了今天这样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空前的巩固和统一，发展为今天这样强大的革命力量，有了一百二十余万党员，领导了拥有近一万万人民、近一百万军队的中国解放区，形成为全国人民抗日战争和解放事业的伟大的重心。

(二)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个时期中，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特别是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曾经在共产国际的正确指导之下，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的影响、推动和组织之下，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伟大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的全体同志，在这次大革命中，进行了轰轰烈烈的革命工作，发展了全国的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和农民运动，推进并帮助了国民党的改组和国民革命军的建立，形成了东征和北伐的政治上的骨干，领导了全国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极光荣的一章。但是，由于当时的同盟者国民党内的反动集团在一九二七年叛变了这个革命，由于当时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集团的联合力量过于强大，特别是由于在这次革命的最后一个时期内（约有半年时间），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投降主义路线，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拒绝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的许多英明指示，拒绝接受毛泽东同志和其他同志的正确意见，以至于当国民党叛变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党和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这次革命终于失败了。

从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至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的十年间，中国共产党，并且只有中国共产党，在反革命的极端恐怖的统治下，全党团结一致地继续高举着反帝反封建的大旗，领导广大的工人、农民、士兵、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群众，作了政治上、军事上和思想上的伟大战斗。在这个战斗中，中国共产党创造了红军，建立了工农兵代表会议的政府，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分配了土地给贫苦的农民，抗击了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进攻和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来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人民的新民主主义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事业，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全党对于企图分裂党和实行叛党的托洛茨基、陈独秀派³⁵⁶⁶和罗章龙³⁵⁶⁷、张国焘³⁵⁶⁸等的反革命行为，也同样团结一致地进行了斗争，使党保证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总原则下的统一。在这十年内，党的这个总方针和为实行这个总方针的英勇奋斗，完全是正确的和必要的。无数党员、无数人民和很多党外革命家，当时在各个战线上轰轰烈烈地进行革命斗争，他们的奋斗牺牲、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的精神和功绩，在民族的历史上永垂不朽。假如没有这一切，则抗日战争即不能实现；即使实现，亦将因为没有一个是积累了人民战争丰富经验的中国共产党作为骨干，而不能坚持和取得胜利。这是毫无疑问的。

³⁵⁶⁶ 参看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 159。

³⁵⁶⁷ 罗章龙，中国共产党初期的党员，后来成为中国革命的叛徒。在一九三一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前后，罗章龙对中国革命前途表示悲观失望，公开拥护托洛茨基、陈独秀派的反革命主张，反对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咒骂红军和红色根据地，并以散发传单的方式，将党的干部的名单向蒋介石匪帮告密。罗章龙为了破坏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成立了所谓“中央非常委员会”、“第二省委”、“第二区委”、“第二工会党团”等组织，进行分裂党的活动。罗章龙于一九三一年一月被开除出党。

³⁵⁶⁸ 参看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 139 和注 140。

尤其值得我们庆幸的是，我们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创造性地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革命学说应用于中国条件的工作，在这十年内有了很大的发展。我党终于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时期，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

但是我们必须指出，在这十年内，我党不仅有了伟大的成就，而且在某些时期中也犯过一些错误。其中以从党的一九三一年一月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六届四中全会）到一九三五年一月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遵义会议）这个时期内所犯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上的“左”倾错误，最为严重。这个错误，曾经给了我党和中国革命以严重的损失。

为了学习中国革命的历史教训，以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使“前车之覆”成为“后车之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认为：对于这十年内若干党内历史问题，尤其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作出正式的结论，是有益的和必要的。

（三）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在党内曾经发生了“左”右倾的偏向。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小部分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投降主义者，这时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逐渐变成了取消主义者。他们采取

了反动的托洛茨基主义立场，认为一九二七年革命后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它对于人民的统治已趋稳定，中国社会已经是所谓资本主义占优势并将得到和平发展的社会；因此他们武断地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就只能进行所谓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而取消革命运动；因此他们反对党所进行的各种革命斗争，并污蔑当时的红军运动为所谓“流寇运动”。他们不但不肯接受党的意见，放弃这种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反党观点，而且还同反动的托洛茨基分子相结合，成立了反党的小组织，因而不得不被驱逐出党，接着并堕落为反革命。

另一方面，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愤怒而加强起来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急性病，也反映到党内，使党内的“左”倾情绪也很快地发展起来了。这种“左”倾情绪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党中央的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上已经开端。“八七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有功绩的。它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地纠正了和结束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号召党和人民群众继续革命的战斗，这些都是正确的，是它的主要方面。但是“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它在政治上不认识当时应当根据各地不同情况，组织正确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借以有计划地保存革命阵地和收集革命力量，反而容许了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特别是强迫工人罢工）的倾向。它在组织上开始了宗派主义的过火的党内斗争，过分地或不适当地强调了领导干部的单纯的工人成份的意义，并造成了党内相当严重的极端民主化状态。这种“左”倾

情绪在“八七会议”后继续生长，到了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党中央的扩大会议，就形成为“左”倾的盲动主义（即冒险主义）路线，并使“左”倾路线第一次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内取得了统治地位。这时的盲动主义者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不断革命”（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国革命的形势是所谓“不断高涨”（否认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败），因而它仍然不但不去组织有秩序的退却，反而不顾敌人的强大和革命失败后的群众情况，命令少数党员和少数群众在全国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地方起义。和这种政治上的冒险主义同时，组织上的宗派主义的打击政策也发展了起来。但是由于这个错误路线一开始就引起了毛泽东同志和在白色区域工作的许多同志的正确的批评和非难，并在实际工作中招致了许多损失，到了一九二八年初，这个“左”倾路线的执行在许多地方已经停止，而到同年四月（距“左”倾路线的开始不到半年时间），就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上结束了。

一九二八年七月间召开的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它正确地肯定了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指出了引起现代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因此确定了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发布了民主革命的十大纲领。它正确地指出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指出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指出了党在当时的总任务不是进攻，不是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它进行了两条战线的斗争，批判了右的陈独秀主义和“左”的盲动主义，特别指出了党内最主要的危险倾向是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这些都是完全必要的。另一方面，第六次大会也有其缺点和错误。它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对于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需要的策略上的

有秩序的退却，对于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也缺乏必要的认识。这些缺点和错误，虽然使得“八七会议”以来的“左”倾思想未能根本肃清，并被后来的“左”倾思想所片面发展和极端扩大，但仍然不足以掩盖第六次大会的主要方面的正确性。党在这次大会以后一个时期内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毛泽东同志在这个时期内，不但在实践上发展了第六次大会路线的正确方面，并正确地解决了许多为这次大会所不曾解决或不曾正确地解决的问题，而且在理论上更具体地和更完满地给了中国革命的方向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根据。在他的指导和影响之下，红军运动已经逐渐发展成为国内政治的重要因素。党在白色区域的组织和工作，也有了相当的恢复。

但是，在一九二九年下半年至一九三〇年上半年间，还在党内存在着的若干“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又有了某些发展。在这个基础上，遇着时局的对革命有利的变动，便发展成为第二次的“左”倾路线。在一九三〇年五月蒋冯阎战争爆发后的国内形势的刺激下，中央政治局由李立三同志领导，在六月十一日通过了“左”倾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使“左”倾路线第二次统治了中央的领导机关。产生这次错误路线（李立三路线）的原因，是由于李立三同志等不承认革命需要主观组织力量的充分准备，认为“群众只要大干，不要小干”，因而认为当时不断的军阀战争，加上红军运动的初步发展和白区工作的初步恢复，就已经是具备了可以在全国“大干”（武装起义）的条件；由于他们不承认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认为革命危机在全国各地都有同样的生长，全国各地都要准备马上起义，中心城市尤其要首先发动以形成全国革命高潮的中心，并污蔑毛泽东同志在长期中用主要力量去创造农村根据地，以农村

来包围城市，以根据地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是所谓“极端错误的”“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由于他们不承认世界革命的不平衡性，认为中国革命的总爆发必将引起世界革命的总爆发，而中国革命又必须在世界革命的总爆发中才能成功；由于他们不承认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长期性，认为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开始即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开始，并因此规定了若干不适时宜的“左”倾政策。在这些错误认识下，立三路线的领导者定出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随后又将党、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使一切经常工作陷于停顿。在这些错误决定的形成和执行过程中，立三同志拒绝了许多同志的正确的批评和建议，并在党内强调地反对所谓“右倾”，在反“右倾”的口号下错误地打击了党内不同意他的主张的干部，因而又发展了党内的宗派主义。这样，立三路线的形态，就比第一次“左”倾路线更为完备。

但是立三路线在党内的统治时间也很短（不到四个月时间）。因为凡实行立三路线的地方都使党和革命力量受到了损失，广大的干部和党员都要求纠正这一路线。特别是毛泽东同志，他不但始终没有赞成立三路线，而且以极大的忍耐心纠正了红一方面军中的“左”倾错误³⁵⁶⁹，因而使江西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在这个时期内不但没有受到损失，反而利用了当时蒋冯阎战争的有利形势

³⁵⁶⁹ 一九三〇年九月，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二次进攻长沙。当时因敌军筑垒死守，又有飞机和军舰的援助，红军久攻不克，而敌人的援军已日渐集中，形成不利形势。毛泽东同志说服了红一方面军中的干部，撤退围攻长沙的部队，接着又说服了干部放弃夺取中心城市九江和打其他大城市的意见，改变方针，分兵攻取茶陵、攸县、醴陵、萍乡、吉安等地，使红一方面军获得很大的发展。

而得到了发展，并在一九三〇年底至一九三一年初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其他革命根据地的红军，除个别地区外，也得到了大体相同的结果。在白区，也有许多做实际工作的同志，经过党的组织起来反对立三路线。

一九三〇年九月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六届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对于立三路线的停止执行是起了积极作用的。虽然六届三中全会的文件还表现了对立三路线调和妥协的精神（如否认它是路线错误，说它只是“策略上的错误”等），虽然六届三中全会在组织上还继续着宗派主义的错误，但是六届三中全会既然纠正了立三路线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工作，因而它就结束了作为立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那些错误。立三同志本人，在六届三中全会上也承认了被指出的错误，接着就离开了中央的领导地位。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又在同年十一月的补充决议和十二月的第九十六号通告中，进一步地指出了立三同志等的路线错误和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错误。当然，无论六届三中全会或其后的中央，对于立三路线的思想实质，都没有加以清算和纠正，因此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以来特别是一九二九年以来一直存在于党内的若干“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在六届三中全会上和六届三中全会后还是浓厚地存在着。但是六届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既然对于停止立三路线作了上述有积极作用的措施，当时全党同志就应该在这些措施的基础上继续努力，以求反“左”倾错误的贯彻。

但在这时，党内一部分没有实际革命斗争经验的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在陈绍禹（王明）同志的领导之下，却又

在“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路线”的旗帜之下，以一种比立三路线更强烈的宗派主义的立场，起来反抗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了。他们的斗争，并不是在帮助当时的中央彻底清算立三路线的思想实质，以及党内从“八七会议”以来特别是一九二九年以来就存在着而没有受到清算的若干“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在当时发表的陈绍禹同志的《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中，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在新的形态下，继续、恢复或发展立三路线和其他“左”倾思想“左”倾政策的新的政治纲领。这样，“左”倾思想在党内就获得了新的滋长，而形成新的“左”倾路线。

陈绍禹同志领导的新的“左”倾路线虽然也批评了立三路线的“左”倾错误和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错误，但是它的特点，是它主要地反而批评了立三路线的“右”，是它指责六届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未加以丝毫揭破和打击”，指责第九十六号通告没有看出“右倾依然是目前党内主要危险”。新的“左”倾路线在中国社会性质、阶级关系的问题上，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夸大中国现阶段革命中反资产阶级斗争、反富农斗争和所谓“社会主义革命成份”的意义，否认中间营垒和第三派的存在。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它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和党在全国范围的“进攻路线”，认为所谓“直接革命形势”很快地即将包括一个或几个有中心城市在内的主要省份。它并从“左”的观点污蔑中国当时还没有“真正的”红军和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特别强调地宣称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是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在组织上，这条新的“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们违反组织纪律，拒绝党所分配的工作，错误地结

合一部分同志进行反中央的宗派活动，错误地在党员中号召成立临时的中央领导机关，要求以“积极拥护和执行”这一路线的“斗争干部”“来改造和充实各级的领导机关”等，因而造成了当时党内的严重危机。这样，虽然新的“左”倾路线并没有主张在中心城市组织起义，在一个时期内也没有主张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但是整个地说来，它却比立三路线的“左”倾更坚决，更“有理论”，气焰更盛，形态也更完备了。

一九三一年一月，党在这些以陈绍禹同志为首的“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从各方面进行压迫的情势之下，也在当时中央一部分犯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对于他们实行妥协和支持的情势之下，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这次会议的召开没有任何积极的建设的作用，其结果就是接受了新的“左”倾路线，使它在中央领导机关内取得胜利，而开始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路线对党的第三次统治。六届四中全会直接实现了新的“左”倾路线的两项互相联系的错误纲领：反对所谓“目前党内主要危险”的“右倾”，和“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尽管六届四中全会在形式上还是打着反立三路线、反“调和路线”的旗帜，它的主要政治纲领实质上却是“反右倾”。六届四中全会虽然在它自己的决议上没有作出关于当时政治形势的分析和党的具体政治任务的规定，而只是笼统地反对所谓“右倾”和所谓“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但是在实际上，它是批准了那个代表着当时党内“左”倾思想，即在当时及其以后十多年内还继续被人们认为起过“正确的”“纲领作用”的陈绍禹同志的小册子——《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而这个册子，如前面所分析的，基本上乃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反右倾”的“左”倾机会主义的总纲领。在这个纲领下面，六届四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

一方面提拔了那些“左”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同志到中央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过分地打击了犯立三路线错误的同志，错误地打击了以瞿秋白同志³⁵⁷⁰为首的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并在六届四中全会后接着就错误地打击了当时所谓“右派”中的绝大多数同志。其实，当时的所谓“右派”，主要地是六届四中全会宗派主义的“反右倾”斗争的产物。这些人中间也有后来成为真正右派并堕落为反革命而被永远驱逐出党的以罗章龙为首的极少数的分裂主义者，对于他们，无疑地是应该坚决反对的；他们之成立并坚持第二党的组织，是党的纪律所绝不容许的。至于林育南³⁵⁷¹、李求实³⁵⁷²、何孟雄³⁵⁷³等二十几个党的重要干部，他们为党和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众有很好的联系，并

³⁵⁷⁰ 瞿秋白同志，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和领导人之一。在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八年中国共产党的第三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都被选为中央委员。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秋白同志曾积极反对国民党右派反共反人民的“戴季陶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叛变革命后，曾主持召集八月七日的党中央紧急会议，结束了陈独秀主义在党内的统治。但在一九二七年冬至一九二八年春，他在担任中央领导工作时曾犯过“左”的盲动主义的错误。在一九三〇年九月，秋白同志主持召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停止了危害党的立三路线的执行。但在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六届四中全会上，他却受到了“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的打击，被排斥于中央领导机关之外。从这时到一九三三年的一个时期，他在上海同鲁迅合作从事革命文化运动。一九三三年到江西红色根据地，担任工农民主中央政府人民教育委员。红军主力长征时，他被留在江西根据地。一九三五年三月，秋白同志在福建游击区被蒋匪逮捕，六月十八日就义于福建长汀。

³⁵⁷¹ 林育南同志，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早期职工运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曾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主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兼秘书长。一九三一年在上海被蒋匪逮捕，牺牲于龙华。

³⁵⁷² 李求实同志，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二八年时曾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兼团中央宣传部长，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的主编。一九三一年在党中央宣传部工作时，在上海被蒋匪逮捕，牺牲于龙华。

³⁵⁷³ 何孟雄同志，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早期北方职工运动的组织者之一，曾创建京绥铁路工会。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叛变革命以后，曾在上海担任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员会委员、省委农民部秘书等工作。一九三一年被蒋匪逮捕，牺牲于龙华。

且接着不久就被敌人逮捕，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慷慨就义。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瞿秋白同志，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之一，他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面），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也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所有这些同志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六届四中全会这种对于中央机关的“改造”，同样被推广于各个革命根据地和白区地方组织。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央，比六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更着重地更有系统地向全国各地派遣中央代表、中央代表机关或新的领导干部，以此来贯彻其“反右倾”的斗争。

在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不久，一九三一年五月九日中央所发表的决议，表示新的“左”倾路线已经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了具体的运用和发展。接着，中国连续发生了许多重大事变。江西中央区红军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和全体同志的积极努力之下，在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还没有来得及贯彻其错误路线的情况之下，取得了粉碎敌人第二次和第三次“围剿”的巨大胜利；其他多数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在同一时期和同一情况下，也得到了很多的胜利和发展。另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开始的进攻，又激起了全国民族民主运动的新的高涨。新的中央对于这些事变所造成的新形势，一开始就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它过分地夸大了当时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忽视了“九一八”以后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和中间阶级的抗日民主要求，强调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是要一致地进攻苏联的，各帝国主义和中国各反革命派别甚至中间派别是要一致地进攻中国革命的，并断定中间派别是所谓中国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因此它继续主张打倒一切，认为当时“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

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因此它又提出了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和在白区普遍地实行武装工农、各企业总罢工等许多冒险的主张。这些错误，最先表现于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中央的《由于工农红军冲破敌人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紧急任务决议》，并在后来临时中央的或在临时中央领导下作出的《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一月九日）、《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一九三二年四月四日）、《中央区中央局关于领导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周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一日）、《革命危机的增长与北方党的任务》（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四日）等文件中得到了继续和发挥。

自一九三一年九月间以秦邦宪（博古）同志³⁵⁷⁴为首的临时中央成立起，到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止，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继续发展的时期。其间，临时中央因为白区工作在错误路线的领导下遭受严重损失，在一九三三年初迁入江西南部根据地，更使他们的错误路线得以在中央所在的根据地和邻近各根据地进一步地贯彻执行。在这以前，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江西南部根据地党代表大会和一九三二年八月党中央的宁都会议，虽然已经根

³⁵⁷⁴ 秦邦宪同志，别名博古。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曾先后担任党的上海临时中央局和红色区域中央局的领导者，在此期间，犯过严重的“左”倾路线的错误。抗日战争初期，在党中央的南方局工作。一九四一年以后，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在延安创办和主持《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在一九四五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九四六年二月到重庆参加同国民党的谈判。四月，在返回延安的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

据六届四中全会的“反右倾”和“改造各级领导机关”的错误纲领，污蔑过去江西南部 and 福建西部根据地的正确路线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改变了正确的党的领导和军事领导；但是因为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战略方针在红军中有深刻影响，在临时中央的错误路线尚未完全贯彻到红军中去以前，一九三三年春的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仍然得到了胜利。而在一九三三年底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极端错误的战略就取得了完全的统治。在其他许多政策上，特别是对于福建事变的政策上，“左”倾路线的错误也得到了完全的贯彻。

一九三四年一月，由临时中央召集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六届五中全会），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发展的顶点。六届五中全会不顾“左”倾路线所造成的中国革命运动的挫折和“九一八”“一二八”以来国民党统治区人民抗日民主运动的挫折，盲目地判断“中国的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判断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说这一斗争将决定中国的“革命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它又重夏立三路线的观点，宣称“在我们已将工农民主革命推广到中国重要部分的时候，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将成为共产党的基本任务，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中国才会统一，中国民众才会完成民族的解放”等等。在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和反对“用两面派的态度在实际工作中对党的路线怠工”等口号之下，它继续发展了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和打击政策。

第三次“左”倾路线在革命根据地的最大恶果，就是中央所在地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和红军主力的退出中央所在

地区。“左”倾路线在退出江西和长征的军事行动中又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使红军继续受到损失。党在其他绝大多数革命根据地（闽浙赣区、鄂豫皖区、湘鄂赣区、湘赣区、湘鄂西区、川陕区）和广大白区的工作，也同样由于“左”倾路线的统治而陷于失败。统治过鄂豫皖区和川陕区的张国焘路线，则除了一般的“左”倾路线之外，还表现为特别严重的军阀主义和在敌人进攻面前的逃跑主义。

以上这些，就是第三次统治全党的、以教条主义分子陈绍禹秦邦宪二同志为首的、错误的“左”倾路线的主要内容。

犯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们披着“马列主义理论”的外衣，仗着六届四中全会所造成的政治声势和组织声势，使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内统治四年之久，使它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完整，在全党影响最深，因而其危害也最大。但是犯这个路线错误的同志，在很长时期内，却在所谓“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百分之百的布尔塞维克”等武断词句下，竭力吹嘘同事实相反的六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之“正确性”及其所谓“不朽的成绩”，完全歪曲了党的历史。

在第三次“左”倾路线时期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主张正确路线的同志们，是同这条“左”倾路线完全对立的。他们不赞成并要求纠正这条“左”倾路线，因而他们在各地的正确领导，也就被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中央及其所派去的组织或人员所推翻了。但是“左”倾路线在实际工作中的不断碰壁，尤其是中央所在地区第五次反“围剿”中的不断失败，开始在更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群众面前暴露了这一路线的错误，引起了他们的怀疑和不满。在中央所在地区红军长征开始后，这种怀疑和不满更加增长，以至有些曾经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这时也开始觉悟，站在

反对“左”倾错误的立场上来了。于是广大的反对“左”倾路线的干部和党员，都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因而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在贵州省遵义城召开的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得以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也正是由于这一转变，我们党才能够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在长征的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保存了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干，胜利地克服了坚持退却逃跑并实行成立第二党的张国焘路线，挽救了“左”倾路线所造成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机³⁵⁷⁵，正确地领导了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救亡运动，正确地解决了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组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神圣的抗日战争的爆发。

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政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左”倾路线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被逐渐地克服了。一九四二年以来，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全党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和党史学习，更从思想根源上纠正了党的历史上历次“左”倾以及右倾的错误。过去犯过“左”右倾错误的同志，在长期体验中，绝大多数都有了很大的进步，

³⁵⁷⁵ 一九三五年秋，犯“左”倾错误的朱理治同志以中央代表名义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包括陕甘边和陕北），同原在那里的犯“左”倾错误的郭洪涛同志结合，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贯彻到政治、军事、组织各方面工作中去，并排斥执行正确路线的、创造了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刘志丹等同志。接着又在肃清反革命的工作中，极端错误地逮捕了一大批执行正确路线的干部，造成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危机。十一月，党中央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纠正了这个“左”倾错误，将刘志丹等同志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因而挽救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险局面。

做过了许多有益于党和人民的工作。这些同志，和其他广大同志在一起，在共同的政治认识上互相团结起来了。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欣喜地指出：我党经过了各种成功和挫折，终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第一次达到了现在这样高度的巩固和统一。这是快要胜利了的党，这是任何力量也不能战胜了的党。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认为：关于抗日时期党内的若干历史问题，因为抗日阶段尚未结束，留待将来做结论是适当的。

(四)

为了使同志们进一步了解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以利于“惩前毖后”，不在今后工作上重犯这类错误起见，特分别指出它们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思想上同正确路线相违抗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 在政治上：

如同斯大林同志所指出³⁵⁷⁶和毛泽东同志所详细分析过的，现阶段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九一八”以后部分地变为殖民地）；这个国家的革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是国际无产阶级已在苏联胜利，中国无产阶级已有政治觉悟时代的民族民主革命。这就规定了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人农民为主体而有其他广大社会阶层参加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即是既区别于旧民主主义又区别于社会主义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由于现阶段的中国是在强大而又内部互相矛

³⁵⁷⁶ 见斯大林《中国革命问题》、《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的任务》第二部分和《论中国革命的前途》。

盾的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和中国封建势力统治之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其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具有极大的不平衡性和不统一性，这就规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之极大的不平衡性，使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不能不经历长期的曲折的斗争；同时又使这一斗争能广泛地利用敌人的矛盾，在敌人的统治比较薄弱的广大地区首先建立和保持武装的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实践所证明的中国革命的上述基本特点和基本规律，既为一切右倾路线所不了解和违抗，也为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所不了解和违抗。

“左”倾路线因此在政治上犯了三个主要方面的错误：

第一，各次“左”倾路线首先在革命任务和阶级关系的问题上犯了错误。和斯大林同志一样，毛泽东同志还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就不但指出中国现阶段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而且特别指出农民的土地斗争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基本内容，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因此对于农民斗争的领导是中国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基本任务³⁵⁷⁷。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他又指出中国所需要的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定要经过这样的民权主义革命”，才谈得上社会主义的前途³⁵⁷⁸；指出土地革命因为革命在城市的失败有了更大的意义，“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³⁵⁷⁹；指出大资产阶级叛变革命之后，自由资产阶级仍然和买办资产阶级有区别，要求民主尤其是要求反帝国主义的阶层还是很广泛的，

³⁵⁷⁷ 见本书第一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本合集第11页。

³⁵⁷⁸ 见本书第一卷《井冈山的斗争》中《革命性质问题》一段，本合集第71页。

³⁵⁷⁹ 引自一九二九年四月《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信》。见本书第一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所引，本合集第91页。

因此必须正确地对待和尽可能地联合或中立各种不同的中间阶级，而在乡村中则必须正确地对待中农和富农（“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同时坚决地团结中农，保护富裕中农，给富农以经济的出路，也给一般地主以生活的出路）³⁵⁸⁰。凡此都是新民主主义的基本思想，而“左”倾路线是不了解和反对这些思想的。虽然各次“左”倾路线所规定的革命任务，许多也还是民主主义的，但是它们都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定界限，并主观地急于要超过民主革命；都低估农民反封建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决定作用；都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以至上层小资产阶级。第三次“左”倾路线更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否认中间营垒和第三派的存在，尤其强调反对富农。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中国阶级关系有了一个明显的巨大的变化，但是当时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则不但不认识这个变化，反而把同国民党反动统治有矛盾而在当时积极活动起来的中间派别断定为所谓“最危险的敌人”。应当指出，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也领导了农民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反抗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进攻，这些任务都是正确的；但是由于上述的“左”倾认识，他们就错误地害怕承认当时的红军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运动，错误地反对所谓“农民特殊革命性”、“农民的资本主义”和所谓“富农路线”，而实行了许多超民主主义的所谓“阶级路线”的政策，例如消灭富农经济及其他过左的经济政策、劳动政策，一切剥削者均无参政权的政权政策，强调以共产主义为内容的国民教育政策，对知识分子的过左政策，要兵不要官的兵运工作和过左的肃

³⁵⁸⁰ 见本书第一卷《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本合集第42页）、《井冈山的斗争》（本合集第50页）等文。

反政策等，而使当前的革命任务被歪曲，使革命势力被孤立，使红军运动受挫折。同样，应当指出，我党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的国民党统治区中，一贯坚持地领导了人民的民族民主运动，领导了工人及其他群众的经济斗争和革命的文化运动，反对了当时国民党政府出卖民族利益和压迫人民的政策；特别是“九一八”以后，我党领导了东北抗日联军，援助了“一二八”战争和察北抗日同盟军，和福建人民政府成立了抗日民主的同盟，提出了在三个条件下红军愿同国民党军队联合抗日³⁵⁸¹，在六个条件下愿同各界人民建立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³⁵⁸²，在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成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这些也都是正确的。但是在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由于指导政策的错误，不能在实际上正确地解决问题，以致当时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也都没有得到应有的结果，或归于失败。当然，在抗日问题上，在当时还不能预料到代表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主要部分的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在一九三五年的华北事变尤其是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以后所起的变化，但是中间阶层和一部分大地主资产阶级的地方集团已经发生了成为抗日同盟者的变化，这个变化是广大党员和人民都已经认识了，却被第三次“左”倾路线所忽视或否认，形成了自己的严重的关门主义，使自己远落于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之后。这个关门主义错误所造成的孤立和落后的状况，在遵义会议以前，基本上是没有改变的。

³⁵⁸¹ 一九三三年一月，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向一切进攻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国民党军队提议，在三个条件下订立停战协定，联合抗日。三个条件是：（一）停止进攻革命根据地和红军，（二）给予人民以自由权利，（三）武装人民。

³⁵⁸² 参看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 133。

第二，各次“左”倾路线在革命战争和革命根据地的问题上，也犯了错误。斯大林同志说：“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³⁵⁸³和斯大林同志一样，毛泽东同志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即已正确指出，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缺乏民主和工业的不统一的大国，武装斗争和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毛泽东同志又指出：广大农民所在的广大乡村，是中国革命必不可少的重要阵地（革命的乡村可以包围城市，而革命的城市不能脱离乡村）；中国可以而且必须建立武装的革命根据地，以为全国胜利（全国的民主统一）的出发点³⁵⁸⁴。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时期，由于国共合作建立了联合政府，当时的根据地是以某些大城市为中心的，但是即在那个时期，也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建立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军队，并解决乡村土地问题，以巩固根据地的基础。而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强大的反革命势力占据了全国的城市，这时的根据地就只能主要地依靠农民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在反革命统治薄弱的乡村（而不是中心城市）首先建立、发展和巩固起来。毛泽东同志指出这种武装的乡村革命根据地在中国存在的历史条件，是中国的“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是由此而来的“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³⁵⁸⁵。他又指出这种根据地对于中国革命的历史意义，是“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

³⁵⁸³ 引自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

³⁵⁸⁴ 见本书第一卷《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本合集第42页）、《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本合集第86页）二文。

³⁵⁸⁵ 引自本书第一卷所载《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本合集第42页）。

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³⁵⁸⁶。至于这个时期的城市群众工作，则应如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刘少奇同志所主张的，采取以防御为主（不是以进攻为主），尽量利用合法的机会去工作（而不是拒绝利用合法），以便使党的组织深入群众，长期荫蔽，积蓄力量，并随时输送自己的力量到乡村去发展乡村武装斗争力量，借此以配合乡村斗争，推进革命形势，为其主要方针。因此，直至整个形势重新具有在城市中建立民主政府的条件时为止，中国革命运动应该以乡村工作为主，城市工作为辅；革命在乡村的胜利和在城市的暂时不能胜利，在乡村的进攻和在城市的一般处于防御，以至在这一乡村的胜利及进攻和在另一乡村的失败、退却和防御，就织成了在这一时期中全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相交错的图画，也就铺成了在这一形势下革命由失败到胜利的必经道路。但是各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因为不了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特点，不了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不了解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曲折性和长期性，就从而低估了军事斗争特别是农民游击战争和乡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就从而反对所谓“枪杆子主义”和所谓“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而总是梦想这时城市的工人斗争和其他群众斗争能突然冲破敌人的高压而勃兴，而发动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而达到所谓“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而形成所谓全国革命高潮和全国胜利，并以这种梦想作为一切工作布置的中心。但是实际上，

³⁵⁸⁶ 引自本书第一卷所载《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本合集第86页）。

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阶级力量对比的整个形势下，这种梦想的结果不是别的，首先就是造成了城市工作本身的失败。第一次“左”倾路线这样失败了，第二次“左”倾路线仍然继续同样的错误；所不同的，是要求红军的配合，因为这时红军已经逐渐长大了。第二次失败了，第三次“左”倾路线仍然要求在大城市“真正”准备武装起义；所不同的，是主要要求红军的占领，因为这时红军更大，城市工作更小了。这样不以当时的城市工作服从乡村工作，而以当时的乡村工作服从城市工作的结果，就是使城市工作失败以后，乡村工作的绝大部分也遭到失败。应当指出，在一九三二年以后，由于红军对中心城市的不能攻克或不能固守，特别是由于国民党的大举进攻，实际上已经停止了夺取中心城市的行动；而在一九三三年以后，又由于城市工作的更大破坏，临时中央也离开了城市而迁入了乡村根据地，实行了一个转变。但是这种转变，对于当时的“左”倾路线的同志们说来，不是自觉的，不是从研究中国革命特点得出正确结论的结果，因此，他们依然是以他们错误的城市观点，来指导红军和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并使这些工作受到破坏。例如，他们主张阵地战，而反对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他们错误地强调所谓“正规化”，而反对红军的所谓“游击主义”；他们不知道适应分散的乡村和长期的被敌人分割的游击战争，以节省使用根据地的人力物力，和采取其他必要的对策；他们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提出所谓“中国两条道路的决战”和所谓“不放弃根据地一寸土地”的错误口号等等，就是明证。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着重指出：我们上面所说的这一时期内乡村工作所应推进、城市工作所应等待的形势变化，现时已经迫近了。只有在现时，在抗日战争的最后阶段，在我党领导的军队

已经壮大，并还将更加壮大的时候，将敌占区的城市工作提到和解放区工作并重的地位，积极地准备一切条件，以便里应外合地从中心城市消灭日本侵略者，然后把工作重心转到这些城市去，才是正确的。这一点，对于从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来艰难地将工作重心转入乡村的我党，将是一个新的有历史意义的转变；全党同志都应充分自觉地准备这一转变，而不再重复“左”倾路线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城市转入乡村问题上所表现的初则反对、违抗，继则勉强、被迫和不自觉的那种错误。至于国民党统治区域，则是另外一种情形；在那里，我们现时的任务是无论在乡村或城市，都应放手动员群众，坚决反对内战分裂，力争和平团结，要求加强对日作战，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全国统一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当敌占城市在人民手中得到了解放，全国统一的民主的联合政府真正地实现了和巩固了的时候，就将是乡村根据地的历史任务完成的时候。

第三，各次“左”倾路线在进攻和防御的策略指导上，也犯了错误。正确的策略指导，必须如斯大林同志所指出的，需要正确的形势分析（正确地估计阶级力量的对比，判断运动的来潮和退潮），需要由此而来的正确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需要正确的“利用敌人阵营里的每一缝隙，善于给自己找寻同盟者”³⁵⁸⁷；而毛泽东同志对于中国革命运动的指导，正是一个最好的模范。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正确地指出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在全国范围内敌强于我，冒险的进攻必然要招致失败；但在反动政权内部不断分裂和战争，人民革命要求逐渐恢复和上

³⁵⁸⁷ 见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第七部分《战略与策略》和《时局问题简评》第二部分《关于中国》。这里的引语引自《时局问题简评》。

升的一般条件下，和在群众经过第一次大革命斗争，并有相当力量的红军和有正确政策的共产党的特殊条件下，就可以“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间，产生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红色政权区域”³⁵⁸⁸。他又指出：在统治阶级破裂时期，红色政权的发展“可以比较地冒进，用军事发展割据的地方可以比较地广大”；若在统治阶级比较稳定时期，则这种发展“必须是逐渐地推进的。这时在军事上最忌分兵冒进，在地方工作方面（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发展党，组织地方武装）最忌把人力分得四散，而不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³⁵⁸⁹。即在同一时期，由于敌人的强弱不同，我们的策略也应当不同，所以湘赣边的割据地区就“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³⁵⁹⁰。湘赣边红军以后进入闽赣边，又提出“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³⁵⁹¹的计划。不同的敌人对革命的不同利害关系，是决定不同策略的重要根据。所以毛泽东同志始终主张“利用反革命内部的每一冲突，从积极方面扩大他们内部的裂痕”³⁵⁹²，“反对孤立政策，承认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³⁵⁹³。这些“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³⁵⁹⁴的策略原则的运用，在他所领导的历次反“围剿”战争中，尤其在遵义会议后的长征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得到了光辉的发展。刘少奇同志在白区工作中的策略思想，同样是一个模范。刘少奇同志正确

³⁵⁸⁸ 引自本书第一卷所载《井冈山的斗争》（本合集第50页）。

³⁵⁸⁹ 引自本书第一卷所载《井冈山的斗争》（本合集第50页）。

³⁵⁹⁰ 引自本书第一卷所载《井冈山的斗争》（本合集第50页）。

³⁵⁹¹ 引自一九二九年四月《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信》。见本书第一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所引，本合集第91页。

³⁵⁹² 引自《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决议》（遵义会议决议）。

³⁵⁹³ 引自本书第一卷所载《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第三章，本合集第158页。

³⁵⁹⁴ 见本书第二卷《论政策》一文（本合集第675页）。

地估计到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白区特别是城市敌我力量的悬殊，所以主张有系统地组织退却和防御，“在形势与条件不利于我们的时候，暂时避免和敌人决斗”，以“准备将来革命的进攻和决斗”³⁵⁹⁵；主张有计划地把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时期的党的公开组织严格地转变为秘密组织，而在群众工作中则“尽可能利用公开合法手段”，以便党的秘密组织能够在这种群众工作中长期地荫蔽力量，深入群众，“聚积与加强群众的力量，提高群众的觉悟”³⁵⁹⁶。对于群众斗争的领导，刘少奇同志认为应当“根据当时当地的环境和条件，根据群众觉悟的程度，提出群众可能接受的部分的口号、要求和斗争的方式，去发动群众的斗争，并根据斗争过程中各种条件的变化，把群众的斗争逐渐提高到更高的阶段，或者‘适可而止’地暂时结束战斗，以准备下一次更高阶段和更大范围的战斗”。在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和争取暂时的同盟者的问题上，他认为应该“推动这些矛盾的爆发，与敌人营垒中可能和我们合作的成份，或者与今天还不是我们主要的敌人，建立暂时的联盟，去反对主要的敌人”；应该“向那些愿意同我们合作的同盟者作必要的让步，吸引他们同我们联合，参加共同的行动，再去影响他们，争取他们下层的群众”³⁵⁹⁷。一二九运动的成功，证明了白区工作中这些策略原则的正确性。和这种正确的策略指导相反，各次“左”倾路线的同志们因为不知道客观地考察敌我力量的对比，不知道采取与此相当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不承认或不重视敌人内部的矛盾，这样，他们在应当防御的时候，固然因为盲目地实行所谓“进攻路线”而失败，就在真

³⁵⁹⁵ 引自刘少奇同志所作《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

³⁵⁹⁶ 引自刘少奇同志《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信》。

³⁵⁹⁷ 引自刘少奇同志所作《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

正应当进攻的时候，也因为不会组织胜利的进攻而失败。他们“估计形势”的方法，是把对他们的观点有利的某些个别的、萌芽的、间接的、片面的和表面的现象，夸大为大量的、严重的、直接的、全面的和本质的东西，而对于不合他们的观点的一切实际（如敌人的强大和暂时胜利，我们的弱小和暂时失败，群众的觉悟不足，敌人的内部矛盾，中间派的进步方面等），则害怕承认，或熟视无睹。他们从不设想到可能的最困难和最复杂的情况，而只是梦想着不可能最顺利和最简单的情况。在红军运动方面，他们总是把包围革命根据地的敌人描写为“十分动摇”、“恐慌万状”、“最后死亡”、“加速崩溃”、“总崩溃”等等。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们甚至认为红军对于超过自己许多倍的整个的国民党军队还占优势，因此总是要求红军作无条件的甚至不休息的冒进。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们否认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所造成的南方和北方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这种情况只是到了抗日战争期间才起了一个相反的变化），错误地反对所谓“北方落后论”，要求在北方乡村中普遍地建立红色政权，在北方白色军队中普遍地组织哗变成立红军。他们也否认根据地的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不平衡，错误地反对所谓“罗明路线”³⁵⁹⁸。他们拒绝利用进攻红军的各个军阀之间的矛盾，拒绝同愿意停止进攻红军的军队成立妥协。在白区工作方面，他们在革命已转入低潮而反革命的统治力量极为强大的城市，拒绝实行必要的退却

³⁵⁹⁸ 罗明过去曾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三三年时任中央红色根据地福建省委的代理书记。罗明曾因认为党在闽西上杭、永定等边缘地区的条件比较困难，党的政策应当不同于根据地的巩固地区，而受到“左”倾分子的打击。“左”倾分子把他的意见错误地、夸大地说成是“对革命悲观失望的、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并在组织上开展所谓“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

和防御的步骤，拒绝利用一切合法的可能，而继续采取为当时情况所不允许的进攻的形式，组织庞大的没有掩护的党的机关和各种脱离广大群众的第二党式的所谓赤色群众团体，经常地无条件地号召和组织政治罢工、同盟罢工、罢课、罢市、罢操、罢岗、游行示威、飞行集会以至武装暴动等不易或不能得到群众参加和支持的行动，并曲解这一切行动的失败为“胜利”。总之，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同志们只知道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盲目地认为“斗争高于一切，一切为了斗争”，“不断地扩大和提高斗争”，因而不断地陷于不应有的和本可避免的失败。

（二）在军事上：

在中国革命的现阶段，军事斗争是政治斗争的主要形式。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一问题成为党的路线中的最迫切的问题。毛泽东同志不但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正确政治路线，而且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来，也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规定了服从于这一政治路线的正确的军事路线。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路线从两个基本观点出发：第一，我们的军队不是也不能是其他样式的军队，它必须是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服务于人民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第二，我们的战争不是也不能是其他样式的战争，它必须在承认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条件下，充分地利用敌之弱点与我之优点，充分地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以求得生存、胜利和发展。从第一个观点出发，红军（现在是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必须全心全意地为着党的路线、纲领和政策，也就是为着全国人民的各方面利益而奋斗，反对一切与此相反的军阀主义倾向。因此，红军必须反对军事不服从于政治或以军事来指挥政治的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红军必须同时负起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筹款（现在是生产）的三位一体的任

务，而所谓做群众工作，就是要成为党和人民政权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就是要帮助地方人民群众分配土地（现在是减租减息），建立武装，建立政权以至建立党的组织，因此，红军在军政关系和军民关系上，必须要求严格地尊重人民的政权机关和群众团体，巩固它们的威信，严格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³⁵⁹⁹；在军队的内部，必须建立正确的官兵关系，必须要有一定的民主生活和有威权的以自觉为基础的军事纪律；在对敌军的工作上，必须具有瓦解敌军和争取俘虏的正确政策。从第二个观点出发，红军必须承认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主要战争形式，承认只有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军和游击队、民兵相结合，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的人民战争，才能够战胜比自己强大许多倍的敌人。因此，红军必须反对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坚持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反对战役战术的以少胜多，坚持战役战术的以多胜少。因此，红军必须实行“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踪，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³⁶⁰⁰；“诱敌深入”³⁶⁰¹；“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

³⁵⁹⁹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毛泽东同志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所订的中国工农红军的纪律，后来成为八路军新四军的纪律，现在则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纪律。一九四七年十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因为这些纪律的内容在各地各军中略有出入，曾重作统一规定。“三大纪律”是：（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是：（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

³⁶⁰⁰ 引自一九二九年四月《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信》。见本书第一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所引，本合集第91页。

³⁶⁰¹ 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第五章（本合集第168页）。

地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³⁶⁰²等项战略战术的原则。各次“左”倾路线在军事上都是同毛泽东同志站在恰恰相反的方面：第一次“左”倾路线的盲动主义，使红军脱离人民群众；第二次“左”倾路线，使红军实行冒险的进攻。但是这两次“左”倾路线在军事上都没有完整的体系。具有完整体系的是第三次。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建军的问题上，把红军的三项任务缩小成为单纯的打仗一项，忽略正确的军民、军政、官兵关系的教育；要求不适当的正规化，把当时红军的正当的游击性当作所谓“游击主义”来反对；又发展了政治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在作战问题上，它否认了敌强我弱的前提；要求阵地战和单纯依靠主力军队的所谓“正规”战；要求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要求“全线出击”和“两个拳头打人”；反对诱敌深入，把必要的转移当作所谓“退却逃跑主义”；要求固定的作战线和绝对的集中指挥等；总之是否定了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不了解正确的人民战争。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他们始则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继则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主张分兵防御，“短促突击”，同敌人“拚消耗”；最后，在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时，又变为实行真正的逃跑主义。这些都是企图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正确的人民战争的结果。

在抗日战争的战略退却和战略相持阶段中，因为敌我强弱相差更甚，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正确方针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强求过多的运动战是错误的。但在将要到来的战略反攻阶段，正如全党的工作重心需要由乡村转

³⁶⁰² 引自一九三五年二月《中共中央关于冲破五次“围剿”的总结》。

到城市一样，在我军获得新式装备的条件下，战略上也需要由以游击战为主变为以运动战和阵地战为主。对于这个即将到来的转变，也需要全党有充分的自觉来作准备。

（三）在组织上：

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正确的政治路线应该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而为使这个路线真正从群众中来，特别是真正能到群众中去，就不但需要党和党外群众（阶级和人民）有密切的联系，而且首先需要党的领导机关和党内群众（干部和党员）有密切的联系，也就是说，需要正确的组织路线。因此，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各个时期既然规定了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政治路线，同时也就规定了服务于这一政治路线的联系党内党外群众的组织路线。这个工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也得到了重要的发展，其集中的表现，便是一九二九年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³⁶⁰³。这个决议，一方面把党的建设提到了思想原则和政治原则的高度，坚持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正确地进行反对单纯军事观点、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平均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等倾向的斗争，指出了这些倾向的根源、危害和纠正的办法；另一方面又坚持严格的民主集中制，既反对不正当地限制民主，也反对不正当地限制集中。毛泽东同志又从全党团结的利益出发，坚持局部服从全体，并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特点，规定了新干部和老干部、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以及不同部门、不同地区的干部间的正确关系。这样，毛泽东同志就供给了一个坚持真理的原则性和服从组织的纪律性相结合的模范，供给了一个正确地进行党内斗争和正确地保持党内团结的模范。与

³⁶⁰³ 即本书第一卷所载《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本合集第75页）。

此相反，在一切错误政治路线统治的同时，也就必然出现了错误的组织路线；这条错误的政治路线统治得愈久，则其错误的组织路线的为害也愈烈。因此，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次“左”倾路线，不但反对了毛泽东同志的政治路线，也反对了毛泽东同志的组织路线；不但形成了脱离党外群众的宗派主义（不把党当作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者和人民群众意志的集中者），也形成了脱离党内群众的宗派主义（不使党内一部分人的局部利益服从全党利益，不把党的领导机关当作全党意志的集中者）。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为贯彻其意旨起见，在党内曾经把一切因为错误路线行不通而对它采取怀疑、不同意、不满意、不积极拥护、不坚决执行的同志，不问其情况如何，一律错误地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罗明路线”、“调和路线”、“两面派”等大帽子，而加以“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甚至以对罪犯和敌人作斗争的方式来进行这种“党内斗争”。这种错误的党内斗争，成了领导或执行“左”倾路线的同志们提高其威信、实现其要求和吓唬党员干部的一种经常办法。它破坏了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取消了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民主精神，使党内纪律成为机械的纪律，发展了党内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倾向，因而使党内新鲜活泼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之发展，受到打击和阻挠。同这种错误的党内斗争相结合的，则是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宗派主义者不把老干部看作党的宝贵的资本，大批地打击、处罚和撤换中央和地方一切同他们气味不相投的、不愿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有工作经验并联系群众的老干部。他们也不给新干部以正确的教育，不严肃地对待提拔新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的工作，而是轻率地提拔一切同他们气味相投的、只知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缺乏工作经验、不联系群众的新干部和外来干部，来代替中

央和地方的老干部。这样，他们既打击了老干部，又损害了新干部。很多地区，更由于错误的肃反政策和干部政策中的宗派主义纠缠在一起，使大批优秀的同志受到了错误的处理而被诬害，造成了党内极可痛心的损失。这种宗派主义的错误，使党内发生了上下脱节和其他许多不正常现象，极大地削弱了党。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在此宣布：对于一切被错误路线所错误地处罚了的同志，应该根据情形，撤消这种处分或其错误部分。一切经过调查确系因错误处理而被诬害的同志，应该得到昭雪，恢复党籍，并受到同志的纪念。

（四）在思想上：

一切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之正确或错误，其思想根源都在于它们是否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出发，是否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和中国人民的客观需要出发。毛泽东同志从他进入中国革命事业的第一天起，就着重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以从事于对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尤其再三再四地强调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真理，再三再四地反对了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危害。毛泽东同志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所规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正是他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根据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具体地分析了当时国内外党内外的现实情况及其特点，并具体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历史经验的光辉的成果。在中国生活和奋斗的中国共产党人学习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应该是为了用以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各种实际问题，如同毛泽东同志所做的。但是一切犯“左”倾错误的同志们，在那时，当然是不能了解和接受毛泽东同志的做法的，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

表者更污蔑他是“狭隘经验主义者”；这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根源乃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在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时期更特别突出地表现为教条主义的缘故。教条主义的特点，是不从实际情况出发，而从书本上的个别词句出发。它不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来认真研究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过去和现在，认真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得出结论，作为中国革命的行动指南，再在群众的实践中去考验这些结论是否正确；相反地，它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若干个个别词句搬运到中国来当做教条，毫不研究这些词句是否合乎中国现时的实际情况。因此，他们的“理论”和实际脱离，他们的领导和群众脱离，他们不是实事求是，而是自以为是，他们自高自大，夸夸其谈，害怕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是必然的了。

在教条主义统治时期，同它合作并成为它的助手的经验主义的思想，也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经验主义同教条主义的区别，是在于它不是从书本出发，而是从狭隘的经验出发。应当着重地指出：最广大的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他们的一切有益的经验，是极可宝贵的财产。科学地把这些经验总结起来，作为以后行动中的指导，这完全不是经验主义，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正象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原则当做革命行动的指南，而不把它们当做教条，就完全不是教条主义，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样。但是，在一切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中，如果有一些人满足于甚至仅仅满足于他们的局部经验，把它们当做到处可以使用的教条，不懂得而且不愿意承认“没有革命的理论，就

不会有革命的运动”³⁶⁰⁴和“为着领导，必须预见”³⁶⁰⁵的真理，因而轻视从世界革命经验总结出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并醉心于狭隘的无原则的所谓实际主义和无头脑无前途的事务主义，却坐在指挥台上，盲目地称英雄，摆老资格，不肯倾听同志们的批评和发展自我批评，这样，他们就成为经验主义者了。因此，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出发点虽然不同，但是在思想方法的本质上，两者却是一致的。他们都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分割开来；他们都违背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把片面的相对的真理夸大为普遍的绝对的真理；他们的思想都不符合于客观的全面的实际情况。因此，他们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就有了许多共同的错误的认识（如错误的城市中心观点，白区工作中心观点，脱离实际情况的“正规”战观点等）。这就是这两部分同志能够互相合作的思想根源。虽然因为经验主义者的经验是局部的、狭隘的，他们中的多数对于全面性的问题往往缺乏独立的明确的完整的意见，因此，他们在和教条主义者相结合时，一般地是作为后者的附席而出现；但是党的历史证明，教条主义者缺乏经验主义者的合作就不易“流毒全党”，而在教条主义被战胜以后，经验主义更成为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主要障碍。因此，我们不但要克服主观主义的教条主义，而且也要克服主观主义的经验主义。必须彻底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路线和作风，才能普及和深入全党。

³⁶⁰⁴ 引自列宁《做什么？》第一章第四节。

³⁶⁰⁵ 引自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三日斯大林在联共（布）莫斯科组织的积极分子会议上所作的报告：《论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合全会的工作》。

以上所述政治、军事、组织和思想四方面的错误，实为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基本错误。而一切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都是从思想上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而来，都是从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而来。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指出：我们在否定各次“左”倾路线的错误时，同时要牢记和实行毛泽东同志“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³⁶⁰⁶的指示。应当指出：犯了这些错误的同志们的观点中，并不是一切都错了，他们在反帝反封建、土地革命、反蒋战争等问题上的若干观点，同主张正确路线的同志们仍然是一致的。还应指出，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时间特别长久，所给党和革命的损失特别重大，但是这个时期的党，因为有广大的干部、党员群众和广大的军民群众在一起，进行了积极的工作和英勇的斗争，因而在许多地区和许多部门的实际工作中，仍然获得了很大的成绩（例如在战争中，在军事建设中，在战争动员中，在政权建设中，在白区工作中）。正是由于这种成绩，才能够支持反对敌人进攻的战争至数年之久，给了敌人以重大的打击；仅因错误路线的统治，这些成绩才终于受到了破坏。在各次错误路线统治时期，和党的任何其他历史时期一样，一切为人民利益而壮烈地牺牲了的党内党外的领袖、领导者、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都将永远被党和人民所崇敬。

³⁶⁰⁶ 引自本书所载《学习和时局》，本合集第835页。

(五)

“左”倾路线的上述四方面错误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有很深的社会根源。

如同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正确路线反映了中国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思想一样，“左”倾路线则反映了中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思想。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小资产阶级极其广大的国家。我们党不但从党外说是处在这个广大阶层的包围之中；而且在党内，由于十月革命以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世界的伟大胜利，由于中国现时的社会政治情况，特别是国共两党的历史发展，决定了中国不能有强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因此就有大批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分子向无产阶级队伍寻求出路，使党内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也占了大多数。此外，即使工人群众和工人党员，在中国的经济条件下，也容易染有小资产阶级的色彩。因此，小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党内常常有各色各样的反映，这是必然的，不足为怪的。

党外的小资产阶级群众，除了农民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以外，城市小资产阶级大多数群众在中国也受着重重压迫，经常迅速大量地陷于贫困破产和失业的境地，其经济和政治的民主要求十分迫切，所以在现阶段的革命中，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革命动力之一。但是小资产阶级由于是一个过渡的阶级，它是有两面性的：就其好的、革命的一面说来，是其大多数群众在政治上、组织上以至思想上能够接受无产阶级的影响，在目前要求民主革命，并能为此而团结奋斗，在将来也可能和无产阶级共同走向社会主义；而就其坏的、落后的一面说来，则不但有其各种区别于无产阶级的弱点，而且在失去无产阶级的领导时，还

往往转而接受自由资产阶级以至大资产阶级的影响，成为他们的俘虏。因此，在现阶段上，无产阶级及其先进部队——中国共产党，对于党外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应该在坚决地广泛地联合他们的基础上，一方面给以宽大的待遇，在不妨碍对敌斗争和共同的社会生活的条件下，容许其自由主义的思想 and 作风的存在；另一方面则给以适当的教育，以便巩固同他们的联合。

至于由小资产阶级出身而自愿抛弃其原有立场、加入无产阶级政党的分子，则是完全另一种情形。党对于他们，和对于党外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应该采取原则上不同的政策。由于他们本来和无产阶级相接近，又自愿地加入无产阶级政党，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和群众革命斗争的实际锻炼中，他们是可以逐渐在思想上无产阶级化，并给无产阶级队伍以重大利益的；而且在事实上，加入我党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之绝大多数，也都为党和人民作了勇敢的奋斗和牺牲，他们的思想已经进步，很多人并已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了。但是，必须着重指出：任何没有无产阶级化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革命性，在本质上和无产阶级革命性不相同，而且这种差别往往可能发展成为对抗状态。带着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党员，虽然在组织上入了党，但是在思想上却还没有入党，或没有完全入党，他们往往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面貌出现的自由主义者、改良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布朗基主义³⁶⁰⁷者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但不能引导中国将来的共产主义运动达到胜利，而且也不能引导中国今天的新民主主义运动达到胜利。如果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不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

³⁶⁰⁷ 布朗基主义是指以法国布朗基（一八〇五年至一八八一年）为代表的一种革命冒险主义思想。布朗基主义否认阶级斗争，妄想不依靠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用极少数知识分子的阴谋行动，就可以使人类摆脱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

和这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的旧有思想坚决地分清界限，严肃地、但是恰当地和耐心地进行教育和斗争，则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不但不能克服，而且必然力图以他们自己的本来面貌来代替党的无产阶级先进部队的面貌，实行篡党，使党和人民的事业蒙受损失。党外的小资产阶级愈是广大，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愈是众多，则党便愈须严格地保持自己的无产阶级先进部队的纯洁性，否则小资产阶级思想向党的进攻必然愈是猛烈，而党所受的损失也必然愈是巨大。我党历史上各次错误路线和正确路线之间的斗争，实质上即是党外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表演；而上述“左”倾路线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错误，也即是这种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在这个问题上，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加以分析：

首先，在思想方法方面。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基本上表现为观察问题时的主观性和片面性，即不从阶级力量对比之客观的全面的情况出发，而把自己主观的愿望、感想和空谈当做实际，把片面当成全面，局部当成全体，树木当做森林。脱离实际生产过程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只有书本知识而缺乏感性知识，他们的思想方法就比较容易表现为我们前面所说的教条主义。联系生产的小资产阶级分子虽具有一定的感性知识，但是受着小生产的狭隘性、散漫性、孤立性和保守性的限制，他们的思想方法就比较容易表现为我们前面所说的经验主义。

第二，在政治倾向方面。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倾向，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由此而来的思想方法上的主观性片面性，一般地容易表现为左右摇摆。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许多代表人物希望革命马上胜利，以求根本改变他们今天所处的地位；因而他们对于革命的长期努力缺乏忍耐心，他们对于“左”的革命词句和口号有

很大的兴趣，他们容易发生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情绪和行动。小资产阶级的这种倾向，在党内反映出来，就构成了我们前面所说的“左”倾路线在革命任务问题、革命根据地问题、策略指导问题和军事路线问题上的各种错误。

但是，这些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在另外一种情况下，或是另一部分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也可以表现悲观失望，表现追随于资产阶级之后的右倾情绪和右倾观点。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后期的陈独秀主义，土地革命后期的张国焘主义和长征初期的逃跑主义，都是小资产阶级这种右倾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抗日时期，又曾发生过投降主义的思想。一般地说，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分裂的时期，比较容易发生“左”倾错误（例如土地革命时期“左”倾路线统治党的领导机关至三次之多），而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联合的时期，则比较容易发生右倾错误（例如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后期和抗日战争初期）。而无论是“左”倾或右倾，都是不利于革命而仅仅利于反革命的。由于各种情况的变化而产生的左右摇摆、好走极端、华而不实、投机取巧，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坏的一面的特点。这是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所处的不稳定地位在思想上的反映。

第三，在组织生活方面。由于一般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法的限制，特别由于中国的落后的分散的宗法社会和帮口行会的社会环境，小资产阶级在组织生活上的倾向，容易表现为脱离群众的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这种倾向反映到党内，就造成我们前面所说的“左”倾路线的错误的组织路线。党长期地处在分散的乡村游击战争中的情况，更有利于这种倾向的发展。这种倾向，不是自我牺牲地为党和人民工作，而是利用党和人民的力量并破坏党和人民的利益来达到个人和宗派的目的，因此它是同

党的联系群众的原则、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的纪律不相容的。这种倾向，常常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如官僚主义、家长制度、惩办主义、命令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半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极端民主主义、闹独立性、行会主义、山头主义、同乡同学观念、派别纠纷、耍流氓手腕等，破坏着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和党内的团结。

这些就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三个方面。我们党内历次发生的思想上的主观主义，政治上的“左”右倾，组织上的宗派主义等项现象，无论其是否形成了路线，掌握了领导，显然都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之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无产阶级的表现。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采取教育方法，将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加以分析和克服，促进其无产阶级化，是完全必要的。

(六)

由上所述，可见各次尤其是第三次统治全党的“左”倾路线，不是偶然的产物，而是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因此，要克服错误的“左”倾思想或右倾思想，既不能草率从事，也不能操切从事，而必须深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提高全党对于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鉴别能力，并在党内发扬民主，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耐心说服和教育的工作，具体地分析错误的内容及其危害，说明错误之历史的和思想的根源及其改正的办法。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克服党内错误的应有态度。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指出：毛泽东同志在这次全党整风和党史学习中所采取的方针，即“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

结同志”³⁶⁰⁸的方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克服党内错误的正确态度的模范，因而取得了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提高并团结全党的伟大成就。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指出：在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主义和李立三主义的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必要的。这些斗争的缺点，是没有自觉地作为改造在党内严重存在着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步骤，因而没有在思想上彻底弄清错误的实质及其根源，也没有恰当地指出改正的方法，以致易于重犯错误；同时，又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以为对于犯错误的人们一经给以简单的打击，问题就解决了。党在检讨了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错误以后，认为今后进行一切党内思想斗争时，应该避免这种缺点，而坚决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方针。任何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只要他已经了解和开始改正自己的错误，就应该不存成见地欢迎他，团结他为党工作。即使还没有很好地了解和改正错误，但已不坚持错误的同志，也应该以恳切的同志的态度，帮助他去了解 and 改正错误。现在全党对于过去错误路线的认识，已经一致了，全党已经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周围团结起来了。因此，全党今后的任务，就是在弄清思想、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加强团结，正象本决议的第二节上所说的：“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我们党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一切分析、批判、争论，是应该从团结出发，而又达到团结的，如果违背了这个原则，那就是不正确的。但是鉴于党内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社会根源的存在以及党所处的长期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的

³⁶⁰⁸ 引自本书所载《学习和时局》，本合集第 835 页。

环境，又鉴于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想残余还是存在着，尤其是对于经验主义还缺乏足够的批判，又鉴于党内严重的宗派主义虽然基本上已经被克服，而具有宗派主义倾向的山头主义则仍然相当普遍地存在着等项事实，全党应该警觉：要使党内思想完全统一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还需要一个长时期的继续克服错误思想的斗争过程。因此，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决定：全党必须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并着重联系中国革命的实践，以达到进一步地养成正确的党风，彻底地克服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等项倾向之目的。

(七)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着重指出：二十四年来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了的，并且还在证明着，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我们党和全国广大人民的奋斗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今天我党在抗日战争中所已经取得的伟大胜利及其所起的决定作用，就是这条正确路线的生动的证明。党在个别时期中所犯的“左”右倾错误，对于二十四年来在我党领导之下的轰轰烈烈地发展着的、取得了伟大成绩和丰富经验的整个中国革命事业说来，不过是一些部分的现象。这些现象，在党还缺乏充分经验和充分自觉的时期内，是难于完全避免的；而且党正是在克服这些错误的斗争过程中而更加坚强起来，到了今天，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更普遍地更深入地掌握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结果，必将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和不可战胜的力量。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坚决相信：有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这样三次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的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必将使中国革命达到彻底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

3609

(1945年4月21日)

整个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性的大战，是在一九一四年发生的，跟着世界战争来了一个世界革命时期。首先在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世界历史几千年以来都在发展着，进步着，但只有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才产生了新的方向。奴隶社会及其以后的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是人剥削人的社会。十月革命后的新的历史方向，就是取消人剥削人的制度。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全世界无产阶级及其他先进分子上了共产主义的一课。……以前在中国并没有人真正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比飞机飞得还快。因为它走得这样快，所以一九一九年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就不同了，五四运动以后，很快就晓得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势力的口号。在这以前，哪个晓得提这样的口号呢？不知道！这样的口号，这样明确的纲领，从中国无产阶级产生了自己的先锋队——共产党起，就提出来了。

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知道的事也并不多，可谓年幼无知，不知世事。但是这以后二十四年就不得了，翻天覆地！整个

³⁶⁰⁹ 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的报告。

世界也是翻天覆地的。中国是翻天覆地的二十四年，世界是翻天覆地的二十八年。

我们现在还没有胜利，力量还小，前面还有困难。……所以我们必须谨慎谦虚，不要骄傲急躁，要戒骄戒躁。谦虚就不骄，就可以戒骄。急躁和骄傲是连在一起的，骄傲就要急躁，急躁的人没有不是骄傲的、不谨慎的、粗枝大叶的。

一个队伍里头，人们的思想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经常是不整齐的。但对犯错误的同志要有好的态度。家庭里是很少有开除家籍的事情的。阿 Q 到底姓什么虽不清楚，但也没有听说他曾被开除家籍。阿 Q 斗争起来也算英勇。他的缺点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加党八股，毫无自我批评精神。人家的疮疤他要揭，他的疮疤人家揭不得。至于教条主义和党八股，那厉害得很，长凳一定要叫长凳，不能叫条凳，叫条凳是路线错误，那样教条主义，那样党八股！但是，写阿 Q 的作家还是喜欢阿 Q 的，因为反革命把他枪毙了。所以对于有缺点错误的人，我们要团结。

我这个人也犯过错误。在二十多年的工作中，无论在军事、政治各方面，或在党务工作方面，我都犯了许多错误。我们大家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出来的人，只有这样多的一点知识，这样大的一点本领。说我毫无本领，一点也不懂马列，那我也不同意。一个托派分子，过去是共产党员，名叫叶青³⁶¹⁰，他说毛泽东这个人一点马列主义也没有，只有一个主义叫做毛泽东主义，代表农民小资产阶级的主义。这我不赞成。好像我这里没有，他

³⁶¹⁰ 叶青，又名任卓宣（一八九六——一九九〇），四川南充人。一九二三年任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二八年被捕后叛变，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那里倒有很多马列主义，甚至都在他那里。说我马列主义成了堆，那也不是。

人家喊万岁，我说我五十二岁。当然不可能也不应该有什么万岁，但总是引出一个任务来，即还要前进，要再长大一点。说懂一点马列主义，也引出一个任务来，也是要前进。全世界自古以来，没有任何学问、任何东西是完全的，是再不向前发展的。地球是在发展的，太阳是在发展的，这就是世界。停止了发展就不是世界。整个宇宙不晓得经过多少万万年，现在比过去是进步了。地球上出了生物，出了动物，出了人类。人类又有几十万年的历史，出了文明社会，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出了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宇宙观教给我们，要懂得将来还要进步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中国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将来还要进步，直到阶级没有了，政党也不要了，共产党、国民党一概不要，八路军、新四军也不要了。太阳、地球在很远的将来也都有一天要毁灭。旧的东西毁灭了又有新的产生。有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人，一定要这样看问题。

从一定意义上讲，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恩格斯说阶级斗争有三种：政治斗争、经济斗争、理论斗争。后面两种斗争也都含有政治性质。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有这种观点，这是彻底革命的观点。

事情总是不完全的，这就给我们一个任务，向比较完全前进，向相对真理前进，但是永远也达不到绝对完全，达不到绝对真理。所以，我们要无穷尽无止境地努力。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 政治报告³⁶¹¹

(1945年4月24日)

所谓人民大众，主要的就是农民。

人民大众最主要的部分是农民，其次是小资产阶级，再其次才是别的民主分子。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农民。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没有一切革命。

所谓无产阶级领导，就是共产党领导。

什么是不要马克思主义？就是忘记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忘记了人民大众，忘记了农民。……反帝反封建不要农民，还有什么反封建？没有反封建，还有什么反帝呢？

所谓人民战争，基本上或者说主要的，就是农民战争。

有人说我们党的哲学叫“斗争哲学”，榆林有一个总司令叫邓宝珊³⁶¹²的就是这样说的。我说“你讲对了”。自从有了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他们就向被压迫的人民进行斗争，“斗争哲学”是他们先发明的。被压迫人民的斗争哲学”出来得比较晚，那是斗争了几千年，才有了马克思主义。

³⁶¹¹ 毛泽东向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提交了《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同时又在大会上作了这个口头政治报告。

³⁶¹² 邓宝珊，当时任国民党军晋陕绥边区总司令。

不要怕麻烦。要革命就会有麻烦，而且有时非常麻烦。……世界上不会没有风波，怕风波就不能做人，那就赶快到阎王那里去交账。我们党现在经常遇到风波，有大风波，中风波，小风波，我们不要怕风波。现在我们的意志更加坚强了，不至于被风波淹没。要在中国这个海里淹死我们党，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会的。

将来几十年以后，要把一切党外农民，提高到无产阶级的水平。如不相信这一条，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将来我们要搞机械化，要搞集体化，那就是提高他们。

有人说我们党要改改名称才好，他们说我们的纲领很好，就是名称不好，“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号则不可”。不但蒋委员长来电报要我们改名称，中间派也劝我们改名称，像左舜生³⁶¹³就说过：“你们的纲领实在好，如果你们不叫共产党，我就加入。”很多美国人也要我们改名称，我们若是改了名称，他们就喜欢了。他们喜欢我们改成国民党，大概世界上最好的名称莫过于国民党了。……国民党这名称总算好吧，但是为什么人家还是那样不喜欢国民党呢？所以我们党的名称还是不要改。我们的名称，中国人民是喜欢的。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还在一九三九年我们就提出了这个口号，现在还是这个方针。好比说，我们有一百条枪，你们缴了我们九十九条，我们当然不高兴，但是不怪你们，因为你们本领大，高明得很。但是，就是只剩一条枪，我们也要打到底的。只要我们手里还有一条枪，我们被打倒了，就把枪交给我们的儿子，儿子再交给孙子。

³⁶¹³ 左舜生（一八九三——一九六九），湖南长沙人。当时任中国民主同盟秘书长、代理主席。他于一九四五年三月十八日发表声明，表示民盟不参加国民党召开的国民大会。

我们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种，有香的马克思主义，有臭的马克思主义，有活的马克思主义，有死的马克思主义，把这些马克思主义堆在一起就多得很。我们所要的是香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

关于个性与党性。有一个新闻记者写了一篇文章登在《大公报》上，说共产党是要消灭个性，只要党性，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我在报告里讲了，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是摧残个性的，使中国人民不能发展他们的聪明才智，他们的身体也不能发展，精神也不能发展，都受到了摧残。民族战争就反对这些东西，外国民族压迫中国民族是不行的，我们要独立。外国野蛮的法西斯压迫中国人民，不讲道理是不行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要求独立！中国如果没有独立就没有个性，民族解放就是解放个性，政治上要这样做，经济上要这样做，文化上也要这样做。

讲到个性与党性，党性就是普遍性，个性就是特殊性。没有一种普遍性不是建筑在特殊性的基础上的。没有特殊性哪里有普遍性？没有党员的个性，哪里有党性？党性是共同的性质、普遍的性质，全党每一个人都有有的性质。至于每一个党员是不是不相同？当然不相同。个性不能强同，抹煞这种不同，就是不让同志们发展长处。这些都不能统一在一条轨道之上。抹煞各种差别，结果就会取消统一，抹煞特殊性也就没有统一性。这是一个问题。

革命要求我们能说明中国的革命运动，说明这个运动的各个方面，说明它的内部联系，包括军事、政治、文化、经济，整个革命工作的各个侧面及其内部联系，并总结经验，把它提高起来，使之条理化、系统化。什么是理论？就是有系统的知识。马列主义的理论，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有系统的知识。

一个阶级革命要胜利，没有知识分子是不可能的。……无产阶级要翻身，劳苦群众要有知识分子，任何一个阶级都要有为它那个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要讲真话。……讲真话，每个普通的人都应该如此，每个共产党人更应该如此。

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³⁶¹⁴

(1945年5月24日)

我们是有理想的现实主义，或者叫做革命的现实主义，我们不是无原则的现实主义。理想主义是原则性，现实主义就是灵活性，理想主义的原则性与现实主义的灵活性要统一起来，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的现实主义。感情和理智这两个东西，现在我们要统一一下，也是可以统一的，就是在理智指导下的感情，把理智放到第一位。凡是犯过错误的一概不选举，这是理想。但只确定这一条还不够，还缺少一条，就是说，人家承认错误、改正错误我们就要选举他。

世界上的事，往往是这样，就是为了痛快，往往反倒不痛快，而准备了不痛快，不痛快或者可以少一点。所以我们要下决心不怕麻烦，下决心和犯过错误的同志合作。

历史的经验证明：要图痛快，就不痛快；准备了麻烦，麻烦就少。世界上的事，大体上都是这样。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相信工具论。政府是什么东西呢？国家是什么东西呢？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外一个阶级的机关，是个机器，是个工具。我们的政府是什么呢？是压迫反革命的工具。反革命政府是什么呢？是压迫革命的工具。总之，都是一种工具，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看法。党是

³⁶¹⁴ 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阶级斗争的工具，政府也是工具，党的中央委员会、党的领导机关，也是党的工具，都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我们是阶级使用的武器，我们阶级要胜利，就要选出先锋队来。群众是从实践中来选择他们的领导工具、他们的领导者。被选的人，如果自以为了不得，不是自觉地作工具，而以为“我是何等人物”！那就错了。我们党要使人民胜利，就要当工具，自觉地当工具。各个中央委员，各个领导机关都要有这样的认识。这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就是《国际歌》上所讲的，“不是神仙，不是皇帝，更不是那些英雄豪杰，全靠自己救自己。”³⁶¹⁵自己救自己，他就要选举党，选举工具。

³⁶¹⁵ 这是当时翻译的《国际歌》歌词中的几句。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经过修订的《国际歌》歌词的译文。这段歌词的新译文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

(1945年5月31日)

我们的同志要注意，要看大的东西，要看普遍的大量的东西。许多同志往往对于普遍的大量的东西看不见，只看见局部的小量的东西。十月革命，砍掉了资本主义一只脚；第二次世界大战，德、意法西斯资本主义打倒了，法国内部最坏的东西垮台了，许多小皇帝也垮台了，小国家起了变化，都进步了，这又砍掉了资本主义一只脚。这些都是大事情，必须看到这些大事情，才能正确地进行分析，才能在分析时不会犯错误。

从经济上说，美国是世界经济的喜马拉雅山，但这个山是要倒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问题，应该这样来认识。美国的危机，归根到底不能由资本主义自身来克服，而是要由无产阶级革命来克服。

中国也要发展资本主义。中国的资本主义是什么性质？……蒋介石搞的是半法西斯半封建的资本主义。我们提倡的是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有它的生命力，还有革命性。从整个世界来说，资本主义是向下的，但一部分资本主义在反法西斯时还有用，另一部分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将来还有用，在中国及欧洲、南美的一些农业国家中还有用，它的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的，它是革命的、有用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的。

有人提出中国可能变成美国的半殖民地，我看这个提法很对。在抗战以前近一百年中间，中国是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统治的半殖

民地。九·一八事变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以后，国民党削弱了，就不得不依赖美国，这样中国就可能变成以美国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主统治的半殖民地。以美国为主控制国民党，英国可能插进一只小脚。这一变化将是一个长期的麻烦，我们共产党要好好准备，以应付这个变化。日本也许在明年就倒下去，这将是一九三一年日本进攻中国以来十六年中的大变化，这个变化对我们是有利的。把日本侵略者打跑了，可是又来了一个“特殊繁荣”的美国，它现在控制着国民党，所以我们要做国际联络工作，争取美国的无产阶级援助我们。我们党的高级干部，应该特别注意美国的情况。中国可能变成美国的半殖民地，这是一个新的变化。

古人说过：“艰难困苦，玉汝于成”。³⁶¹⁶艰难困苦给共产党以锻炼本领的机会，天灾是一件坏事，但是它里头含有好的因素，你要是没有碰到那个坏事，你就学不到对付那个坏事的本领，所以艰难困苦能使我们的事业成功。

党内发生纠纷，这也是给我们上课，使我们获得锻炼。来一次大纠纷，就是一次大锻炼。毛铁炼成钢，是要经过无数次的敲打的。

斯大林说：没有预见就不叫领导，为着领导必须预见。³⁶¹⁷整个人类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对于社会的发展历来没有预见，或者没有很清楚的预见。……资产阶级在自然科学方面有很多好的预见，但在社会科学方面还是盲目的。只有产生了马克思主义，

³⁶¹⁶ 语义出自宋代张载《西铭》：“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

³⁶¹⁷ 参见斯大林《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的工作》。原文是：“掌着舵，睁着眼，但是当某种灾难临头之前，竟什么也看不到，——这不能算是领导。布尔什维主义不是这样理解领导的。要领导就应当有预见。而预见，同志们，不是什么时候都容易做到的。”（《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2页）

才对社会发展有了预见，使人类对社会发展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阶段。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基础的，它对于将来和前途看得清楚，对于社会各个阶级向什么方向发展也看得清楚。……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

凡是政策上犯错误的，一定是大东西看不见。小东西看不见，也会犯错误，但那只是一点一件的错误，牵涉的面不大，这种错误十个、八个也不是很关紧要的。当然，犯了这样的错误也不好，但毕竟不算大错误。凡是大的错误，就是对大量的普遍的东西看不到。

所谓预见，不是指某种东西已经大量地普遍地在世界上出现了，在眼前出现了，这时才预见；而常常是要求看得更远，就是在地平线上刚冒出来一点的时候，刚露出一点头的时候，还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时候，就能看见，就能看到它的将来的普遍意义。

盲目性是没有预见的，是妨碍预见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是不可能预见的。而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没有领导就没有胜利。因此，可以说没有预见就没有一切。

我们要提倡想问题。早几年前《新中华报》要我写几个字，我当时是有感而发，就写了两个字“多想”。“多想”，就是说要开动脑筋。我们的同志过去不大想问题，这要怪过去的领导不提倡想问题。脑筋是“心之官”，是思想器官，这个器官专门做一

项工作，就是“想”。孟子说“心之官则思”³⁶¹⁸，两千年以前他就规定了脑筋的任务。我们全党要提倡想问题。我们的脑筋要多想，想党内的各种问题，想阶级的问题，想国家的问题，想我们民族的问题，等等。

我们的同志们还要善于分析问题。我们党内过去有一个习惯，就是有一个固定的框子，无论做文章、讲话，都用这个框子去套。这个框子就是所谓党八股。我们要打破这个框子。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对具体的问题作具体的分析，这是列宁讲的，我们恰恰缺乏这一点。所以，要提倡多想，这样就可以去掉盲目性，就可以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

一个问题来了，一个人分析不了，就大家来交换意见，要造成交换意见的空气和作风。我这个人凡事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问同志们，问老百姓。打仗也是这样。我们要善于跟同志们交谈。比如，《逼上梁山》就是一个集体创作，《三打祝家庄》也是一个集体创作，《白毛女》也是一个集体创作，让自己的功劳同大家共有，这有什么不好呢？《共产党宣言》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两个人合作写的。我们搞了一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又搞了一个政治报告，如果不是大家都来，一个人怎么能够搞得完全呢？首先要承认这一点，就是一个人搞不完全，要依靠大家来搞，这就是我们党的领导方法。要用这样的方法来启发同志的思想，去掉盲目性。

要广开言路，打开窗户。封建专制时代还有那么几个开明的皇帝能广开言路，何况我们共产党呢？我们更要广开言路，打开窗户，不要怕打开窗户可能吹进沙子来。进来一点尘土，坏处有

³⁶¹⁸ 参见《孟子·告子上》。心这个器官职在思考。

一点，但并不大，而开窗户透空气的利益却很大，我们要从这种利害关系上看这个问题。我们是干革命的，还怕民主？还怕人家发表意见？

系统地解决问题才叫做科学，不是系统的而是零碎的，就是正确的也不是科学的。

党性与个性问题。这是普遍性与差别性的问题，集体与个人关系的问题。在我们党内，在我们解放区，人民有了比较充分的自由，有独立性和个性。而在封建制度下，人民是没有人格、没有自由、没有独立性、没有个性的。马克思说：“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³⁶¹⁹在中国的封建制度下，广大人民也没有独立性和个性，原因是他们没有财产。独立性、个性、人格是一个意义的东西，这是财产所有权的产物。中国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有财产所有权，他们使大批的人破产，使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破产，财产集中在他们手里，他们自己就有独立性、个性、自由，而广大人民丧失了财产所有权，也就没有个性、独立性、自由，或者是削弱了。因此要恢复他们的个性，就要进行革命斗争，这就使人民有了个性、自由和人格。至于我们党，它本来就是人民的一部分，当然不会使工人、知识分子、农民出身的党员没有人格。人民有人格，我们党也就有，人民都没有，我们党哪里会有呢？我们要向党员进行教育，使他们自觉，懂得社会上还有很多人没有人格，没有自由，要为他们的自由而奋斗。在我们党领导的解放区，不仅社会上的人都有人格、独立性和自由，而且在我们党的教育下，更

³⁶¹⁹ 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6页）。

发展了他们的人格、独立性和自由。这个问题，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讲得很清楚，他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不能设想每个人不能发展，而社会有发展，同样不能设想我们党有党性，而每个党员没有个性，都是木头，一百二十万党员就是一百二十万块木头。这里我记起了龚自珍³⁶²⁰写的两句诗：“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在我们党内，我想这样讲：“我劝马列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不要使我们的党员成了纸糊泥塑的人，什么都是一样的，那就不好了。

有两种个性，即创造性的个性和破坏性的个性。对我们党来说是如此，对社会来说也是如此。创造性的个性是什么呢？比如模范工作者、特等射击手、发明家、能独立工作的干部，不但党外斗争有勇气，党内斗争也有勇气，盲目性少，不随声附和，搞清楚情况再举手，这就是创造性的个性，它同党性是完全一致的，完全统一的。另一种个性，是带破坏性的、个人主义的，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搞所谓标新立异。其实标新立异也有两种：一种是革命的标新立异，比如模范工作者、劳动英雄、发明家，他们提出很多好的意见，比许多人工作更进步，这一种是创造性的革命性的标新立异。另一种是破坏性的标新立异，它越出了无产阶级轨道，同党性不一致，是小资产阶级的方针、路线和政策，是错误的。马克思讲的独立性和个性，也是有两种，有革命的独立性和个性，有反动的独立性和个性。而一致的行动，一致的意见，集体主义，就是党性。我们要使许多自觉的个性集中起来，对一定的问题、一定的事情采取一致的行动、一致的意见，有统

³⁶²⁰ 龚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清朝思想家、文学家和诗人。“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两句诗，见龚自珍《己亥杂诗·九州生气恃风雷》。

一的意志，这是我们的党性所要求的。有些人所谓的发展个性就是说，我们拥护新民主主义，就必须有另外一批人反对新民主主义，才算是发展个性；我们主张打日本，就一定要有另外一批人反对打日本，才算是发展个性；我们反对汪精卫，就一定要有了一批人拥护汪精卫，才算是发展个性。这种发展个性，是我们坚决反对的。

即使一生一世只翻译了一本书，也是有功劳的。

我们应当是现实主义的，当然是革命的现实主义，有理想的现实主义。

在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上的演说

(1945年6月17日)

我们今天的公祭可以一直上溯到一八四一年平英团那些英雄们，也祭奠他们。平英团的反英斗争，太平天国运动，都是英勇的斗争。太平天国有几十万军队、成百万的农民，打了十三年，最后南京城被清兵攻破的时候，一个也不投降，统统放起火烧死了，太平天国就这样结束的。他们失败了，但他们是不屈服的失败，什么人要想屈服他们，那是不行的。平英团现在没有了，太平天国也没有了，义和团也没有了。但是平英团以后出了一个太平天国，太平天国以后出了一个义和团，义和团以后出了一个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以后出了一个共产党，因此有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

革命力量的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可能被消灭，弄得不好就会被敌人消灭，被敌人屠杀，甚至可能几十万地被他们消灭，但是跟着却会有更多的人加入我们的队伍。我看见过这样的家庭，同志们一定也看见过许多这样的家庭，反动派杀掉了父亲，他的儿子，三个四个，甚至七个八个，还有女儿，统统加入共产党，统统跑到延安来了。所以，反动派杀人越多，革命队伍反而扩大了。

我曾和国民党的联络参谋讲过：我们有一百支枪，你们有本领缴我们九十九支，我佩服你们，因为你们会打，我们不会打。一百支枪被你们缴去了九十九支，我们还剩下一支，用这一支枪，我们也要打下去。剩下一支枪了，你们说投降吧！我们说那不行，

“投降”这个词在我们的字典里是没有的，在你们的字典里可能有。

我们有这样的信心，一定要把黑暗的中国从地球上除掉，建设一个光明的中国。这个光明的中国是烈士们长期奋斗的目标，他们虽然没有成功就牺牲了，但是他们给了我们经验教训。我们今天开追悼大会纪念他们，革命也还没有成功，但是明天我们就要成功。我们下决心要把中国变为人民的中国，要战胜一切外国的、中国的反动派，一切外国的、中国的压迫者，不战胜他们决不罢休。

给柳亚³⁶²¹的信

(1945年10月4日、7日)

前曾奉告二语：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吾辈多从曲折（即困难）二字着想，庶几反映了现实，免至失望时发生许多苦恼。而困难之克服，决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先生诗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³⁶²²，读之使人感发兴起。可惜我只能读，不能做。但是万千读者中多我一个读者，也不算辱没先生，我又引以自豪了。

赤膊上阵，有时可行，作为经常办法则有缺点，先生业已了如指掌。目前发表文章、谈话，仍嫌过早。

³⁶²¹ 柳亚子（一八八七——一九五八），江苏吴江人，民主主义者、诗人。当时是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负责人。

³⁶²² 陆游（一一二五——一二一〇），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南宋诗人。陈亮（一一四三——一九四），婺州永康（今属浙江）人，南宋思想家、文学家。

在抗大七分校的讲话

(1945年10月25日)

我们除了解放中国人民以外，没有别的工作。同志们！团结起来，大家一条心，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而奋斗。

关于时局的四条分析³⁶²³

(1946年3月15日)

不要以为天下都是黑的，没有缝。广大的人民和资产阶级之间有一条缝，资产阶级继续分为两派也是一条缝。

对资产阶级中最顽固的、不能妥协的势力要反对；凡是能妥协的就联合。

³⁶²³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对付美蒋的主要政策不是让步而是斗争³⁶²⁴

(1946年7月6日)

如果我党既有相当的让步，而对其无理压迫与无理要求又能出以坚决的斗争，则其结果比较付出更多更大的让步反而要好些；如无坚决斗争精神，则结果将极坏。

³⁶²⁴ 这是毛主席给都该被民主联军西满军区的指示。

反动派的企图终究要失败³⁶²⁵

(1946年7月7日)

目前中国反动派的猖獗，不是表示他们的强大和有生命力，而是表示他们的软弱和回光返照。任何国家的法西斯统治，都具有这种性质，中国不能是例外。法西斯主义是最丑恶的，而又是最软弱与最无生命力的。因此，中国反动派要想消灭人民的力量，实现永久的法西斯统治是做不到的与不可能的。

³⁶²⁵ 本篇是毛泽东修改关于纪念“七七”九周年宣言稿时加写的两段话。

要胜利就要搞好统一战线³⁶²⁶

(1946年11月21日)

要胜利就要搞好统一战线，就要使我们的人多一些，就要孤立敌人，当然敌人也想孤立我们，但被孤立的只能是他们自己。

今天的世界是美帝国主义同全世界人民的矛盾和对立。

统一战线是一个基本的问题，无论如何要团结最大多数的人。

我们一方面要藐视他们，非此不足以长自己志气，灭敌人威风，而另一方面又要重视他们，每一仗都要谨慎周密，不要疏忽。

³⁶²⁶ 这是毛泽东在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上的讲话。

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³⁶²⁷

(1947年4月22日)

应完全不被敌之动作所迷惑，选择敌之薄弱部分主动地歼击之，选击何部那时再定。这即是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打各的）政策，亦即完全主动作战政策。

³⁶²⁷ 这是毛主席对晋察冀军区的指示。

一年作战总结及今后计划³⁶²⁸

(1947年7月10日)

我军作战方针，仍如过去所确立者，先打分散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强大之敌；先取中等城市及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及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夺取地方是歼敌有生力量的结果，往往须反复多次才能最后夺取地方；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一部打正面，以主力打迂回；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与大部兵员（十分之九的士兵及少数下级官佐）补充自己，配合土地改革与发展生产，支持长期战争；今后作战，运动战的可能已减少，主要是攻击敌军阵地，必须用大力加强炮兵与工兵。

³⁶²⁸ 这是毛主席对东北民主联军的指示。

在小河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1947年7月21日)

坚持土地改革不至于吓跑民族资本家，但不坚持土地改革势必会丧失农民，从而丧失革命战争，也丧失民族资本家。

出现了以美国反动派为首的各国反革命统一战线是可以肯定的，他们企图搞第三次世界大战。

各国反革命和中国反革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外强中干，这是由于他们存在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

西兵团的作战任务³⁶²⁹

(1947年8月24日)

应当提倡不怕牺牲、不怕困难、连续作战、猛攻猛打之作风。

³⁶²⁹ 这是毛主席对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的指示。

给敌以歼灭与歼灭性打击须同时注重³⁶³⁰

(1947年8月28日)

在目前情况下，给敌以歼灭与给敌以歼灭性打击，必须同时注重。给敌以歼灭是说将敌整旅整师干净全部地加以歼灭，不使漏网。执行这一方针，必须集中三倍或四倍于敌之兵力，以一部打敌正面，以另一部包围敌之两翼，而以主力或重要一部迂回敌之后方，即是说四面包围敌军，方能奏效。这是我军的基本方针，这是在敌军分散孤立、敌援兵不能迅速到达之条件下必须实行的正确方针。但在敌军分数路向我前进，每路相距不远，或分数路在我军前进方向施行防堵，每路亦相距不远之条件下，我军应当采取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方针。这即是说，不要四面包围，只要两面或三面包围，而以我之全力用于敌之正面及其一翼或两翼，不以全部歼灭敌军为目标，而以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为目标。这样做，可以减少我军伤亡，其被歼灭之部分可以补充我军，其被击溃之部分可以使其大量逃散，敌能收容者不过一部分，短期内亦难恢复战斗力。

³⁶³⁰ 这是毛主席给各野战军的指示。

陈谢部³⁶³¹的作战范围和原则

(1947年9月2日)

作战原则：对敌守备薄弱之据点及城市则坚决攻取之，对敌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又环境许可之据点及城市则相机攻取之，对敌守备强固之据点及城市则避开之，着重点放在调动敌人打运动战及占领广大乡村，消灭反动武装，发动群众，必须准备经过一个困难时期，逐步建立根据地。

³⁶³¹ 陈谢部，指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前委书记陈赓、副书记谢富治、常委韩钧。

给毛岸英的信

(1947年10月8日)

一个人无论学什么或作什么，只要有热情，有恒心，不要那种无着落的与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个人主义的虚荣心，总是会有进步的。

改造旧艺术创造新艺术³⁶³²

(1947年12月21日)

各国的情形都是如此，统治者的力量由大而小，解放者的力量由小而大。

据说苏联有一个工人，人家五年才能做完的事情他一年就可以做完，这里有一个道理，就是解放了的人民为自己而工作，所以具有无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你们平剧院接受旧的艺术，还要创造新的艺术。旧的艺术是有缺点的，尤其是它的内容，我看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历史本来不是帝王将相创造的，而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可是在旧戏中，比如孔明³⁶³³一出场就神气十足压倒一切，似乎世界就是他们的，劳动人民不过是跑龙套的。世界上本来百分之九十的人是工人、农民，我们住的房子，都是他们双手盖起来的，土豪劣绅连个柱子都搬不动，可是许多的旧戏却把劳动人民表现成小丑。当然，旧戏中也有些剧本是好的，如《打渔杀家》³⁶³⁴之类。有些旧戏你们可以改造它，用自己的创造力掌握了这门艺术，并且从政治上来个进步，你们就可能写些新的东西。

³⁶³² 这是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对晋绥平剧院演出队的讲话。

³⁶³³ 孔明，即诸葛亮（一八一——二三四），琅邪阳都（今山东沂南）人。三国时的政治家、军事家，刘备的主要谋士，刘备称帝后任蜀国丞相。

³⁶³⁴ 《打渔杀家》，又名《庆顶珠》、《讨鱼税》，戏曲传统剧目。主要内容是，萧恩与女儿桂英打鱼为生，当地恶霸丁自燮勾结官府，勒索鱼税，滥施刑杖，父女被迫起而反抗，杀死恶霸全家，远走他乡。

平剧的形式目前我们不忙改，只挑出若干需要修改的戏，首先从内容着手改造。

在杨家沟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³⁶³⁵

(1947年12月25日、28日)

我们既要反右，又要反“左”，以便划清界限，避免造成自己的孤立和失败。

我们在全局问题上要大胆，在具体斗争上要谨慎。然而我们有些同志却相反，重视抽象之敌，小视具体之敌。

³⁶³⁵ 这是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把打击面放在真正的封建剥削阶级范围内³⁶³⁶

(1948年1月)

我们必须按照实际情形去划分阶级，进行土改，决不可将本来不是地主、富农的人们人为地划成地主、富农，错误地扩大打击面，打乱革命阵线，帮助敌人，孤立自己。这是一个极端重大的问题，必须引起全党同志的注意。哪怕只是划错了一个人，也必须改正。

无论如何，只应该把打击面放在真正的封建剥削阶级的范围以内，绝对不许可超出这个范围。在人民解放军所到的原先是国民党统治的地方，打击面还要缩小些。在那里，首先只打击大地主、豪绅、恶霸、地主武装、保甲制度、特务分子，依照战争胜利与根据地巩固的情况，依照群众的觉悟程度与组织程度，逐步地发展到消灭全部封建制度。

³⁶³⁶ 这是毛泽东在任弼时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二日向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扩大会议作的《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讲话稿上修改和加写的几段文字。毛泽东在讲话稿上方还写了一段批语：“用明码明日开始拍发，争取两天或三天发完，由新华社转播全国各地，立即在一切报纸上公开发表，并印小册子。请范长江同志注意不要译错文字或标点符号。我们这里除新闻简报上发表外，并印小册子送中后委。”

对可以争取的中间派应采取积极争取与合作 态度³⁶³⁷

(1948年1月14日)

对一切可以争取的中间派，不管他们言论行动中包含多少动摇性及错误成分，我们应采取积极争取与合作态度，对他们的错误缺点，采取口头的善意的批评态度。

对一切应当争取的中间派的错误观点，在报纸刊物上批评时，尤其要注意文章的说服力。

³⁶³⁷ 这是毛主席起草的党内指示。

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1948年1月15日)

中国革命要胜利必须实行一条总纲领，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没有打倒，社会主义没有到来以前，总的纲领就只能是这一条，没有第二条。我们的统一战线，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我们的军队，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军队。所谓无产阶级领导，就是经过它的先锋队共产党来领导，人民大众主要就是农民。我们讲能够胜利，就要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如果我们的政策不正确，……那就还是不能胜利，共产党会由越来越多变成越来越少，蒋介石的孤立会变成国共两方面都孤立，人民不喜欢蒋介石，也不喜欢共产党。这个可能性是有的，在理论上不是不存在的。

地主作为一个阶级要消灭，作为个人要保护。为什么要消灭地主阶级？因为它代表的是反动的生产关系。政治上打倒蒋介石，目的就是为着在经济上摧毁封建买办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在农村就是解放农民，打破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彻底的平分土地，把土地所有权交给农民，使农民放心大胆好好生产，改进农作方法。但废除地主阶级的私有制，并不等于连他的人也不要了。

地主和旧式富农占农村人口十分之一，全国共有三千六百万人，这是社会的劳动力，是一种财富。

对美帝国主义，对蒋介石，总的方面我们应该轻视他们，但对具体的敌人就不能轻视，如果轻视就会犯原则性的错误。原则性有两个，对总的敌人我们是轻视的，对具体的敌人不能轻视。我们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在战斗中要一个阵地一个阵地地夺取。总之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如果我们思想中、工作中有了缺点错误，要随时准备修正，这叫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真理要坚持，有时真理不被大多数人所认识和了解，我们也要反“潮流”。不论是错误是缺点，哪怕是很小的，我们都要准备修正。

我们要习惯听闲话，准备多听闲话，把听闲话当作收集舆论的机会。我们需要像拣破铜烂铁一样将不同意见收集起来，经过熔化，准备修正我们思想上、工作上的毛病和错误。

转发朱德给中共中央信³⁶³⁸的批语

(1948年1月31日)

用民主讨论方式，发动士兵群众，在作战前，作战中，作战后讨论如何攻克敌阵，歼灭敌人，完成战斗任务。……陕北将此种情形，叫做军事民主，而将诉苦运动，三查三整³⁶³⁹，叫做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这些军队中的民主生活，有益无害，一切部队均应实行。

决不可只看见眼前的片面的所谓劳动者福利，而忘记了工人阶级的远大利益。

³⁶³⁸ 指朱德在视察晋察冀野战军和冀中等地后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亥）十日（灰）写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信，信中介绍了晋察冀部队在攻打石家庄等地的战斗中，发动官兵边打边谈群策群力学习运动战、歼灭战、攻坚战战术夺得胜利的经验。同时反映了一些城市工人工资待遇过高的问题，认为这样会使公私工厂大部关门，工人失业，损害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实际上是一种“自杀”政策。

³⁶³⁹ 三查三整，是中国共产党在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结合土地改革所进行的整党整军运动。三查，在地方上指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在部队里指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整，指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

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阶级关系和人民民主 革命³⁶⁴⁰

(1948年2月15日)

第一章 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

人们为着要生活，就要生产生活资料，例如粮食、衣服、房屋、燃料、器具等。人们为着要生产生活资料，就要有生产资料，例如土地、原料、牲畜、工具、工场等。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结合起来，就是社会的生产力。

人们为着要进行生产，就必须在生产过程中彼此发生一定的相互关系，否则就无法进行生产。因为人们的生产从来就是社会的生产，不能孤立地进行生产。这种人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就是社会的生产关系，就是人们对于生产资料的所有关系（为着通俗起见，所有关系在本文件中称为占有关系）。这种生产关系，在法律上表现为财产的所有权关系。

社会的生产力和社会的生产关系相结合，就是社会的生产方式。社会的生产方式是一切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和精神生活的基础。

³⁶⁴⁰ 这是《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中的第一章和第二章。这两章是毛泽东写的。整个规定草案共有二十五章。毛泽东在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日给刘少奇的电报中说：“这个文件实际上带着党纲、政纲、政策几重性质。我们如果要取得全国胜利，需要有这样一个文件，党内外才有明确遵循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的章程。”这个规定起草于一九四七年冬，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五日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后完稿，次日发给党的高级领导机关进行讨论，规定不下达。

在社会生产力的历史发展的某一个阶段中，人们对于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人们的生产关系，就开始由社会一切人们的共同占有关系，发展成为一部分人们的私人占有关系。少数人占有大量的生产资料，多数人丧失或只占有很少的生产资料。这样，后一种人的绝大部分就被迫为前一种人劳动，把自己劳动的结果交给前一种人，并向前一种人领取少量的报酬，作为自己的生活来源。这就是说，后一种人受前一种人的剥削，而前一种人则依靠大量地剥削后一种人作为自己的生活来源。后一种人中间的一部分，因为占有足以维持生活的生产资料，是以进行独立劳动作为自己的生活来源的，但是他们仍然不能逃脱前一种人在某种程度上的剥削。这样，人们就分裂成为不同的阶级，分裂成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由于生产力的发展，首先是由于生产工具的发展，例如由石头工具发展到简单的金属手工工具，再发展到较精的金属手工工具，再发展到复杂的机器工具，人们对于生产资料的所有关系，人们的生产关系，就发生变化。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变化，剥削阶级对于被剥削阶级施行剥削的方法也就发生变化。

社会分裂成为许多阶级，这样的社会，叫做阶级社会。这样的阶级社会，既区别于人类历史上分裂为阶级以前的原始的共产主义社会，又区别于阶级被消灭以后的新的共产主义社会。这后一种社会，现在已经在苏联存在和发展。全世界一切人类社会现在正向着苏联所走的道路前进，阶级社会的历史快要完结。人类历史上的阶级社会，大体上分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三个阶段。中国的社会发展的历史，也是如此。只是因为外部和内部的原因，中国没有也不可能发展到完全的资本主义的社会。

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还在一百多年以前（一八四〇年中英鸦片战争时期），就开始由古代的独立的封建的社会经济形态，逐步地改变为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社会经济形态，即是说半独立的半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在目前整个中国社会经济中，一方面，存在着外国帝国主义的经济，本国封建主义的经济、官僚资本主义的经济和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这些就是旧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另一方面，存在着新式的国家经济、被解放了的农民和小生产者的经济和新民主国家指导下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新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就生产技术而论，中国存在着大规模的机器生产事业、中小规模的机器生产事业和以家族为单位的手执简单工具以从事生产的各种小生产事业。旧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形态，在鸦片战争以来的长时期内占据优势。这种优势，现在正在被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所迅速地代替着。

马克思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彼此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依赖他们本身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是适合于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的。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就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现实的基础，而法律的及政治的上层建筑物，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竖立起来的。同时，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是和这个基础相适合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着一般社会生活的，政治生活的，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相反，正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就和现存的生产关系，或者说，就和所有权关系（所有权关系不过是现存生产关系的法律上的表现而已发生矛盾。而生产力，在此以前，是在这些关系的内部发展了的。于是这些关系，就由生

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枷锁。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在整个庞大的上层建筑物中，也就或多或少地迅速地发生大变革。”³⁶⁴¹

中国现阶段的人民民主革命的任务，就是要改变旧的社会经济形态、旧的生产关系以及竖立在其上面的一切社会的、政治的、精神的旧的建筑物，建立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生产关系以及竖立在其上面的一切社会的、政治的、精神的新的建筑物。我们的基本任务，就是如此。

第二章 中国目前的阶级关系和人民民主革命

第一节

中国目前所有的主要阶级如下：（甲）无产阶级。例如新民主国家企业中的劳动者，资本家经营的机器工业、手工业、农业和商业中的雇佣劳动者，他们都不占有私有的生产资料。但是新民主国家企业中的劳动者，按其原来状况，是无产阶级，但是按其现在状况，他们却经过了他们和其他劳动人民所共同支配的新民主国家，已经集体地占有国家企业中的生产资料，就是说，已经与其原来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新民主国家企业中的劳动者，

³⁶⁴¹ 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新的译文是：“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33页）

已经是不被剥削的人们，他们所生产的用于扩大再生产和为全体人民谋利益的属于剩余价值的部分，不能认为被剥削。资本家的雇佣劳动者，则受资本家所剥削。（乙）农民。农民都占有少量的生产资料，或者耕种地主的土地，或者耕种自己的土地。在中国土地制度改革以前，大多数农民都耕种地主的土地；在中国土地制度改革彻底完成以后，所有农民都耕种自己的土地。农民中间占有的生产资料不足维持生活，因而必须出卖部分劳动力的，叫做贫农，贫农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农民中间占有的生产资料足以维持生活，因而不必出卖劳动力的，叫做中农。在中国土地制度改革以前，贫农占农民的大多数；在中国土地制度改革彻底完成以后，中农占农民的大多数在中国土地制度改革以前，农民都受地主和其他剥削阶级所直接地或间接地剥削；只有在新民主主义国家实现土地制度的改革以后方才免除这种剥削。（丙）农民以外的独立劳动者。例如手工业劳动者，自由职业者，小商贩，他们都占有少量的生产资料，以自己的独立劳动为生。他们受帝国主义者、地主、官僚资本家和其他剥削阶级所直接地或间接地剥削。（丁）自由资产阶级。这就是民族资本家和新式富农。他们占有较多的生产资料，以自由资本主义的方法剥削雇佣劳动者。在反动的国家政权下，他们受帝国主义者、地主和官僚资本家所压迫、损害或限制。（戊）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和旧式富农。他们占有最多的生产资料，直接地或间接地与帝国主义相结合，以封建的、买办的、垄断的方法剥削劳动人民，并压迫、损害或限制自由资产阶级。

第二节

无产阶级，农民，独立劳动者，以及一切受人剥削的人们，共占全国人口约百分之九十，其中农民则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七十至八十。所有这些劳动人民，在反动的国家政权下，除受经济上的剥削外，还受政治上的压迫。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基本力量。其中，以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贫农）为人民民主革命和新民主国家政权的领导阶级，而无产阶级则是主要的领导阶级。³⁶⁴²无产阶级、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的任务，是联合自由资产阶级，以人民民主革命的方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有长期的革命斗争的经验。这种革命斗争经验的集中表现，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和建设新国家的伟大的领导能力。

第三节

自由资产阶级是一个软弱的动摇的阶级。但是因为他们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所压迫、损害或限制（这种压迫、损害或限制远较劳动人民所受者为轻），所以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民主革命时期内，他们可以参加这种革命，或者保守中立。在革命胜利以后的经济建设中，他们也可以参加这种建设。只要中国尚未进到社会主义社会，他们是可以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一道前进的。因此，中华人民共

³⁶⁴² 关于半无产阶级也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的提法，后来中共中央作了修正。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中国革命领导阶级问题的修正指示》指出：“关于中国革命的领导问题，无论过去或今后，均应只提是工人阶级（通过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不应再把半工人阶级包括在内。”

和国的国家政权中，应当允许自由资产阶级及其政治团体派遣他们的代表参加工作。但是，他们中间有为数不多的一部分人，即自由资产阶级的右翼分子，是依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反对人民民主革命的，中国人民对于这部分人的反动行为，必须予以警戒和揭露。但是这种政治上的警戒和揭露，应当与经济上的消灭严格地区别开来。中国人民民主革命所应当和必须消灭的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而不是自由资本主义。

第四节

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和旧式富农，人数很少，却占有全国生产资料的最大部分。其中，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虽然各地有多有少，但是按照一般情况，大约只占乡村人数百分之十、户数百分之八左右，而他们占有的土地，则达全部可耕土地的百分之七十至八十之多。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官僚资产阶级，即中国的大资产阶级，人数更少，但是他们所占有的生产资料，极为巨大，以致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仅就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占有的财富而论，其价值即达一百万万至二百万万美元之多。所有这些封建的、买办的反动阶级，建立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动的腐朽的国家，以及代表这个国家的反动的腐朽的政府。这个反动政府，对外出卖民族利益，和帝国主义首先是美国帝国主义订立各种不利于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反动条约，使帝国主义首先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取得政治的和经济的特权，因此这个政府就变成了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国帝国主义的走狗。在对内方面，这个政府压迫人民，举行反革命战争，企图消灭人民民主势力。全国一切生产力，除了已经获得解

放的地区以外，均被这些反动阶级所控制的反动的退步的落后的生产关系所束缚，日趋衰败，不能发展。而生产力本身的要求，则是用革命方法解除这种旧有生产关系的束缚，推翻这种旧有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生产关系，因而使全国一切积极的生产力获得向上发展的可能，替未来的更进步的更能自由地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社会准备条件。这个生产关系变革的内容，就是废除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所强占的特权，废除地主阶级及旧式富农的封建的土地所有权，废除官僚资产阶级的私人垄断的资本所有权。

但是，在阶级社会中，一切生产关系，都是被阶级的国家权力所保护的。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就被什么样的阶级的国家权力所保护，而所谓国家权力，首先就是军队的武力。人们如果要推翻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人们就或早或迟地要推翻旧的国家权力，建立新的国家权力。中国人民如果要消灭帝国主义的、封建的和买办的生产关系，完成民族独立，实行土地改革，没收官僚资本，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生产关系，借以发展中国的生产力，他们就必须推翻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及旧式富农所结合在一起的反动的腐朽的国家权力，首先就必须消灭一切反动军队。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在所从事的伟大的神圣的正义的革命战争，正是为着这个目的。而这个革命战争，现在正是日益接近于全国的胜利。

关于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的指示

(1948年2月16日)

我们既要彻底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又要在这个伟大斗争中不要因为划错与斗错阶级成分及采取错误政策而打乱自己阵线，增加敌人力量，使自己陷于孤立。不要忘记，在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五年而特别是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五年时期，我党曾经因为政策过左陷于孤立，处于极端危险的地位，而在我们党与国民党破裂时期党内主要的危险倾向，曾经是现在仍然可能是“左”倾冒险主义。如果我们现在不严重地注意到这一点，我们就将在政治上犯错误。

人民的革命力量才是真正的优势³⁶⁴³

(1948年2月22日)

反动派的金钱和枪炮并不是什么真正的优势，人心讨厌反动派，不赞成反动派，人们团结起来反对反动派，并和反动派作斗争，这个力量才是真正的优势。……

仅仅一年工夫，人民解放军即已打退了蒋介石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了进攻。这个具体事实，难道还不足以说明单是金钱和枪炮的优势，单是物质的优势，不能算是真正的优势，而只有人心加物质的总和，只有掌握物质的人们，即是说，人民的革命力量，才是真正的优势吗？

³⁶⁴³ 这是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发言人驳斥美国总统杜鲁门援蒋咨文的新闻稿时加写的一段话。

政策和策略是我党我军的生命³⁶⁴⁴

(1948年3月21日)

政策与策略，是我党我军的生命³⁶⁴⁵。

³⁶⁴⁴ 这是毛泽东为转发西北野战军前委指示各纵队应继续提高政策教育的电报写的批语。

³⁶⁴⁵ 在写这个批语的同一天，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通报（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关于情况的通报》）中，也指出：“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企业管理委员会应有工程师、技师及职员参加³⁶⁴⁶

(1948年4月26日)

单是经理及工人代表是不够的，必须有工程师、技师及职员参加管理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应当是厂长负责制下面的管理委员会。在任何企业中，除厂长或经理必须被重视外，还必须重视有知识有经验的工程师、技师及职员。必要时，不惜付出高薪。即使是国民党人，只要有可能，也要利用。³⁶⁴⁷

³⁶⁴⁶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华东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山东兵团政治委员谭震林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关于淄川、博山、张店、周村的情况及所取之政策报告的批语。

³⁶⁴⁷ 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一日，毛泽东在审阅谭震林这个报告时，写过一段和本文内容一致的按语，说：“这里没有提到工程师、技师及有经验的职员。单是经理及工人代表是不够的，必须有工程师、技师及职员参加管理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应当是厂长负责制下面的管理委员会。在任何企业中，必须重视有知识有经验的工程师、技师及职员，必要时不惜付出高薪，即使是国民党人也要利用。”

晋绥分局应将工业生产放在领导工作的重要位置³⁶⁴⁸

(1948年5月11日)

应将工业生产问题放在领导工作的重要位置。有了工业生产的条件，党如果不注意恢复及发展工业，党的领导人员如果缺乏工业方面的知识，如果不用力去学会这一方面的知识，那就会要犯错误。

³⁶⁴⁸ 这是毛主席起草的党内指示。

对知识分子应避免唯成分论的偏向³⁶⁴⁹

(1948年5月21日)

说地主出身者是地主，富农出身者是富农，中农出身者是中农，这是说社会出身，这是对的。但必须补充说，根据知识分子所从事的职业，例如参加军队者是军人，参加政府工作者是政府职员，参加生产企业者是工人、职员、技师或工程师，参加文化工作者是教员、记者、文艺家等，并将着重点不放在社会出身方面，而放在社会职业方面，方可避免唯成分论的偏向。

³⁶⁴⁹ 这是毛主席给周恩来等人的信。

不同意毛泽东主义的提法³⁶⁵⁰

(1948年8月15日)

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这里所说的“中国革命经验”是包括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也在内）根据马恩列斯理论所写的某些小册子及党中央各项规定路线和政策的文件在内。另外，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将我的名字和马恩列斯并列，说成什么“马、恩、列、斯、毛”，也是错误的。你的说法和这后一种说法都是不合实际的，是无益有害的，必须坚决反对这样说。

³⁶⁵⁰ 这是毛主席给吴玉章*的信中的一段话。吴玉章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给周恩来的电报。在电报中，吴玉章表示想在华北大学成立典礼上提出：“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对这样的提法“是否妥当”，请周恩来“同主席和少奇同志商量后，赐以指示”。

* 吴玉章（一八七八——一九六六），四川荣县人。当时任华北大学校长。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

(1948年9月)

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军队叫人民解放军，以示和蒋介石政权不同。

我们的社会经济呢？有人说是“新资本主义”。我看这个名词是不妥当的，因为它没有说明在我们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个体经济加上城市私人经济在数量上是大的，但是不起决定作用。我们国营经济、公营经济，在数量上较小，但它是起决定作用的。我们的社会经济的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

我们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所指的是脱离工业、只要农业来搞什么社会主义，这是破坏生产、阻碍生产发展的，是反动的。但不能由此产生误解。将来在社会主义体系中农业也要社会化。

许多阶级受无产阶级领导，这就叫做社会主义因素。现在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已经在一万万六千万人口中变成现实性了，即有了社会主义的因素。……新中国的经济构成，首先是国营经济，第二是由个体向集体发展的农业经济，第三是私人经济，国营经济是领导成分。现在不提国营经济就不能解决问题了。

大工业、大银行、大商业，不管是不是官僚资本，全国胜利后一定时期内都是要没收的，这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原则。而只要一没收，它们就属于社会主义部分。我们国家银行的资本，是

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民在土地革命后搞合作社，要看在谁的领导之下：在资产阶级领导之下，就是资本主义的；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就是社会主义的。当然，今天我们农村的合作社，是个体农民在私有财产基础上组织的合作社，不完全是社会主义的，但它带有社会主义性质，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和国营企业不同，国营企业是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它不带资本主义性。

社会主义性质这种话应该讲，但整个国民经济还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即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之下的经济体系。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外部就是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其次，内部还有民族矛盾，……此外，在工农之间也有矛盾，但不是对抗性的矛盾，这可以在工农联盟内部通过供给机器、组织合作社、参加国家管理等予以解决。要巩固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权，分给农民土地只是建立了领导权，单有这一条还不够。所谓领导权，就是要使被领导者相信，将来在经济建设方面，还要给他机器，组织合作社，使农民富裕起来，集合起来。他们信服了，领导权就巩固了，否则会失去领导权的。

我国在经济上完成民族独立，还要一二十年时间。我们要努力发展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

给刘少奇的信

(1948年10月26日)

就我们的整个经济政策说来，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而“有益于国计民生”，这就是一条极大的限制，即引导私人资本纳入“国计民生”的轨道之上。要达到这一点，必须经常和企图脱出这条轨道的私人资本作斗争。而这些私人资本虽然已经纳入这条轨道，他们总是想脱出去的，所以限制的斗争将是经常不断的。

再有一年左右时间即可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

3651

(1948年11月11日)

我们的口号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³⁶⁵¹ 这是毛主席给东北野战军的指示。

歼灭强敌必须用强攻方法³⁶⁵²

(1948年12月4日)

对于战斗力顽强之敌，依靠急袭手段是不能歼灭的，必须采取割裂、侦察、近迫作业、集中兵力火力和步炮协同诸项手段，才能歼灭。

³⁶⁵² 这是毛主席给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的指示。

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³⁶⁵³

(1949年1月8日)

我们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不容许半途而废。

中国人民革命力量愈强大，愈坚决，美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也就将愈减少，并且连同用财政及武器援助国民党这件事也就可能要减少。

³⁶⁵³ 这是毛泽东为一九四九年一月六日至八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起草的决议，一月八日由会议通过。一月六日和八日毛泽东曾在会议上两次发表讲话，讲话的主要内容已包括在这个决议中。

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³⁶⁵⁴

(1949年3月13日)

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应该这样提法，这样提法较好。而不应该像王明同志的提法，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具体运用和发展”，这种提法不妥当。我们不要忙于想宽了，先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如果有可以运用到其他国家的经验，自然会有人运用的。

我们要普遍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不反对也不应当反对宣传中国的东西。但我们比较缺乏的是马、恩、列、斯的理论，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低，虽然也翻译了很多书，可是实际上没有对马、恩、列、斯著作做很好的宣传。所以现在应当在全中国全世界很好地宣传马、恩、列、斯关于唯物主义、关于党和国家的学说，宣传他们的政治经济学等等，而不要把毛与马、恩、列、斯并列起来。我们说，我们这一套是一个国家的经验，这样说就很好，就比较好些。

中国革命的思想、路线、政策等，如再搞一个主义，那末世界上就有了几个主义，这对革命不利，我们还是作为马克思列宁

³⁶⁵⁴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共十个部分，其中第二部分“关于党委制”已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题为《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主义的分店好。关于十二本干部必读的书³⁶⁵⁵，……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应当有共同的认识，而我们许多高级干部在这个问题上至今还没有共同的认识。如果在今后三年之内，有三万人读完这十二本书，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

关于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关系

十月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人类第一个最伟大的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倒德、意、日帝国主义是第二个最伟大的胜利，中国革命是第三个最伟大的胜利。

不能设想，没有十月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的胜利而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如果没有十月革命，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而且胜利之后的巩固，没有外国无产阶级的援助，也是不行的。如果认为没有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也可以胜利，那是不正确的，违背马列主义的。我们不能设想，没有苏联，没有欧洲的和美国的工人运动吸引美帝国主义的力量在西方，我们中国革命也能胜利。

“毕其功于一役”

“毕其功于一役”，我是在流血的革命这一点上说的，就是说流血的革命只有这一次，将来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那一次就不用流血了，而可能和平解决。但这只是可能，

³⁶⁵⁵ 指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规定干部学习马列主义必读的十二本著作，即：《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列宁主义基础》、《联共（布）党史》、《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斯大林论中国》、《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

将来是否不流血，还要看我们工作的努力情况。如果国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军和我们的党腐化下去，无产阶级不能掌握住这个国家政权，那还是有问题的。

如何帮助王明同志改正错误？

至于王明是否有个人野心，这一点他是不承认的，我认为也没有十分必要一定要他承认。但他承认了个人主义，这就是说不以人民利益为第一，而以个人利益为第一了。其实，个人而成了主义，这也就很可观了。实质是他企图按照他的面貌来改造党，这在内战时期表现为小资产阶级的形态，在抗战时期表现为资产阶级的形态。这种现象，在世界上别的国家也发生过。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社会上一部分人有这种思想，王明是他们在党内的代表人物。

依靠群众办好铁路建设事业³⁶⁵⁶

(1949年7月9日)

过去，我们是无产阶级，什么“产”都没有，怎么能修建铁路呢？今天，我们个人没有“产”，但我们有了国家，有了群众，有了干部，有了工程师……，只要我们依靠群众，就有力量，就能够修好铁路。

³⁶⁵⁶ 这是毛泽东向全国铁路职工临时代表会议暨全国机务会议全体代表和铁道部、铁道兵团、平津铁路管理局部分工作人员的讲话。

我们是能够克服困难的³⁶⁵⁷

(1949年7月31日)

南昌起义及当时全国各地的许多起义，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决定的。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反动派宣布了反革命政变之后，中国共产党即决定率领人民反抗蒋介石反革命。八一南昌起义就是当时一连串革命起义的第一个起义。从这次起义到现在，业已二十二年了。当时的青年人，现在已经是中年了。当时的中年人，现在已经是老年了。但是革命则终于胜利了。

这个军队的成分是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工农占百分之九十左右，革命知识分子占百分之十左右，而革命知识分子则是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不但懂得用革命精神教育军队，坚决地执行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及其各项具体政策，而且懂得革命的前途是什么，即是说革命将经过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稳步地发展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³⁶⁵⁷ 这是毛泽东在审阅新华社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立二十二周年而写的社论稿时加写的几段话。本文标题即是毛泽东改定的社论题目。

沁园春·长沙

(1925年)

独立寒秋， 携来百侣曾游。
湘江北去，³⁶⁵⁸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橘子洲头。 恰同学年少，
看万山红遍， 风华正茂；
层林尽染； 书生意气，
漫江碧透， 挥斥方遒。³⁶⁵⁹
百舸争流。 指点江山，
鹰击长空， 激扬文字，
鱼翔浅底， 粪土当年万户侯。
万类霜天竞自由。 曾记否？
怅寥廓， 到中流击水，³⁶⁶⁰
问苍茫大地， 浪遏飞舟？
谁主沉浮？

³⁶⁵⁸ 湘江是湖南省最大的河流，发源于广西的海洋山，流经长沙，注入洞庭湖。橘子洲是江中小岛，又名水陆洲。

³⁶⁵⁹ 《庄子·田子方》：“挥斥八极”。郭象注：“挥斥，犹纵放也。”遒：道劲。挥斥方遒，是说热情奔放，劲头正足。

³⁶⁶⁰ “击水”句作者自注：“击水：游泳。那是初学，盛夏水涨，几死者数。一群人终于坚持，直到隆冬，犹在江中。那时有一篇诗，都忘记了。只记得两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

菩萨蛮·黄鹤楼³⁶⁶¹

(1927年春)

茫茫九派流中国，
沉沉一线穿南北。³⁶⁶²
烟雨莽苍苍，
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
剩有游人处。
把酒酹滔滔，³⁶⁶³
心潮逐浪高！³⁶⁶⁴

³⁶⁶¹ 黄鹤楼在今武昌市长江边。传说有仙人骑鹤到此，唐人崔颢有“黄鹤一去不复返”之句。九派，泛指长江支流。

³⁶⁶² 一线，指京汉铁路和粤汉铁路，即今京广线铁路。

³⁶⁶³ 酹：古人对天立誓，以酒浇地。这里表达誓与反革命势力斗争的决心。

³⁶⁶⁴ “心潮”句作者自注：“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夏季，8月7日，党的紧急会议决定武装反抗，从此找到了出路。”

采桑子·重阳

(1929年10月)

人生易老天难老，
岁岁重阳。
今又重阳。
战地黄花分外香。

一年一度秋风劲，
不似春光。
胜似春光。
寥廓江天万里霜。

如梦令·元旦³⁶⁶⁵

(1930年1月)

宁化、清流、归化，³⁶⁶⁶
路隘林深苔滑。
今日向何方？
直指武夷山下。
山下，山下，
风展红旗如画。

³⁶⁶⁵ 这里的元旦是阴历正月初一，即阳历1930年1月30日。

³⁶⁶⁶ 宁化、清流、归化（今称明溪）均为闽北地名。武夷山在江西、福建边界，主峰在福建省崇安县西北。

减字木兰花·广昌³⁶⁶⁷路上

(1930年2月)

漫天皆白，
雪里行军情更迫。
头上高山，
风卷红旗过大关，

此行何去？
赣江风雪迷漫处。³⁶⁶⁸
命令昨颁，
十万工农下吉安。

³⁶⁶⁷ 广昌、吉安均为江西县名。

³⁶⁶⁸ 赣江，由章水、贡水在赣州汇合，流入鄱阳湖，是江西的主要河流。

清平乐·会昌

(1934年夏)

东方欲晓，
莫道君行早。
踏遍青山人未老，
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³⁶⁶⁹
颠连直接东溟。³⁶⁷⁰
战士指看南粤，
更加郁郁葱葱。³⁶⁷¹

³⁶⁶⁹ 会昌：县名，在江西南部。

³⁶⁷⁰ 颠：同“巅”，山峰。东溟：东海。

³⁶⁷¹ 郁郁葱葱：《后汉书·光武帝纪》，“气佳哉，郁郁葱葱然！”

忆秦娥³⁶⁷² · 娄山关³⁶⁷³

(1935年2月)

西风烈，
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
马蹄声碎，
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
苍山如海，
残阳如血。

³⁶⁷² 忆秦娥：词牌名，本于李白词“秦娥梦断秦楼月”。

³⁶⁷³ 娄山关：遵义市之北，从四川入贵州的要道。

七律·长征³⁶⁷⁴

(1935年10月)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³⁶⁷⁵
乌蒙磅礴走泥丸。³⁶⁷⁶
金沙水拍云崖暖，
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尽开颜。

³⁶⁷⁴ 长征：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从江西、福建出发，于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陕北，行程二万五千余里。

³⁶⁷⁵ 五岭：大庾岭，骑田岭，都庞岭，萌渚岭，越城岭，或称南岭，横亘在江西、湖南、两广之间。逶迤：弯弯曲曲延续不绝的样子。

³⁶⁷⁶ 乌蒙：云贵间金沙江南岸的山脉。走泥丸：《汉书·蒯通传》，“阪上走丸”，从斜坡滚下泥丸，形容跳动之快。铁索：大渡河上泸定桥，它是用十三根铁索组成的桥。岷山：在四川和甘肃边界，海拔四千米左右。一九三五年九月红军长征经此。

清平乐·六盘山³⁶⁷⁷

(1935年10月)

天高云淡，
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
屈指行程两万。

六盘山上高峰，
红旗漫卷西风。³⁶⁷⁸
今日长缨在手，³⁶⁷⁹
何时缚住苍龙？³⁶⁸⁰

³⁶⁷⁷ 六盘山：在宁夏南部，甘肃东部。望断：望尽。屈指：屈指计算。

³⁶⁷⁸ 红旗：一九五七年在《诗刊》创刊号上发表时作“旄头”。一九六一年九月为宁夏干部书写此词时改为“红旗”，手迹发表在该年十月七日的《光明日报》。

³⁶⁷⁹ 长缨：长绳。《汉书·终军传》，“军自请，愿受长缨，必羁南越王而致之阙下。”

³⁶⁸⁰ 苍龙：《后汉书·张纯传》，“苍龙甲寅”。注曰，“苍龙，太岁也”。古时以岁为凶神恶煞，太岁在地上，与天上岁星相应。

沁园春·雪

(1936年2月)

北国风光， 江山如此多娇，
千里冰封， 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万里雪飘。 惜秦皇汉武，
望长城内外， 略输文采；
惟馥莽莽； 唐宗宋祖，
大河上下， 稍逊风骚。³⁶⁸¹
顿失滔滔。 一代天骄，³⁶⁸²
山舞银蛇， 成吉思汗，³⁶⁸³
原驰蜡象，³⁶⁸⁴ 只识弯弓射大雕。
欲与天公试比高。 俱往矣，
须晴日， 数风流人物，
看红妆素裹， 还看今朝。
分外妖娆。

³⁶⁸¹ 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和宋太祖。风骚：《诗经·国风》和屈原的《离骚》，泛指文学。

³⁶⁸² 天骄：汉朝人称匈奴为“天之骄子”，见《汉书·匈奴传》。

³⁶⁸³ 成吉思汗：建立了横跨欧亚大帝国的蒙古征服者。射雕：《史记·李广传》称匈奴善射者为“射雕者”。

³⁶⁸⁴ 作者原注：“原”指高原，即秦晋高原。

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1949年4月)

钟山风雨起苍黄，³⁶⁸⁵
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³⁶⁸⁶
天翻地覆慨而慷。³⁶⁸⁷
宜将剩勇追穷寇，³⁶⁸⁸
不可沽名学霸王。³⁶⁸⁹
天若有情天亦老，³⁶⁹⁰
人间正道是沧桑。³⁶⁹¹

³⁶⁸⁵ 钟山：即紫金山，南京市东。苍黄：比喻大变化。

³⁶⁸⁶ 虎踞龙盘：《三国志》诸葛亮与孙权论金陵说，“钟阜龙蟠，石城虎踞。”

³⁶⁸⁷ 慨而慷：即慷慨。曹操《短歌行》，“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³⁶⁸⁸ 穷寇：指国民党残余的军事力量。《孙子兵法·军争篇》有“围师必阙（网开一面之意），穷寇勿追”。

³⁶⁸⁹ 霸王：指西楚霸王项羽。鸿门宴上，他听了项伯的话，“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没有杀刘邦后来刘邦项羽血战连年，终于约定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双方士兵为和平连呼万岁。项羽守约退兵，刘邦却立即背信弃义地围攻项羽于垓下，他的部下更把楚霸王分尸为五。事迹见《史记·项羽本纪》。

³⁶⁹⁰ 天若有情天亦老：这是李贺的诗句，见《采桑子·重阳》注释。

³⁶⁹¹ 沧桑：沧海桑田的略语。比喻巨大变化。葛洪《神仙传·麻姑》里，麻姑对王方平说，“接待以来，已见东海三为桑田。”

浪淘沙·北戴河

(1954年夏)

大雨落幽燕，³⁶⁹²
白浪滔天。
秦皇岛外打鱼船。
一片汪洋都不见，
知向谁边？

往事越千年，
魏武挥鞭，
东临碣石有遗篇。³⁶⁹³
萧瑟秋风今又是，
换了人间。

³⁶⁹² 幽燕：古幽州及燕国，在今河北省北部及东北部。

³⁶⁹³ 魏武、碣石：魏武帝曹操于建安十二年（公元二零七年）北伐乌桓，路过碣石山。碣石山在北戴河外，靠近渤海，汉朝时还在陆上，到六朝时已经沉到渤海里了。曹操登临碣石山，写了《步出夏门行》四首，第二首有“东临碣石，以观苍海……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七律·送瘟神（二首）

（1958年7月1日）

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余江县³⁶⁹⁴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晓，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

绿水青山枉自多，
华佗无奈小虫何！³⁶⁹⁵
千村薜荔人遗矢，³⁶⁹⁶
万户萧疏鬼唱歌。³⁶⁹⁷
坐地日行八万里，³⁶⁹⁸
巡天遥看一千河。³⁶⁹⁹

³⁶⁹⁴ 余江县：在江西。

³⁶⁹⁵ 华佗：三国时名医。

³⁶⁹⁶ 薜荔：亦称木莲、鬼馒头。桑科，常绿藤本，含乳汁。叶厚革质，椭圆形，下面有凸出的网络。产于我国中部和南部。果实富果胶，可制食用的凉粉。茎、叶、果供药用，有祛风除湿、通血活络、消肿解毒、补肾、通乳作用。

遗矢：遗尿。《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赵王派使者到楚国看廉颇，想召他抗秦。使者诳报道，“廉将军虽老，尚善饭；然与臣坐，倾之，三遗矢矣。”血吸虫病后期人常水泻。

³⁶⁹⁷ 鬼唱歌：李贺《秋来》，“秋坟鬼唱鲍家诗”。

³⁶⁹⁸ 坐地、巡天、牛郎：毛泽东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五日致周世钊的信，“坐地日行八万里，蒋竹如（毛在湖南第一师范时的同学）讲得不对，是有数据的。地球直径约一万二千五百公里，以圆周率三点一四一六乘之，得约四万公里，即八万华里。这是地球的自转（即一天时间）里程。坐火车、轮船、汽车，要付代价，叫做旅行。坐地球，不付代价（即不买车票），日行八万里，问人这是旅行么，答曰不是，我一动也没有动。真是岂有此理！囿于习俗，迷信未除。完全的日常生活，许多人却以为怪。

³⁶⁹⁹ “巡天，即谓我们这个太阳系（地球在内）每日每时都在银河系里穿来穿去。银河一河也，河则无限，‘一千’言其多而已。我们人类只是‘巡’在一条河中，看则可以无数。

牛郎欲问瘟神事，³⁷⁰⁰
一样悲欢逐逝波。

春风杨柳万千条，
六亿神州尽舜尧。³⁷⁰¹
红雨随心翻作浪，
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
地动三河铁臂摇。³⁷⁰²
借问瘟君欲何往，
纸船明烛照天烧。

³⁷⁰⁰ “牛郎晋人，血吸虫病，蛊病，俗名鼓胀病，周秦汉屡见书传。牛郎自然关心他的乡人，要问瘟神情况如何了。大熊星座，俗名牛郎星（是否记错了？），属银河系。*”

*牛郎星不属大熊星座，它是天鹰星座中的 α 星（ α 表示其为该星座中的最亮一颗）。大熊星座中的星和牛郎星都属银河系。

³⁷⁰¹ 尽舜尧：《孟子·告天下》，“人皆可以为舜尧”。红雨：李贺《将进酒》，“桃花乱落如红雨”。

³⁷⁰² 三河：黄河、淮河、洛河，泛指河流。

七律·到韶山

(1959年6月)

别梦依稀咒逝川，³⁷⁰³
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
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³⁷⁰⁴
敢叫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³⁷⁰⁵
遍地英雄下夕烟。

³⁷⁰³ 逝川：流逝的时间。《论语·子罕篇》，“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时间如河水般流失。

³⁷⁰⁴ 为有：因为有。

³⁷⁰⁵ 菽：豆类。遍地英雄：此句原作“人物峥嵘胜昔年”。英雄：人民群众。

七绝·为李进³⁷⁰⁶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

(1961年9月9日)

暮色苍茫看劲松，
乱云飞渡仍从容。
天生一个仙人洞，
无限风光在险峰。

³⁷⁰⁶ 李进：即主席夫人江青（1914年——1991年）。山东省诸城人，原名李云鹤。艺术家，艺名蓝蘋。毛主席的忠实学生与战友，辅佐毛主席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被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迫害，自杀身亡。

卜算子·咏梅

(1961年12月)

风雨送春归，³⁷⁰⁷

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冰，

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

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

她在丛中笑。

³⁷⁰⁷ 风雨送春归：辛弃疾《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

七律·冬云

(1962年12月26日)

雪压冬云白絮飞，
万花纷谢一时稀。
高天滚滚寒流急，
大地微微暖气吹。³⁷⁰⁸
独有英雄驱虎豹，
更无豪杰怕熊罴。³⁷⁰⁹
梅花欢喜漫天雪，
冻死苍蝇未足奇。

³⁷⁰⁸ 1962年12月26日这一天是作者的生日，正是当年冬至后第四天。虽有寒流袭来，但大地仍然暖气微微。

³⁷⁰⁹ 罴，即人熊。这里泛指猛兽，比喻凶暴的敌人。

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1963年1月9日)

小小寰球，	多少事，
有几个苍蝇碰壁。	从来急；
嗡嗡叫，	天地转，
几声凄厉，	光阴迫。
几声抽泣。	一万年太久，
蚂蚁缘槐夸大国， ³⁷¹⁰	只争朝夕。
蚍蜉撼树谈何易。 ³⁷¹¹	四海翻腾云水怒，
正西风落叶下长安， ³⁷¹²	五洲震荡风雷激。
飞鸣镝。 ³⁷¹³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
	全无敌。

³⁷¹⁰ 蚂蚁缘槐：唐李公佐《南柯太守传》，有个叫淳于棼的人，一天喝醉梦见自己在“大槐安国”当了驸马，做了南柯郡太守，醒来才知是梦。后来他在屋后发现一个白蚂蚁穴，还建有王城，原来这就是“大槐安国”。

³⁷¹¹ 蚍蜉撼树：唐韩愈《调张籍》，“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³⁷¹² 西风落叶下长安：唐贾岛《忆江上吴处士》，“秋风生渭水，落叶下长安。”

³⁷¹³ 飞鸣镝：响箭，汉时匈奴冒顿单于用来发号司令。这里是说，反帝反修的战斗已经打响。

贺新郎·读史

(1964年春)

人猿相揖别。
只几个石头磨过，
小儿时节。
铜铁炉中翻火焰，
为问何时猜得？
不过几千寒热。
人世难逢开口笑，³⁷¹⁴
上疆场彼此弯弓月。
流遍了，
郊原血。

一篇读罢头飞雪，
但记得斑斑点点，
几行陈迹。
五帝三皇神圣事，
骗了无涯过客。
有多少风流人物？
盗跖庄跻流誉后，³⁷¹⁵
更陈王奋起挥黄钺。³⁷¹⁶
歌未竟，
东方白。

³⁷¹⁴ 人世难逢开口笑：唐杜牧《九日齐山登高》有“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语出《庄子·盗跖》，“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除病瘦死伤忧患，其中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

³⁷¹⁵ 盗跖庄跻：盗跖是春秋战国间的大盗；庄跻是战国楚人，《荀子·议兵》，“庄跻起，楚分而为三四”。

³⁷¹⁶ 陈王：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黄钺：象征帝王权力的用黄金装饰的斧子。《书·牧誓》，“王左仗黄钺，右秉白旄以麾”。

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1965年5月)

久有凌云志，	风雷动，
重上井冈山。 ³⁷¹⁷	旌旗奋，
千里来寻故地，	是人寰。
旧貌变新颜。	三十八年过去， ³⁷¹⁸
到处莺歌燕舞，	弹指一挥间。
更有潺潺流水，	可上九天揽月， ³⁷¹⁹
高路入云端。	可下五洋捉鳖，
过了黄洋界， ³⁷²⁰	谈笑凯歌还。
险处不须看。	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登攀。

³⁷¹⁷ 井冈山：在江西西部及湖南东部，方圆五百里。

³⁷¹⁸ 三十八年：这是从一九二七年九月毛泽东上井冈山算起。二九年初毛泽东带兵下山，至此时已离开井冈山三十六年。

³⁷¹⁹ 可上九天揽月：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³⁷²⁰ 黄洋界：井冈山五大哨口之一，另四个是八面山、双马石、朱沙冲、桐木岭。

